貴霜史研究

余太山 著


商務印書館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11151-5

定價：30.00圓

上架建議：中外交流史

貴霜史研究

余太山　著



2015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貴霜史研究 / 余太山著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ISBN 978 - 7 - 100 - 11151 - 5

I. ①貴…　II. ①余…　III. ①貴霜帝國—歷史—研究　IV. ① K1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055121 號

貴霜史研究
余太山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三河市尚藝印裝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151 - 5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開本 880 × 1230　1/32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張 5 1/8

定價：30.00 圓

目錄

緒說

貴霜王朝的前身是大夏國翖侯之一貴霜翖侯。貴霜翖侯源自入侵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塞種四部之一 Gasiani。

公元前 140 年左右，塞人諸部渡錫爾河南下，其中一支進入巴克特里亞（Bactria），滅亡了那裏的希臘人王國，他們建立的政權（可能以塞種四部之一 Tochari 爲主），《史記·大宛列傳》稱之爲大夏國。"大夏" 得視爲 Tochari 之對譯。

公元前 130 年，烏孫人在匈奴人的支援下，遠征大月氏，戰而勝之，奪取了伊犂河、楚河流域。大月氏人遷往阿姆河流域，征服大夏，佔領其地。

大月氏人直接統治 Bactra 及其周圍地區，而通過所置 "五翖侯" 控制東部山區。"五翖侯" 均係原大夏國人，是大月氏人扶植的傀儡，後來推翻大月氏的貴霜翖侯即其中之一。

包括貴霜翖侯在內的大夏國五翖侯出現的時間無從確知。大夏國並無大君長，"小長" 林立。這五翖侯有可能都是原大夏國 "小長"，在大月氏人征服大夏國後，得到征服者的承認而繼續存在。果然，貴霜等五翖侯出現的時間上限爲公元前 140 年，亦即包括 Gasiani 在內的塞種諸部自錫爾河北岸南下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之年。大月氏征服大夏後，也可能另立五個親大月氏的大夏人爲翖侯，通過他們統治原大夏國的部分地區。果然，則貴霜等五翖侯出現的時間上限應爲大月氏征服大夏之年，即公元前 129 年。

貴霜王朝的創始人丘就卻（Kujula Kadphises），曾是大夏國的貴霜翖侯。他與西印度的希臘王 Hermaeus（陰末赴）結盟或聯姻，攻滅了其餘四翖侯。四翖侯既滅，丘就卻自立爲王，國號“貴霜”。大約公元 50 年之後，丘就卻又從來自塞斯坦的 Gondophares 或其繼承者手中奪取了 Paropamisadae（今喀布爾河上中游流域）。

嗣後，丘就卻推翻了其昔日宗主、盤踞 Bactra 及其周圍地區的大月氏王，一統吐火羅斯坦，並在公元 60 年左右南下佔領 Gandhāra 和 Taxila，殲滅了該地 Gondophares 家族的殘餘勢力。貴霜王朝於是成立。

丘就卻最早可能在公元 78 年去世，王位由其子 Vima Takto 繼承，後者復由其子閻膏珍（Vima Kadphises）繼承。在 Vima 父子兩代人的經營下，貴霜征服了印度河流域（今信德、卡提阿瓦和馬爾瓦等地可能均包括在內），國勢日盛。貴霜在征服的地區置將監領，而允許當地酋長擁有一定的自治權，包括使用自創的紀元。

除征服印度河流域外，Vima 父子在位期間，貴霜亦曾覬覦帕米爾以東。公元 90 年，貴霜副王謝率兵七萬越過了帕米爾，但被東漢西域都護班超擊退。安帝元初（公元 114—120 年）中，疏勒王安國去世，閻膏珍出兵扶立安國之舅臣磐爲疏勒王，可知貴霜勢力確曾向塔里木盆地伸展。

閻膏珍的去位不會晚於公元 126（或 129）年，繼位者爲其子迦膩色迦（Kaniṣka）。一般認爲迦膩色迦開創了一個紀元，史稱“迦膩色迦紀元”。事實上，迦膩色迦很可能衹是沿用了其父閻膏珍曾採用的紀元，而省略其百位數而已。

閻膏珍的年代爲 187 年的 Khalatse 銘文，按所謂超日紀元（Vikrama era，元年爲公元前 58 年）計算，絕對年代爲公元 129 年。而同屬於閻膏珍的年代爲 299 年的 Surkh Kotal 銘文按所謂 Eucratides 紀元（元年爲公元前 170 年）計算，其絕對年代也是公元 129 年。既

然迦膩色迦是閻膏珍的繼承人，這公元 129 年應該就是迦膩色迦即位年代之上限。而超日紀元 201 年（公元 143 年）或所謂 Eucratides 紀元第 301 年（公元 131 年）應視爲迦膩色迦即位年代之下限。

銘文研究表明：自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起，迦膩色迦以下貴霜列王沿用同一紀元至少 98 年。據此，迦膩色迦以降，貴霜王系可羅列如下：

迦膩色迦：“迦膩色迦紀元”第 1 至第 23 年（公元 143—165 年或公元 131—153 年）在位

Huviṣka：“迦膩色迦紀元”第 28 至第 62 年（公元 170—204 年或公元 158—192 年）在位

Vāsudeva（波調）：“迦膩色迦紀元”第 64/67 至第 98 年（公元 206/209—240 年或公元 194/197—228 年）在位

這一時期，大致是貴霜王朝最繁榮的時期，疆域臻于最大，治下各地經濟和文化均有進步，東西交通也上了一個新的臺階。由於貴霜統治者兼收並蓄，各種宗教均有發展，佛教尤爲顯著。

Vāsudeva 末期，貴霜遭受新興的薩珊波斯的入侵。可能在 Vāsudeva 去世之後，貴霜國分裂爲東西兩部，西部（巴克特里亞等地）終於淪爲薩珊朝屬土。東部的貴霜人或其支系在旁遮普中部和東部苟延殘喘直至公元四世紀前半葉。

薩珊朝在被征服的貴霜領土上設置機構實行統治，這些機構的最高首長稱 Kushanshahr。Kushanshahr 均係薩珊王族，而由於其地遠離薩珊統治中心，且曾作爲貴霜舊土而具有文化、經濟的特殊性，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原貴霜領土的統治者的獨立性也就與日俱增了，史稱“貴霜—薩珊”政權。

降至四世紀末至五世紀初，乘“貴霜—薩珊”政權統治衰落之際，有寄多羅王崛起於吐火羅斯坦。其人可能是貴霜王族之裔，在一統吐火羅斯坦後，興師越過興都庫什山，征服了乾陀羅以北五國。

五世紀三十年代末，嚈噠人入侵吐火羅斯坦，寄多羅王不敵，率部西徙，一度衝擊薩珊波斯東境。寄多羅王本人下落不明，既可能在與波斯人作戰過程中陣亡，也可能死於接踵而至的嚈噠人之手。換言之，寄多羅貴霜結束的年代與嚈噠入侵吐火羅斯坦的年代大致相符。

寄多羅王被嚈噠人逐出吐火羅斯坦西徙之際，其子留守興都庫什山南之地，史稱“車多羅”（Kidara）或“居常”（Kushan）。其人可能一度服屬於南下次大陸之嚈噠人，苟延殘喘至五世紀八十年代末。

一　貴霜的淵源

中國史籍所見“貴霜”，應即中亞和西北次大陸傳世錢銘所見 Kuṣāṇa。貴霜的淵源是貴霜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之一，迄今似乎還沒有人提出自成系統的假說。謹在此略陳己見。

一

據《後漢書·西域傳》記載，貴霜的淵源和崛起過程如下：

> 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凡五部翖侯。後百餘歲，貴霜翖侯丘就卻攻滅四翖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一般認爲，其中提到的貴霜王朝的創始人丘就卻就是貴霜錢銘所見 Kujula Kadphises。因此，貴霜王朝的前身無疑就是貴霜翖侯。

傳文既稱月氏遷大夏後“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凡五部翖侯”，似乎五翖侯均爲大月氏人。而丘就卻一統四翖侯，建立貴霜王朝後，“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髣髴也說明了這一點。

今案:《後漢書·西域傳》關於大月氏滅大夏後設五翖侯的記載乃本《漢書·西域傳》:

> 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二曰雙靡翖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翖侯,治護澡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頓翖侯,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

據此,所謂五翖侯其實並非月氏人,而是大夏國人。蓋大夏國原本沒有能夠號令全國的君王,其城邑各自爲主,即由所謂"小長"統治。月氏征服大夏國後,沒有消滅這些"小長",而是"皆臣畜之"。歷史上遊牧部族扶植傀儡統治佔領區並不少見。至於"翖侯"這一稱號,既可能是月氏人帶到巴克特里亞的,也可能是大夏國原有的。如果是後者,月氏稱其傀儡爲"翖侯"不過入境隨俗。當然,此號爲大夏和月氏所共有的可能性也不可能排除。

果真如此,《後漢書·西域傳》"分其國"云云,不過是說五翖侯分治的局面是大月氏入侵後形成的,並沒有說這五翖侯都是大月氏人。再者,五部翖侯(或其中若干)可能在大月氏征服大夏之前已經存在,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謂"小長";大月氏人正是利用大夏國這種"小長"林立的局面因地制宜地進行統治的。即使大月氏另立五個翖侯,也必須承認這些翖侯完全有可能是親大月氏的大夏國人。此外,

應該指出，“分其國”云云，並不是說將整個大夏地分割爲五翖侯的治地，而衹能理解爲裂土分封。事實上，五翖侯治地均在大夏地之東部。[1] 不言而喻，五翖侯即便均係原大夏國“小長”，早已存在於各自的治地，而從大月氏的角度來看，也屬裂土分封。[2]

由此可見，在敘說貴霜淵源時，《後漢書·西域傳》抄襲前史，又因昧於事實，表述曖昧，有澄清之必要。“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所謂“屬”，意指役屬。貴霜王朝的前身應爲役屬月氏的大夏國“小長”之一——貴霜翖侯。

二

貴霜王朝之前身既爲原大夏國的貴霜翖侯，則貴霜人可溯源於大夏。而所謂“大夏國”，首見《史記·大宛列傳》，據載：

>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這是公元前 130—129 年間西漢使臣張騫首次西使所見聞。[3]

大宛在今費爾幹那。嬀水，指今阿姆河。[4] 故大夏國應位費爾幹那盆地西南、阿姆河南岸。所謂“其都曰藍市城”應指當時該地最大的都市 Bactra，曾爲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都城。[5]

月氏西徙所“攻敗”的“大夏國”，並非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而是滅亡了該王國的 Sacae 諸部。一說“大夏”乃指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非是。[6]

一則,《史記·大宛列傳》所載大夏國“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與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情況不合。蓋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有“大君長”無疑。

二則，根據比較可靠的研究，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亡於公元前140年左右。[7]而大月氏西遷不可能早於公元前130年。換言之，大月氏西徙時，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已經滅亡。

三則，無從解釋張騫何故將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稱爲“大夏”，而“大夏”可以視爲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Sacae四部之一Tochari一名的確切漢字音譯。

Sacae諸部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見諸Strabo《地理志》(XI，8—2)[8]：

> Caspiai海沿岸的斯基泰人大部分是所謂Däae人，其東則有瑪薩革泰人和Sacae人，其餘雖各有名號，但皆被稱爲斯基泰人。他們全以遊牧爲生，其中最著名的是從希臘人手中奪取了巴克特里亞的Asii、P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他們來自Iaxartes河（錫爾河）彼岸、與Sacae和索格底亞那相毗連、被Sacae人佔領的地方。

由於在接下來的敘述中，Strabo十分明確地說，是Sacae“佔領了Bactriana”。(XI，8—4)因此，“從希臘人手中奪取了巴克特里亞的Asii、P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四者應屬於與Däae、Massagetae並稱爲斯基泰的Sacae人。我們不妨稱Asii等爲Sacae四部。

又，據Trogus Prologues記載，“Scythia部族Saraucae和Asiani佔領了Bactra和Sogdiana”(XLI)。在另一處又含糊地提到“Tochari的王族Asiani”和“Saraucae的殲滅”(XLII)。[9]此處所謂“Scythia”

與“Sacae”是等值的。蓋據 Strabo，Sacae 亦被稱爲 Scythia。而 Saraucae 和 Asiani 應即 Strabo 所見 Sacarauli 和 Asii 無疑。

這就是說，在 Sacae 諸族入侵巴克特里亞的過程中，佔領其首府 Bactra 的主要是 Sacarauli 和 Asii 兩部，Asii 最終戰勝了 Sacarauli。至於 Asii 被稱爲“Tochari 的王族”似乎應該理解爲前者是後者的宗主，也就是說是 Asii 率領 Tochari 佔領了 Bactra 和 Sogdiana，戰勝了 Sacarauli。[10] 至於四部之一的 Pasiani 没有被提到，可能是因爲資料殘缺的緣故。

張騫采用四部之一的 Tochari 之名指稱被 Sacae 四部侵佔的巴克特里亞，既可能是因爲 Tochari 人數衆多的緣故，[11] 也可能是其時以 Asii 爲宗主的 Tochari 人業已戰勝 Sacarauli 人，獨佔 Bactra 的緣故。

要之，約公元前 140 年左右，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亡於入侵的 Sacae 諸部。中國史籍稱被 Sacae 侵佔的巴克特里亞爲“大夏”。[12] 質言之，貴霜可溯源於 Sacae 諸部。[13]

三

貴霜翖侯既然是原大夏國人，係滅亡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 Sacae 四部之一，則貴霜應可進一步溯源於其中的 Pasiani。

Pasiani 除了上引 Strabo 書外，不見於其他記載，並無事跡可考。這似乎暗示 Strabo 所載這一部落的名稱有誤。一說“Pasiani”（Πασιανι）得視爲 Gasiani（Γασιανι）之訛，[14] 頗有理據。而“貴霜”[giuət-shiang] 或 Kuṣāṇa 與 Gaisiani 得視爲同名異譯。

這就是說，入侵 Bactria 的 Gasiani 人，當和其他 Sacae 部落一樣，在大月氏西徙之後，也臣服於大月氏人。Gasiani 人的一位部酋受封，成爲中國史籍記載的貴霜翖侯。

貴霜翖侯之名得自 Sacae 部落非獨有偶，同爲大夏國五翖侯之一的休密翖侯也得名於 Sacae 部落可以佐證。蓋“休密”[xiu-miet] 得視爲 Kumidae 之對譯。據托勒密《地理志》（VI，13）記載，Comediae 係 Sacae 部落之一。可見 Strabo 所載不過其犖犖大者。

之所以指貴霜爲 Gasiani，最重要的還在於因爲“貴霜”和“月氏”[njiuk-tjie] 得視爲同名異譯。貴霜和月氏或大月氏應該是同源異流關係。只有肯定這一點，漢文史籍的有關記載纔能夠得到合理詮釋。

其一,《後漢書・西域傳》載丘就卻、閻膏珍立國後“國號貴霜王”，且“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唯獨“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固然丘就卻在攻滅其餘四翖侯時可能打著其宗主“大月氏”的旗幟，但立國後顯然已經沒有這個必要，事實上也另有國號爲《後漢書》記錄。[15] 東漢依舊稱之爲“月氏”或“大月氏”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月氏”和“貴霜”是同名異譯。

《魏略・西戎傳》稱:“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並屬大月氏”。《史記》“正義”引康泰《外國傳》:“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大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也”。按之時代，兩書所謂“大月氏”和“月氏”皆指貴霜無疑，可以佐證。

其二,《三國志・魏明帝紀》載：太和三年（公元 229 年）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調（Vāsudeva）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氏王”。合理的解釋：東漢稱貴霜爲“大月氏”是得到貴霜人首肯的，在貴霜王波調看來,“大月氏王”與“貴霜王”無異。這似乎不僅表明“月氏”和“貴霜”是同名異譯，而且表明貴霜人和大月氏人同出一源。

貴霜不是月氏人，卻和月氏同名同源，其人就很可能是來自錫爾河北岸的 Sacae 部落 Gasiani。

應予補充說明的是,“月氏”與 Gasiani 得視爲同名異譯，但不能

據以爲 Strabo 所載 Sacae 諸部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所指正是大月氏西遷阿姆河流域事件。

一則，如前所述，大月氏西徙的時間和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滅亡的時間不符。

二則，據《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記載，大月氏乃"過宛"，亦即經由費爾幹那、索格底亞那到達嬀水流域的。這與 Strabo 所載 Sacae 諸部乃來自錫爾河北岸的記載有異。

三則，雖然"月氏"與 Gasiani 可以視爲同名異譯，而且月氏也是一個混雜的部落聯合體，就其淵源而言，很可能也包含若干與 Strabo 所述 Sacae 聯合體相同的部落成份。但大月氏西徙之後，控制巴克特里亞的無疑不是 Asii 或 Tochari。這也與上引 Strabo 與 Trogus Prologues 的記載相悖。

要之，貴霜可溯源於 Sacae 部落之一的 Gasiani。

四

前述 Strabo 所載 Sacae 四部 Asii、G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 之前身似即先秦典籍所見允姓之戎、禺知、大夏和莎車。[16]

關於 Gasiani 之前身禺知,《穆天子傳》卷一有載:"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禺知"[ngio-tie] 與 Gasiani 得視爲同名異譯。一般認爲,"焉居、禺知之平"當在今河套東北。[17]

根據現有資料提供的線索，似可推測：公元前七世紀末葉，Asii、Gasiani 等部已出現在伊犂河、楚河流域。[18] 公元前 623 年，秦穆公稱霸西戎，拓地千里，或者因此引起了 Asii、Gasiani 諸部的西遷。[19] 其中，禺知西遷者可能衹是其小部，留在故地者終於發展成一個強盛的部族，即大月氏的前身——月氏。[20]

公元前 177/176 年，Asii、Gasiani 諸部被西徙的大月氏人逐出伊犁河、楚河流域，西遷至錫爾河北岸，當然也可能是退縮至錫爾河北岸，蓋其人此前已經擴張至錫爾河北岸。約公元前 140 年左右，或許是受其東鄰大月氏之擠迫，Gasiani 乃隨 Sacae 諸部一起南下入侵阿姆河流域。

《漢書・西域傳》載，“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這說明塞種（Sacae）諸部不僅西遷錫爾河北岸，並自該處南下阿姆河流域，且有部分經由葱嶺南下罽賓。進入葱嶺的塞種諸部，不僅分散爲疏勒以西北數國，而且進入塔里木盆地周圍，建立諸綠洲小國。從《漢書・西域傳》保留下來的國名、地名、族名中可以窺見一些蛛絲馬跡。其中，與 Gasiani 人有關者有姑師 [ka（kia）-shei]、車師 [kia-shei]、貴山 [giuət-shean]、休循 [xiu-ziuən]、車延 [kia-jian]、危（鮁）須 [khiai-sio]、高昌 [kô-thjiang] 等。蓋這些名稱與 Gasiani 均得視爲同名異譯。[21]

至於今河套東北的禺知來自何處，我曾經提出一個禺知可以溯源於有虞氏的假說：有虞氏之祖爲顓頊。顓頊始居今四川若水，後東遷窮桑，取代少昊，復隨有虞氏即舜自魯遷至晉南。舜亡後，部分族人踏上遷徙之途，或北上發展爲月氏。當然，也可能其人在舜亡後就有一支經河西抵達伊犁河、楚河流域，成爲 Sacae 之一部。[22]

五

若繼續追溯，不妨認爲四川若水的顓頊氏來自中近東，即見諸楔形文字資料中的 Guti 人。

一說來自波斯西部山地的 Guti 人曾擊敗巴比倫統治者 Narâm-Sin，

主宰巴比倫達百年之久（公元前2100年左右）。除Guti人外，楔形文字資料中另有關於Tukri人的記載。Tukri人的居地從東面和南面與Guti人居地鄰接，兩者關係密切。約公元前三千紀之末，Tukri和Guti一起離開波斯西部，長途跋涉來到中國。中國典籍所見月氏應即Guti人，吐火羅則得名於Tukri。[23]

今案：Guti和Tukri不妨分別和先秦典籍所見月氏或大月氏的前身"禺知"和吐火羅的前身"大夏"勘同。Guti和Tukri東遷的時間也許早於他們和巴比倫的接觸。東來的Guti人中可能有一枝到達四川若水，形成禺知的前身有虞氏之祖——顓頊的部落。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人物雕像群、金杖和金面罩等，形式、風格、功能等完全不同于古蜀本土文化，在同時代的中原地區也找不到形式類似者，卻與屬於地中海文明的青銅器有著十分明顯的聯繫。[2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所出青銅神樹可能就是傳說中的若木。[25]若木與若水關係密切[26]，而若水正是顓頊降生之處，似乎也表明三星堆的主人與顓頊不無淵源。

這當然不是說三星堆遺址就是遷至四川的Guti人留下的遺跡，但這至少是Guti人可能自西亞遠途跋涉到達四川的一個旁證。

六

以下略述與淵源有關的兩個問題：貴霜人的族屬和語言。

（一）族屬：討論這個問題的主要依據是傳世錢幣和塑像所見貴霜諸王（Kujula Kadphises、Wima Kadphises、Kaniṣka和Huviṣka）肖像反映的體貌特徵。對此，歷來見仁見智。或者從中看出了突厥屬性，[27]或者從中找到了伊朗因素，[28]等等。其實，根據錢幣等所見體貌特徵不足以判定其人民或王族的族屬。蓋貴霜人在其漫長的遷徙途中，勢必

經歷一個種類糅雜的過程。而如所周知，最短只需一代人的時間，混血就可以改變體貌特徵。因此，對於判斷族屬，錢幣所見貴霜諸王肖像只能僅供參考而已。

文獻中有關的記載也是不清楚的：

1.《史記·大宛列傳》："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顧，善市賈，爭分銖"。《漢書·西域傳》所載略同。案：這是張騫首次西使所親見，應當可信。不言而喻，"自大宛以西至安息"既包括征服了大夏的大月氏，也包括被大月氏征服的大夏國人亦即 Sacae 諸部。但這也不過說明在張騫西使的時代大月氏和包括 Gasiani 部落在內的大夏人之體貌特徵而已。

2.《史記·大宛列傳》"大月氏"條張守節正義引萬震《南州志》："[大月氏]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按之時代，這裏的"大月氏"乃指貴霜。所述"赤白色"人民，既"便習弓馬"，似乎並非貴霜治下巴克特里亞土著，而是指作爲征服者的貴霜人。當然，降至《南州志》描述的時代，這類觀察對於判定貴霜人的族屬已無多大價值。

至於宗教、習俗（服飾等）或官稱號等，均可傳播、改變或借用，對於判斷族屬的作用更小，在此不予論列。

儘管如此，考慮到貴霜前身很可能遷自波斯西部，則無妨據以上兩類資料斷其人爲歐羅巴種。

（二）語言：這裏有兩層含義。其一，貴霜王朝使用的官方語言。其二，貴霜人的原始語言。前者有貴霜王朝的錢銘和碑銘爲證，主要爲希臘文書寫的巴克特里亞語，以及婆羅謎文、佉盧文書寫的梵語和俗語。另有一種未知文字書寫的未知語言，根據較可信的意見，其文字、語言和佉盧文、和闐塞語有密切聯繫。[29] 而既如前述，貴霜和月氏

是同源異流的關係，最初兩者應有相同的語言。

今案：貴霜人和月氏人的原始語言很可能是歷史語言學家所說 Toχrï（吐火羅語），[30] 更可能是吐火羅語的乙種方言，即龜兹語。

1. 月氏的前身 Guti 和吐火羅之前身 Tukri 關係密切，兩者很可能有共同的語言。也就是說均操吐火羅語。[31] 只是由於後來際遇不同，兩者分道揚鑣，才形成不同的方言。

2. 乙種吐火羅語的使用者自稱其語言爲 küšan 語，有關文書又多出土於龜兹，küšan 與“龜兹”無疑是同名異譯，故乙種吐火羅語其實應稱爲龜兹語。“龜兹”[khiuə-tziə]、“貴霜”、“月氏”、Gasiani 均得視爲同名異譯。龜兹人當爲 Gasiani 之一支、在塞種諸部被月氏逐出伊犂河、楚河流域，經葱嶺南下時東向進入塔里木盆地。

3. 現存若干與月氏或貴霜有關的語詞可以用吐火羅語解釋，[32] 堪作佐證。

4. Gasiani 人建立貴霜國後不取吐火羅語爲官方語言（錢幣和碑銘），而采用希臘文書寫的巴克特里亞語等不過入鄉隨俗而已。考慮到貴霜之前身 Gasiani 與 Sacae 諸部的關係，使用與和闐塞語相似的語言也不難理解。唯獨進入塔里木盆地周邊若干綠洲的 Gasiani 人由於環境閉塞等原因保留了原始語言也不足爲奇。

或將若干與貴霜或月氏有關的語詞用突厥語詮釋，因而斷貴霜爲突厥語族。[33] 今案：其說未安。

《周書・突厥傳》稱“突厥之先，出於索國”。“索”[sheak] 可能是 Sacae 之對譯。[34] 也就是說突厥之先與 Sacae 本來就有某種淵源也未可知。果然，若干貴霜用語和稱號可以用突厥語詮釋也不難理解。《諸王流派》（Rājataraṅgiṇī，I，170）[35] 提到：乾陀羅（Gandhāra）的突厥（Turki）統治者聲稱其祖先爲迦膩色迦（Kanishka），也許不全是一種攀附行爲。

或因貴霜人有若干用語與印度 Sacae 人相同、特別是某些用語可以用所謂和闐塞語詮釋而斷貴霜爲伊朗語族。[36] 今案：其說亦未安。

一則，貴霜雖係 Sacae 之一支，但後者是一個至少由四個部族，即 Asii、G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 組成的部族聯盟。四者中無疑有操伊朗語者，也有操伊朗語之外的印歐語者，例如 Tochari 人。說者所指古代印度與和闐地區的 Sacae 人未必便是 Gasiani 人。

二則，從 Asii 諸部的故地、遷徙過程等等方面來看，彼此關係頗爲密切，他們的若干用語（特別是官稱號）有可能完全相同。因此，不能因爲這些共同用語的發現而斷使用者屬於同一語族。

三則，操吐火羅語諸部和伊朗語諸部既有密切接觸，若干與貴霜有關而能夠用伊朗語詮釋之詞彙，安知原來不是吐火羅語？只是傳世吐火羅語文獻數量有限，年代較晚，不能提供證據而已。

七

以上有關 Gasiani 的溯源無非是利用現有資料所作的一種嚐試。顯然，這裏指出的決不是唯一的可能性。譬如自錫爾河北岸南下參與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 Gasiani 人，未必就是來自東方的禺知人，不能排除他們是 Guti 人東遷時留在中亞的可能性。也許正因爲如此，這些 Guti 或 Gasiani 人很早就不會說 küšan 語了。本文強調前述可能性而不是其他，無非因爲這一種較有資料基礎而已。

■ 注釋

1 關於五翖侯治地的方位，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pp. 29—32。

2 關於五翖侯係大夏國人的考證，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32—37。

3 關於張騫西使，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pp. 203—220。

4 關於大宛國的位置，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70—71。

5 關於大夏國都藍市城的地望，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20—30。

6 參看 K. Enoki，“The Yüeh-shih-Scythians Identity，A Hypothesis，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istor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acts.” *Collection of Papers Presented*，Compiled by the Japanes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1957，Tokyo，1959，pp. 227—232。

7 W. W. 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Combridge，1951，pp. 272—273；A. K. Narain，*The Indo-Greeks*，Oxford，1957，p.141.

8 *The Geography of Strabo*，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L. Jones，London，1916.

9 引自注 7 所引 W. W. Tarn 書，p. 286；注 7 所引 A. K. Narain 書，p. 129。

10 S. Konow，*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Vol. II，Part I，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Calcutta，1929，p.lviii，認爲 Trogus Prologues 關於 Asii 成爲 Tochari 王族的記載正可印證中國史籍關於大月氏征服大夏（Tochari）的記載。今案：將 Asii 比定爲月氏並無任何根據。Strabo 和 Trogus 所記 Asii（Asiani）進入巴克特里亞時，大月氏尚在伊犂河、楚河流域，兩者名稱不同，事蹟亦無可比附。至於所謂 Asiani 是 Tochari 之王族不過表明 Asiani 是它和 Tochari 人組成的聯盟的宗主而已。事實上，這一聯盟還包括 Gasiani 和 Sacarauli（Saraucae），後者在進入巴克特里亞後可能在與其他部族的鬬爭中失敗而被殲滅，故有 Trogus 的上述記載。而 Bactria 最後被稱爲“大夏”，也許是因爲 Tochari 人數衆多的緣故。

11 *Geography of Claudius Ptolemy*（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Edited by E. L. Stevenson，New York，1932）稱 Tochari 爲 Bactriana 一大族（VI，11），又載 Sogdiana 有 Tochari 人（VI，12），可以參證。

12 B. N. Puri，*Indian under the Kushāṇa*，Bombey，1965，pp. 5—8，指出：很可能在月氏征服巴克特里亞之前，該地已爲大夏即吐火羅人佔領。Tochari 應即 Matsya、Vāyu 和 Brahmāṇda 等往世書，以及《羅摩衍那》(Rāmāyaṇa)、《摩訶婆羅多》(Mahabhārata）等所見 Tushāra 或 Tukhāra。據云，其人居住在喜馬拉雅山以北，乃一外來種族。貴霜應爲 Tukhāra 部落（翎侯）之一，對於印度人來說，其名以 Tukhāra 著。今案：論者據印度史料證明貴霜翎侯乃大夏國人，近是。

13 M. Tezcan，“Origin of the Kushans.” *The Turks* 1（2002），pp. 250—270，808—814，試圖從錢幣、碑銘、語言、考古、曆法、文獻等方面證明貴霜與

Sacae 的關係，可以參看。

14 J. Marquart, *Ēānšahr*, Berlin：1901, p. 206.

15 丘就卻所謂“滅濮達”便是推翻其宗主大月氏，一統巴克特里亞。“濮達[pôk-dat]”乃 Bactria 之對譯。

16 說見余太山《古族新考》，中華書局，2000 年。

17 見王貽樑《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pp. 22—23。

18 Asii、Gasiani 等四部佔有伊犁河、楚河流域是公元前七世紀末一次波及整個歐亞草原的民族大遷徙的結果。希羅多德（IV, 11, 13）利用不同來源的資料記述了這次民族大遷徙：Issedones 戰勝了 Massagetae 人，後者又戰勝了 Scythia，迫使 Scythia 人侵入了奇姆美利亞人的居地。參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6—10。

19 秦人伐戎引起希羅多德所載歐亞草原民族大遷徙，說見馬雍、王炳華“公元前七至二世紀的中國新疆地區”，《中亞學刊》第 3 輯，中華書局，1990 年，pp.1—16。

20 詳見注 16 所引余太山書，pp. 38—45。

21 詳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210—215。

22 同注 16。

23 W. B. Henning,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In G.Ulmen, ed.,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Paris, New York, 1978, pp. 215—230.

24 段渝“論商代長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銅文化與華北和世界文明的關係”，《東南文化》1993 年第 2 期，pp. 1—22。

25 徐朝龍“中國古代‘神樹傳說’的源流”，《扶桑與若木——日本學者對三星堆文明的新認識》，巴蜀書社，2002 年，pp. 205—228。

26 《山海經 · 海內經》：“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

27 例如：R. G. Bhandarkar, “A Peep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Maurya Dynasty to the Fall of the Imperial Gupte Dynasty (B.C. 322— c. 500 A.D.).” *Journal of the Bombay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 (1902), pp. 355—408, esp. 372—386 (the Imperial Śakas). J. Kennedy, “The Secret of Kanishk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2, pp. 665—688。

28 注 10 所引 S. Konow 書，pp. l—li。

29　J. Harmatta,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 the Kushan Empire." In J.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UNESCO, 1994, pp. 417—440. 徐文堪、芮傳明譯《中亞文明史》第二卷，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2 年, pp. 316—354。

30　詳見余太山"吐火羅問題",《歐亞學刊》(國際版)第 1 期(總第 11 期)，商務印書館, 2011 年, pp. 259—285。

31　同注 23。

32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6, pp. 9—39.

33　突厥說的簡介和批判参見注 13 所引 Tezcan 文。

34　見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載《白鳥庫吉全集》卷六，岩波, 1950 年, pp.120—288。

35　M.A. Stein, *Kalhaṇa's Rājatarangṇī*. Vol. I, Delhi, 1961.

36　遠者如:S. Konow, "Notes on Indo-Scythian Chronology."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 12(1934), pp.1—46。近者如注 12 所引 B. N. Puri 書, pp. 1—5; 注 13 所引 Tezcan 文。

二　貴霜王朝的創始人——丘就卻

據《後漢書·西域傳》，貴霜王朝是由貴霜翖侯丘就卻創建的：

> 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肹頓、都密，凡五部翖侯。後百餘歲，貴霜翖侯丘就卻攻滅四翖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丘就卻，一般認爲其人卽印度 Kushāṇa 錢銘所見 Κοζουλου Καδφιζου 或 Κοζολα Καδαφες。[1] 一說“丘就卻”其實應作“丘就劫”，蓋“卻”亦可寫作“却”，而“却”與“劫”形似易誤。[2] 今案：“丘就卻”[khiuə-dziuk-kiak] 已可視爲 Kaju[la] Ka[dphises] 之對譯，“卻”與“劫”[kiap] 音近，毋需改字。[3]

貴霜王朝的前身應爲役屬大月氏的大夏國“小長”之一——貴霜翖侯，則貴霜人可溯源於大夏。約公元前 140 年左右，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亡於入侵的 Sacae 諸部。中國史籍稱被 Sacae 侵佔的巴克特里亞爲“大夏”。質言之，貴霜可溯源於 Sacae 諸部，具體而言，貴霜可溯源於 Sacae 部落之一的 Gasiani，而 Gasiani 與大月氏之前身均可溯源於有虞氏。因此，貴霜和大月氏是同源異流的關係。[4]

一

丘就卻的事業始於貴霜翖侯。貴霜翖侯始載於《漢書·西域傳上》：

> 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二曰雙靡翖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翖侯，治護澡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肹頓翖侯，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

其中貴霜翖侯所治護澡城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載"鉗敦"，蓋據《魏書·西域傳》：

> 鉗敦國，故貴霜翖侯，都護澡城，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人居山谷間。

"鉗敦"，應即《大唐西域記》卷一二所載達摩悉鐵帝之都城"昏馱多"。鉗敦、昏馱多均爲Kandūd之對譯，地在Wakhan西部Āb-i Panja河左岸，唐時爲達摩悉鐵帝之一部。《魏書》稱其地"在折薛莫孫西"，"西"或係"北"之誤。"護澡"[hak-tsau]或即"貴霜"（Kushan）之異譯。[5]

《漢書・西域傳上》所載五翖侯治地均位於原大夏所領東部山區。因此，不妨認爲大月氏入侵巴克特里亞後，將西部特別是 Bactra 周圍地區置於自己直接控制之下，而通過五翖侯間接統治東部山區。[6]

或以爲貴霜翖侯的治地應在 Khalachayan 遺址。[7] 今案：該遺址位於今烏茲別克斯坦 Surxondaryo 省 Denov 附近、Surkhan Darya 谷地。其地既在阿姆河北岸，毋寧說是一處大月氏人的遺址，似乎很難指爲貴霜翖侯之治地。雖然玄奘述覩貨羅故地形勢稱"縛芻大河中境西流"，似乎河北亦大夏地，但大月氏西君大夏，最初設王庭於河北，故所置翖侯更可能在河南之地。當然，此說主要缺點還在於不若舊說有文獻基礎。另說：貴霜翖侯治地在 Wakhsh 河下游。[8] 今案：此說存在的問題和前說相似。

貴霜翖侯以及其餘四翖侯初置之年已不可考，這裏只能臚列兩種可能性。

1.《漢書・西域傳上》所載五翖侯可能都是原大夏國"小長"，在大月氏人征服大夏國後，得到征服者的承認而繼續存在。蓋遊牧部族往往在征服一個地區後並不消滅、而是通過操縱原有的政權控制該地區。果然，貴霜等五翖侯出現的時間上限應爲公元前 140 年，亦即包括 Gasiani 在內的塞種諸部自錫爾河南下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之年。

2. 大月氏征服大夏後，也可能按照原大夏國"小長"林立的形式，另立五個親大月氏的大夏人爲翖侯，通過他們統治原大夏國的部分地區。果然，則"屬大月氏"的貴霜等五翖侯出現的時間上限應爲大月氏征服大夏之年，即公元前 129 年。

或以爲:《史記・大宛列傳》載大夏國"其都曰藍市城",《漢書・西域傳上》則載:"大月氏國，治監氏城。""監氏"與"藍市"形近音似，當爲一地。這表明直到《漢書・西域傳上》描述的時代，大月氏才完成了對大夏的征服，以大夏國都爲王治。《漢書・西域傳

上》取消了“大夏”專條，合并有關事情於大月氏專條之中，也說明了同樣的問題。“五翖侯”既然不見於《史記》，可以認爲直至《史記》完成之時（公元前100—公元前90年）尚未出現。[9]

今案:《史記・大宛列傳》有關大月氏、大夏的記載主要依據張騫的報告，大月氏以大夏國都爲王治一事發生在張騫離開之後，因而未被記錄。但這並不表明大月氏王庭南遷一定發生在《史記》完成之後。也不能因爲五翖侯不見於《史記・大宛列傳》而遽斷他們一定出現於公元前100或公元前90年之後。蓋大月氏人在張騫歸國後不久，遷王治於嬀水之南原大夏國都城，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或以爲:《史記・大宛列傳》僅說大夏“無大君長”,《漢書・西域傳上》卻說“本無大君長”。這表明直至《漢書・西域傳上》描述的時代才出現五翖侯，因爲既稱“無大君長”，又說“有五翖侯”，顯然是不合情理的。[10]

今案：此說亦不妥。因爲“五翖侯”無論在《史記・大宛列傳》或者《漢書・西域傳上》編者的心目中都不是“大君長”。《漢書・西域傳上》著一“本”字，無非是強調大夏地由於被征服已有了“大君長”。“大君長”顯然是指大月氏王。換言之，不能僅據《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上》這一字之差來判斷五翖侯出現的時間。

二

貴霜王朝的創始人是丘就卻，有前節所引《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爲證，似無可疑。但曾有人認爲貴霜王朝的創始人可能不是丘就卻，而是Miaos（亦作Heraios，Heraus，Heraos）。[11] 其說如下：

1. 在大月氏人一度統治過的地區，曾發現一類錢幣。這類錢幣的主人既非希臘人，亦非帕提亞人:Hyrcodes，Spabaris，Sapadbizes，

Phseigacharis 和 Miaos。[12] 其中，僅 Miaos 可以確指爲貴霜統治者，因爲其錢銘提到他是一個 Kossan (a) 即貴霜人。[13] 其餘各位統治者則可能是隨大月氏一同進入巴克特里亞的其他部落的首領。

2. 按之這些錢幣出土地區希臘字母古體的演變過程，Miaos 錢銘所見希臘字母（如 alpha，sigma 和 omicron）的形式表明其在位時間不可能早於公元前一世紀後半葉。

3. 丘就卻以後貴霜王系並無空隙，所以 Miaos 統治貴霜衹能在丘就卻之前。[14]

4. Miaos 的四德拉克瑪銀幣採用的重量標準是雅典標準，而在其治期（不可能早於公元前一世紀後半葉），興都庫什山以南、東南和西南的造幣廠均不採用這一標準，可見 Miaos 的錢幣是在興都庫什山以北打鑄的。這些錢幣也不可能是在索格底亞那和阿姆河北岸大月氏的領土上打鑄的，因爲這些地區的錢幣所採用的重量標準與 Miaos 的四德拉克瑪銀幣所採用的嚴格的雅典標準是稍有不同的。Miaos 的四德拉克瑪銀幣呈現出早期巴克特里亞錢幣的影響，其特徵見諸巴克特里亞希臘諸王如 Eucraides 一世和 Heliocles 等人之錢幣。

5. 在 Miaos 的四德拉克瑪銀幣上所見稱號之一爲 Turannountos，這可能表示獨裁者的身份。希臘語 Turannountos 和 Turannos 分別意指在“獨裁者的治期”和“不受法律和憲法限制的獨裁者”。[15]

6.《後漢書・西域傳》在提到丘就卻吞併其餘四翎侯時，並沒有談及他和宗主大月氏的關係的緊張化。這也許是合理的解釋：在丘就卻崛起之前，大月氏（王庭在阿姆河北）已被 Miaos 消滅。

今案：此說似難成立。

《後漢書・西域傳》明載丘就卻是貴霜王朝的創建者，僅憑出土的錢幣不足以否定這一記載。Miaos 完全可能是早於丘就卻的貴霜翎侯，他自己鑄幣，在錢幣上採用 Turannountos 之類稱號等均不能表明

他已擁有名副其實的地位或權勢。至於丘就卻崛起，完全可能挾大月氏王以令諸翎侯，史籍不載丘就卻和大月氏王的矛盾也很正常。

另說：[16] 歷來對於 Miaos（Heraus）錢幣的發行者的推測基於對錢銘的誤讀。若將 Heraus 的錢銘對照與之密切相關的 Eucratides 的錢銘，按 Eucratides 錢銘文字的排列方式釋讀所謂 Heraus 銀幣的銘文，則能得到一種全新的理解：

在四德拉克瑪銀幣銘文所見 TYPANNOYNTOΣ HIAOY 和 KOPPANOY（即 Kushan）分別應是發行者的稱號和名字。同樣，obol 銀幣銘文所見 HIA (I) OY 和 KOPPANOY 也分別應是這位發行者的稱號和名字。這樣，HIA (I) OY 一詞就相當於“王”，而 TYPANNOYNTOΣ 應該是一個描述“王”的形容詞。HIA (I) OY 或許類似於 Kujula Kadphises 錢銘所見非希臘稱號 ZAOOY。

至於錢銘所見 Kushan 其實是人名，指發行者亦即 Kujula Kadphises 本人。這樣的用例並不限於所謂“Heraus”錢幣，亦見於 Azes 紀元的 122 年的 Taxila 銀冊銘文 [17] 和 136 年的 Panjtar 銘文，[18] 又見於 Wima 的 Māṭ 銘文 [19]。

今案：Heraios 錢幣發行者爲丘就卻本人，作爲一種可能性不能排除，但目前證據尚嫌不足。尤其是指錢銘所見 Kushan 爲人名，難以令人首肯。

首先，完全沒有必要將 122 年銘文所見“maharayasa Gushanasa”和 136 年銘文所見“mahārājasa rajatirajasa devaputrasa Khushanasa”中的 Gushanasa 視爲人名。至於 Wima 的 Māṭ 銘文所見閻膏珍自稱“Kushanaputro”（貴霜之子）也合乎情理，沒有必要將“Kushana”讀成“Kujula Kadphises”。

其次，如果這些銘文上的“Kushan”一詞都是人名，則何來國名或族名？《後漢書・西域傳》關於丘就卻自號“貴霜王”的記載也就

無法落實。“貴霜”一名蓋得自 Sakā 部落之一 Gasiani，Gasiani 在公元前 140 年左右隨同 Sakā 其他各部落一起入侵 Bactria。貴霜翖侯即其後裔。即使拋開這層關係不說，也應該看到：第一位貴霜翖侯登上歷史舞臺的時間上限可能是公元前 130 年，亦即大月氏西遷巴克特里亞之年。實際上，五翖侯“屬大月氏”的局面應該形成於丘就卻崛起之前“百餘歲”，也就是說，不存在“貴霜”一名得自丘就卻本人的可能性。

要之，“貴霜”和“月氏”一樣，是部族名，即使它最初可能得自部酋之名，但時至貴霜翖侯興起之際，不可能再用作人名。

三

丘就卻的生涯可分前後兩個部分：貴霜翖侯和貴霜王。

丘就卻身爲翖侯期間的主要活動是“攻滅四翖侯”。由於資料保持沉默，丘就卻攻滅其餘四翖侯的詳情不得而知。這裏只能考究一下事件發生的大致年代。

按之前引《後漢書・西域傳》，丘就卻“攻滅四翖侯”應在大月氏“遷於大夏”、置五翖侯之後“百餘歲”。大月氏西遷阿姆河流域在公元前 129 年左右。[20] 這一年也可能就是包括貴霜翖侯在內的五翖侯“屬大月氏”這一局面的形成的時間上限。應該指出的是，大月氏未必在“遷於大夏”後立即設置五翖侯。因此，所謂“百餘歲”，確切些說應指五翖侯“屬大月氏”這一局面形成之後“百餘歲”。但究竟是指丘就卻繼任貴霜翖侯的年代，還是指他攻滅四翖侯的年代，無從確指。因此，根據漢文史料，我們衹能籠統地說，丘就卻事業開始的時間上限在公元前 25 年左右。[21]

不妨設想，他之所以能戰勝四翖侯，他很可能是打著其宗主大月

氏的旗號，發動對四翖侯的戰爭的。《後漢書・西域傳》所謂“本其故號”，無疑是本貴霜翖侯的“故號”。[22] 丘就卻在攻滅四翖侯、統一吐火羅斯坦東部地區後自立爲王，表明他已開始和昔日的宗主大月氏分庭抗禮，不復以臣屬自居了。他“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應該是攻滅四翖侯後不久之舉。

有證據表明，丘就卻作爲貴霜翖侯曾與西印度希臘王 Hermaeus 結盟或聯姻，這可能和他戰勝其餘四翖侯有關。

在業已發現的“救世主”Hermaeus 的錢幣中，有一些與 Kujula Kadphises（丘就卻）有關。

這些錢幣可分爲兩類。一類的正面是 Hermaeus 頭像：頭戴王冠，錢銘是希臘文 βασιλέως σοτηρος συ Έρμαίου（偉大的君王 Hermaeus）；反面是 Herakles 正面立像，手執權杖和獅皮，錢銘是佉盧文 Kujula Kasana Kushana yavugasa dhramaṭhidasa（虔誠的貴霜翖侯丘就卻）。另一類的正面是 Hermaeus 胸像，頭戴王冠，錢銘是希臘文 Κορσαν Κοζουλο Καδφισου（貴霜丘就卻），反面與第一類相同。[23] 既稱丘就卻爲 yavuga（翖侯），[24] 這些錢幣頒行於丘就卻攻滅四翖侯、“自立爲王”之前。

這些錢幣上出現 Hermaeus 之名，歷來有三種解釋。一、丘就卻是 Hermaeus 的直接繼承人。[25] 丘就卻和 Hermaeus 之間存在某種結盟的關係。[26] 這些錢幣是丘就卻在 Hermaeus 死後倣製的。[27]

第一種意見有欠妥貼。Hermaeus 的根據地是 Paropamisadae，應即前引《後漢書・西域傳》所謂“高附地”。而據同傳，丘就卻“取高附地”，是“侵安息”的結果，並非直接得自 Hermaeus，可見他不是 Hermaeus 的直接繼承人。

第二種意見亦可商榷。這些錢幣上 Hermaeus 和丘就卻的名號既然一起出現，就不能認爲他們是丘就卻單純的倣製品。如果說這些錢幣

是丘就卻侵入 Paropamisadae 後，爲了表示自己是 Hermaeus 的合法繼承人而頒行的，那末他的稱號便應該是貴霜王，而不應該是貴霜翖侯。《後漢書・西域傳》明載他是在自立爲王之後"取高附地"的。

一些論者之所以否定丘就卻有可能和 Hermaeus 聯合頒行錢幣，主要是因爲他們多以《後漢書・西域傳》的序語爲依據，認定丘就卻生涯的起點在公元 25 年之後，於 Hermaeus 的年代相去甚遠。但正如我業已指出的，《後漢書・西域傳》的有關記載不足以得出這一結論，祇能認爲丘就卻事業開始的時間上限是公元前 25 年。

另外，有的論者將 Hermaeus 的年代斷在公元前 48—公元前 33 年左右。蓋據《漢書・西域傳上》：

> 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

其中，"陰末赴"[əm-muat-phiok] 被比定爲 Hermaeus，"容屈"[jiong-khiuət] 被比定爲 Ἰωνακη（意爲"希臘的"），因而指"容屈王"爲 Hermaeus 之父 Amyntas。於是 Hermaeus（陰末赴）便成了漢元帝時人。[28]

今案：這些比定都是可以接受的。但論者將烏頭勞比定爲 Spalyris、並因而指其子卽被陰末赴所殺者爲 Spalagadames 則有未安。這是因爲《漢書・西域傳上》所傳罽賓國位於乾陀羅（包括呾叉始羅），而沒有證據表明 Spalyris 和其子 Spalagadames 曾佔領過該地；論者指漢代罽賓國爲 Paropamisadae 顯然是錯誤的。[29]

再者，指 Spalyris 爲烏頭勞，無非因爲他在錢銘上使用的稱號爲 ἀδελφοῦ τοῦ βασιλέως（意爲“國王之弟”），而 ἀδελφοῦ 可視爲“烏頭勞”之原語。但是，“烏頭勞”和“陰末赴”兩者同爲人名而非稱號，指前者爲 ἀδελφοῦ 之音譯似有不妥。[30]Spalyris 及其子 Spalagadames 的年代均在元帝即位之前。[31]

因此，我曾提出一個假說：“烏頭勞”[a-do-lo] 應爲 Azes 一世的繼承人 Azilises 一名的對譯，因而 Azilises 之子即被陰末赴所殺者應爲 Azes 二世。Azes 一世無疑佔領過乾陀羅和呾叉始羅，他建元稱王於公元前 58 年即漢宣帝神爵四年，故 Azilises（烏頭勞）很可能已是元帝時人。這與《漢書·西域傳》的記載並無不合。傳文既稱陰末赴“攻罽賓，殺其王”，可見他來自罽賓以外地區，應即 Alexandria-Kapisa；其地曾爲 Amyntas 和 Hermaeus 父子所佔亦可肯定。[32]

既然 Hermaeus 可以被認爲是陰末赴，那末他很可能直至成帝時（公元前 32—公元前 7 年）尚未去世。[33]《漢書·西域傳上》又載：

> 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

“前罽賓王”之“前”乃與“後卒畔逆”之“後”相對而言，不能指陰末赴爲已故罽賓王。“前親逆節”和“今悔過來”者爲同一人，即漢所立陰末赴。[34]

由於成帝時漢與罽賓絕而不通，陰末赴去位之年不得而知。但從時間上看，丘就卻和 Hermaeus（陰末赴）聯合頒行錢幣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換言之，上述第二種意見，如果僅就結論而言，是可取

的。[35] 考慮到作爲貴霜翎侯，丘就卻的領地位於吐火羅斯坦東部山區（Kandūd、Wakhan 西部、Āb-i Panja 河左岸），[36] 他和陰末赴結盟，因而聯合頒行錢幣，似乎表明其時陰末赴已經佔有罽賓卽 Gandhāra 和 Taxila，並試圖北向伸展其勢力。

至於第三種解釋，沒有真正的依據，可以不論。

四

丘就卻自號貴霜王之後，按之《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繼之以“侵安息、取高附地”。[37] 該是指他從 Gondophares 或其繼承者手中奪取 Paropamisadae。[38]

錢幣學的證據表明，最後一位一統喀布爾河全流域（Paropamisadae、Gandhāra 和 Taxila）的希臘王是 Antialcidos，已知他的末年不能早於公元前 129 年。[39] 此後，高附卽喀布爾河上中游流域有可能落入東伊朗的塞人政權卽 Vonones 及其繼承者的勢力範圍。[40] 再後，Amyntas 和 Hermaeus 父子可能在 Azes 一世之後塞人統治相對削弱之際恢復了希臘人對 Paropamisdae 的控制。

一般認爲 Gondophares 來自塞斯坦（今 Seistan），其年代爲 103 年的 Takht-i-Bāhī 銘文 [41] 稱他爲 mahārāja Guduvhara。多數學者認爲這銘文的紀年應按元年爲公元前 57 年的所謂 Vikrama 紀元實卽 Azes 紀元計算，故銘文的年代是公元 46 年。[42] 銘文旣稱這一年是 Guduvhara（Gondophares）在位的第二十六年，可見他卽位於公元 21 年。[43] 很可能就在這一年，Gondophares 佔領了 Paropamisadae。[44]

根據 Takht-i-Bāhī 銘文，Gondophares 至少在位二十六年。他可能在公元 50 年左右去世。[45] 繼位者是 Abdagases 和 Pacores；[46] 但他們統治西北次大陸爲時很短，而且很可能僅僅是名義上的。[47] 因此，丘就

卻很可能是在 Gondophares 去世後不久便發動“侵安息”戰爭的，結果是從後者的繼承人手中奪取了 Paropamisdae。[48]

值得注意的是丘就卻似乎也曾與 Gondophares 結盟。

上述 Takht-i-Bāhī 銘文發現於 Mardān 以西 8 英里的 Takht-i-Bāhī。[49] 銘文提到一位名叫 Kapa 的“王子”（erjhuṇa）。或以爲 Kapa 應讀作 Kap[sh]a，實卽 Kujula Kadphises。[50] 然而，也有人認爲這一詮釋是值得懷疑的：既沒有證據表明 Kapa 是貴霜人，也很難說清楚 Kujula Kadphises 與 Gondphises 的關係。[51]

今案：由於沒有其他佐證，以上兩說孰是孰非無從判斷。若“Kapa”就是 Kujula Kadphises，則可以推知遲至公元 46 年丘就卻尚未稱王。而考慮到丘就卻曾與 Hermaeus（陰末赴）結盟或聯姻，也就不能排除他和 Gondophares 結盟的可能性。果然，丘就卻從翖侯的競爭中勝出，最終成為貴霜王朝的締造者，實非偶然。

五

奪取高附卽 Paropamisadae 之後，丘就卻又“滅濮達、罽賓”。所謂罽賓，如前所述，位於乾陀羅和呾叉始羅，而丘就卻所滅應卽盤踞該地的 Gondophares 政權的殘餘勢力。高附地旣被奪取，罽賓和東伊朗的聯繫完全割斷，丘就卻自不難殲滅之。

一說在 Sirkap 遺址窖藏中包含 Gondophares、Pacores 和 Kujula Kadphises 三者的錢幣，[52] 表明丘就卻從 Pacores 的軟弱的繼承者手中奪取了 Taxila。[53] 今案：Pacores 的錢幣不見於 Paropamisadae，而在 Taxila 有所發現，似乎表明 Gondophares 政權首先丟失的是喀布爾河上中游地區，然後纔是 Gandhāra 和 Taxila。雖然錢幣出土有其偶然性，但這和《後漢書・西域傳》所述丘就卻征服的先後次序倒是符合的。丘就卻很

可能是在 Pacores 治期奪取罽賓的。其時間當在公元 50—60 年間。[54]

至於“濮達”，應卽《漢書・西域傳上》所見“撲挑”，據載：

>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犂靬、條支接。

所謂烏弋山離國，位於 Drangiana 和 Arachosia，其北卽 Bactria。因此，“濮達”[phok-duk] 或“撲挑”[phok-dyo] 均係 Bactria 或 Bactra 之對譯。[55] 烏弋山離與罽賓（Gandhāra）、撲挑（Bactria）、犂靬（Egypt）和條支（Syria）四者領土均不可能相接，故傳文所謂“接”應指交通路線相接。

有人認爲,《漢書・西域傳》既載有大月氏國，便不應再稱 Bactria 爲“撲挑”。[56] 今案：此說未安。在《漢書・西域傳》中,“撲挑”僅僅是地名，而“大月氏國”還表示政治實體，兩者無妨同時出現在一篇傳記中。《漢書・西域傳》有關西域各國的資料來源不一，很可能在描述烏弋山離四至的資料中，採用了“撲挑”這一譯名來表示 Bactria，而《漢書・西域傳》的編者沒有將“撲挑”和“大月氏國”聯繫起來，以致引起後人種種誤解。

“濮達”既然就是《漢書・西域傳》的“撲挑”，指 Bactria，所謂“滅濮達”，便應該是丘就卻對其昔日宗主大月氏發動的一場戰爭。果然，則丘就卻自吐火羅斯坦東部卽原大夏國五翖侯治地起兵，並不南下進攻乾陀羅和呾叉始羅、而西進奪取高附地，不僅是爲了切斷罽賓與塞斯坦的聯繫，而且是爲了便於消滅當時盤踞 Bactra 及其周圍地區的大月氏政權、一統吐火羅斯坦。傳文“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也反映了丘就卻動作的先後。

《後漢書・西域傳》用“濮達”卽“撲挑”指當時佔有 Bactria

中心地區的大月氏國，這是因爲在《後漢書·西域傳》有關貴霜的原始資料撰寫之際，"大月氏"一名已成爲"貴霜"之專稱，於是祇能將丘就卻推翻其昔日宗主大月氏、吞併 Bactria 的戰爭稱爲"滅濮達"了。

《魏略·西戎傳》稱："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並屬大月氏。"其中，罽賓國指 Gandhāra 和 Taxila；大夏國指吐火羅斯坦；高附國指 Paropamisadae；天竺國指被丘就卻的繼承人征服的印度地區。這表明《魏略·西戎傳》所謂"大月氏"應指貴霜王朝無疑。[57]

六

以下銘文和錢幣的證據似乎可以和《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相印證。

1. Panjtār 附近發現的年代爲 122 年的 Panjtār 銘文[58]稱當時在一位 Mahārayasa Gushāṇasa（貴霜大王）的治下。一些學者認爲這位"貴霜大王"便是丘就卻。[59]銘文的 122 年按所謂 Vikrama 紀元計算，應爲公元 65 年。

今案：此說可取。這表明，遲至這一年，丘就卻已佔領了 Taxila。銘文稱丘就卻爲"Mahārayasa Gushāṣasa"很可能就是《後漢書·西域傳》所謂"國號貴霜王"。

2. 有一類錢幣正面是瘤牛和模糊的希臘銘文，反面是一頭巴克特里亞雙峰駱駝，以及略有不同的佉盧銘文：

maharajasa rajatirajasa Kuyula Kaphasa

maharajasa mahatasa Kushaṇa Kuyula Kaphasa

maharayasa rayarayasa devaputrasa Kuyula Kara Kaphsasa

maharayasa rayatirayasa Kuyula Kara Kapasa[60]

其中 Kuyula Kaphasa 與 Kuyula Kara Kapasa 或以爲應即 Kujula Kadphises；[61] 或以爲這些錢幣是丘就卻之子頒發的，當時丘就卻尚未去世，蓋 Kara 即後來突厥斯坦使用的 Kala，意爲“王子”。[62] 還有人認爲 Kuyula Kara Kapasa 是貴霜王室的另一成員，可能是 Pushkalāvatī 州長 Zeionises 的繼承人，與丘就卻之子同時代。[63]

今案：第一說近是。

一則，同類錢幣所見 Kuyula Kaphasa 和 Kuyula Kara Kapasa 應指同一人，而 Kuyula Kaphasa 可以認爲就是 Kajula Kadphises。

二則，錢銘上出現帝號（maharajasa rajatirayasa devaputrasa）表明 Kuyula Kaphasa 和 Kuyula Kara Kapasa 不可能是臣屬。[64]

三則，Kara 出現在 Kuyula 和 Kapasa 之間，似乎很難認爲是稱號（除非將 Kapasa 或 Kaphasa 也看作稱號），也許是丘就卻姓名的一部分，這部分在一些場合往往被省略。還有一種錢幣。和上述錢幣可能屬於同一類，錢銘中王名寫作 Kujula Kara，[65] 或者是略去了最後一部分。

這些使用帝號的錢幣不妨認爲是丘就卻在“滅濮達、罽賓”後頒行的。“滅濮達、罽賓”可以說是丘就卻事業的巔峰。

3. 可以認爲與丘就卻此後活動有關的只有一篇年代爲 136 年的 Taxila 銀冊銘文。該銘文稱當時的貴霜統治者爲 maharajasa rājatirajasa devaputrasa Khushaṇasa（大王、王中之王、天子）。[66] 和 Panjtār 銘文一樣，這篇銘文也沒有提到這位統治者的名字。如按所謂 Vikrama 紀元計算，該銘文的年代是公元 79 年。[67]

一說這位統治者應爲丘就卻，“大王、王中之王、天子”這一更高級的稱號表明當時丘就卻已經鞏固了他的統治。[68] 但也有人認爲這位貴霜統治者應爲丘就卻之子。[69]

今案：應以前說爲是。一則，銘文使用的稱號和可以被認爲丘就卻最後頒行的錢幣上使用的頗爲一致（詳下文）。二則，丘就卻係第一代貴霜君主，在他之前並沒有其他貴霜統治者自建王號，不載姓名，不致引起誤解。[70]Panjtār 銘文沒有提到丘就卻的名字，恐怕也可以這樣去理解。

七

根據以上的分析，丘就卻活動年代的上限是公元前 25 年，下限是公元 79 年。《後漢書・西域傳》稱："丘就卻年八十餘死。"設丘就卻享年八十又五，去世於公元 80 年，則其生年當爲公元前 5 年。

如果丘就卻年 20 歲任翖侯（公元 15 年），這一年也是丘就卻和 Hermaeus（陰末赴）結盟或聯姻的時間上限。

丘就卻若和 Gondophares 結盟，時間上限爲公元 20 年，下限是公元 46 年。

丘就卻滅其餘四翖侯應該在和 Hermaeus 結盟或聯姻之後，取高附地（Paropamisadae）則在公元 50 年 Gondophares 去世後不久。[71]

至於滅濮達（Bactria）、罽賓（Taxila）則在公元 64 年之前。

以下是對於以上丘就卻生涯考訂的若干補充説明：

1. 大月氏"遷於大夏"後沒有立即設置五翖侯。如果從丘就卻任翖侯之年上推，《漢書・西域傳》所載五翖侯"屬大月氏"局面的出現在公元前一世紀九十年代。

換言之，當大月氏於公元前 130 年征服大夏時，雖然控制了嬀水以南的大夏地，但主要是原大夏國都城"藍市城"即 Bactra 及其周圍地區，其勢力一時未能深入吐火羅斯坦東部山區。直至大約四十年後，大月氏人纔通過扶植包括貴霜翖侯在內的大夏國五翖侯控制該處。

2. 前引《後漢書・西域傳》所謂“後百餘歲”似乎是指丘就卻任翖侯的時間，而不是丘就卻“攻滅四翖侯”的時間。

3. 按之前引《後漢書・西域傳》原文，似乎丘就卻在“攻滅四翖侯”後便自稱貴霜王，而碑銘的證據似乎表明丘就卻是在奪取 Paropamisadae 之後才稱王的。孰是孰非，需要進一步的證據。

4.《魏略・西戎傳》有載：“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72] 或據以爲：至遲在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 2 年），丘就卻已攻滅四翖侯，自號貴霜王。[73]

今案：此說未安。一則，丘就卻自號貴霜王不可能發生在公元前 2 年。二則，細讀《後漢書・西域傳》有關文字，不難發現漢人稱貴霜王朝爲“大月氏”是在丘就卻“滅濮達、罽賓”之後。客觀上，伊存並非貴霜人，應該是征服了大夏的大月氏人。公元前 130 年佔領大夏地的大月氏國，地處東西交通要衝，佛教傳入其國，其王皈依，亦情理中事。

除上述與 Hermaeus 聯合頒行的錢幣外，丘就卻還有一類錢幣被認爲和判斷他的年代有關。這種錢幣正面的頭像摹倣一位羅馬皇帝。[74] 一般認爲，這位皇帝是 Augustus（公元前 27 年—公元 14 年）。[75] 但也有人認爲，這位皇帝應該是 Claudius（公元 41—54 年），因爲錢幣反面藉用了 Claudius 錢幣反面的圖案（坐在椅上的 Constantia）。[76]

今案：儘管如此，丘就卻的一些錢幣和 Augustus 的確實非常相似，這似乎表明丘就卻的鑄幣師摹倣的對像不止一個。[77] 而無論丘就卻的錢幣摹倣的是 Augustus 還是 Claudius，與以上推定的丘就卻的年代均無出入。[78] 卽使丘就卻的錢幣摹倣 Augustus 的，也不等於丘就卻與 Augustus 同時代。[79]

要之，根據現有資料，不妨認爲丘就卻生於公元前 5 年左右，公元 15 年左右卽貴霜翖侯之位。他一度與希臘王 Hermaeus 結盟，在

Hermaeus 的支援下，他攻滅了其餘四翎侯，又乘 Gondophares 去世之機，奪取了高附地。接著，他推翻了昔日宗主大月氏，一統吐火羅斯坦，並在公元 60 年左右佔領 Gandhāra 和 Taxila，貴霜王朝於是成立。[80]

■ 注釋

1 A. Cunningham，“Coins of the Indo-Scythians.” *Numismatic Chronicle*, Series 3，8(1888)，pp. 199—248；B. N. Mukherjee，*The Kushāṇa Genealogy.* Calcutta：Sanskrit College，1967，p. 93，n. 24.

2 P. Pelliot，“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e.” *T'oung Pao* 26 (1928—1929)，pp. 201—203；E. G. Pulleyblank，“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n. s. 9(1962)，p. 109.

3 關於“丘就卻”一名的含義，參見 N. Sims-Williams，“Further Notes on the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Rabatak，with an Appendix on the Names of Kujula Kadphises and Vima Taktu in Chinese.” In：*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European Conference of Iranian Studies，held in Cambridge，11th to 15th September 1995*，Part 1(Old and Middle Iranian Studies). Edited by Nicholas Sims-Williams，Wiesbaden，1998，pp. 79—96，此處存而不論。

4 詳見本書第一章。

5 參見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第六卷)，1970 年，pp. 97—227；J. Markwart，*Ērānšahr. Berlin*，1901，pp. 245—246。後者認爲鉗敦位於今 Kunar 河與 Panğsir 河之間；似誤。又，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中華書局，1981 年，pp. 223—224，以爲“護澡”應卽 Kunduz。今案：Kunduz 不在“山谷間”；岑氏說全置《魏書・西域傳》不顧，似欠妥。又，注 2 所引 E. G. Pulleyblank 文，p. 222，以爲“護澡”係 Waxšab 之對譯。今案：其說非是。

6 關於大夏國諸翎侯治地的位置，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pp. 30—32。

7 A. K. Narain，“The Five Yabgus of the Yueh-chih.” *Indian：History and Thought.* Edited by S.N. Mukherjee. Calcutta：1982，pp. 174—185.

8 Frantz Grenet，“Nouvelles Données Sur la Localisation des Cinq *Yabghus* des Yuezhi，L'arrière Plan Politique de L'itinéraire des Marchands de Maès

Titianos." *Journal Asiatique* 294—2(2006), pp. 325—341.

9 A. N. Narain, *The Indo-Greeks*. Oxford, 1957, p.140.

10 O. Maenchen-Helfen, "The Yüeh-chih Problem Re-Examine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45 (1945), pp. 71—84.

11 B.N. Mukherje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Kushana Empire.* Calcutta, 1988, pp. 24—29.

12 P. Gardner, *The Coins of the Greek and Scythic Kings of Bactria and India in the British Museum*. Argonaut, Inc., Publishers Chicago, 1966, pp. 117, 119.

13 W.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p. 505, 指出 Miaos 在他自己的錢幣上自稱是貴霜人。

14 注 1 所引 B.N. Mukherjee 書, p. 44。

15 注 1 所引 B.N. Mukherjee 書, p. 121, n.3。

16 J. E. Cribb, "The 'Heraus' Coins: Their Attribution to the Kushan King Kujula Kadphises, c. A. D. 30—80." In *Essays in Honour of Robert Carson and Kenneth Jenkins*, ed. by Martin Price, Andrew Burnett and Roger Bland, London, 1993, pp. 107—134.

17 S. Konow,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II, Part I, *Kharoshṭhī Inscriptions*. Calcutta, 1929, pp. 67—70.

18 注 17 所引 S. Konow 書, pp. 70—77。

19 H. Lüders, *Mathuā Inscriptions*. Gottingen, 1961, p. 135.

20 詳見注 6 所引余太山書, pp. 57—59。

21 注 11 所引 B. N. Mukherjee 書, p. 24, 以爲張騫所傳不見五翖侯, 知其時(公元前 130—129 年)五翖侯尚未出現。貴霜翖侯丘就卻滅四翖侯在五翖侯出現後百餘年, 則不得早於公元前 30—29 年。今案: 就結論而言, 此說不誤, 但說者以爲包括貴霜翖侯在内的五翖侯均係大月氏人則未安。

22 參看注 6 所引余太山書, pp. 32—37。

23 注 12 所引 P. Gardner 書, pp.120—122; 注 13 所引 W.W. Tarn 書, p.503。

24 S. Konow, "Notes on Indo-Scythian Chronology."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 12(1933), pp. 1—46.

25 注 12 所引 P. Gardner 書, p. xlviii; E. J. Rapson, *Indian Coins*.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 Strassburg, 1898, p.16; J. E. van Lohuizen-de Leeuw, *The Scythian Period*. Leiden, 1949, pp.362—364, 說略同。

26　注 17 所引 S. Konow 書, p. lxiv. 案:S. Konow 後來放棄了這一看法，見注 24 所引文。注 13 所引 W.W. Tarn 書, pp. 503—507，以爲丘就卻與陰末赴聯合鑄幣說明兩者有聯姻關係。丘就卻入侵 Paropamisadae，旨在宣稱他作爲該地世襲統治者的合法性。今案：說者以爲陰末赴領有 Paropamisadae，非是。

27　例如:F. W. Thomas,“Sakastana, Where dwelt the Sakas Named by Darius and Herodotu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6, pp. 181—200, 認爲 Hermaeus 並不是由丘就卻直接繼承的，兩者之間隔著一段 Pahlavas 統治時期。又，注 13 所引 W. W. Tarn 書, pp. 503—507，認爲丘就卻的一位祖先曾與 Hermaeus 聯姻。丘就卻入侵 Paropamisadae 後，爲向那裏的希臘人表示他不是外國人，而是 Hermaeus 的合法繼承人，纔頒行了這種錢幣。其他如 E. J. Raps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I. Cambridge 1951, p.582；注 9 所引 A. K. Narain 書, pp.159—160。 B. N. Puri, *India under the Kushāṇas*. Bombay, 1965, p.17，等說略同。

28　注 13 所引 W. W. Tarn 書, pp.338—341, 503—507。W. W. Tarn 說本 A. Wylie,“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ian and Ireland* 10 (1881), pp. 20—73; A von Gutschmid, *Geschichte Irans und seiner Nachbarländer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zum Utergang der Arsacidem*. Tübingen, 1888, pp.109—110; O. Franke, *Beiträge aus chinesischen Quellen zur Kennitnis der Türkvölker und Skythen Zentralasiens*. Abhandlungen der Kön, Preussischen Akad. der Wissenschaften, 1904, p. 63。

29　除注 13 所引 W. W. Tarn 書, pp. 339—441, 469—473，指“罽賓”爲 Paropamisadae 外, E. Chavannes,“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 lio.” *T'oung Pao*, Series 2, 6 (1905), pp. 519—571（馮承鈞漢譯文載《西域南海史地譯文考證譯叢七編》，中華書局, 1957, pp. 41—57），以爲自漢至北魏，罽賓均指 Kashmir，僅在唐代指 Kāfiristān。注 27 所引 E.J.Rapson 書, pp. 566—567，以爲罽賓指 Kapisa (Kāfiristān)。又，注 17 所引 S. Konow 書, pp. xxiii—xxiv，同意 O. Franke 的看法（見注 28 所引書），以爲中國人對罽賓的位置從未有過清楚的概念。今案：諸說均有未安。漢代罽賓國的中心地區爲乾陀羅（包括 Taxila）殆無疑義。見注 6 所引余太山書, pp. 144—146。

30　參看注 9 所引 A. K. Narain 書, pp.154—155。

31 參看注 6 所引余太山書，pp.171—174。

32 參看注 6 所引余太山書，pp.154—157。

33 Hermaeus 之年代，尚有二說：1. 約公元前 90—70 年，見 O. Bopearachchi，"The Euthydemus Imitations and the Date of Sogdian Independence." *Silk Road Art and Achaeology*，Vol. 2，The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Kamakura（1992），1—21. 2. 公元前 95—80 年，見 R. C. Senior，*The Coinage of Hermaios and Its Imitations Struck by the Scythians*. 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Lancaster，2000，p. 3。今案：兩說未安。

34 L. Bachhofer，"On Greeks and Śakas in Ind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1（1941），pp. 223—250，認爲 Hermaeus 錢幣上的肖像表明他有一個非常長的治期。他初登王位時非常年輕（見注 12 所引 P. Gardner 書，pl.xv/5），而在那些被認爲是他最後頒行的錢幣上，他的肖像表明他已是一個老人（見 R. B. Whitehead，*Catalogue of Coins in the Punjab Museum*，I. Lohore，1914，pl. ix/682）。因此，Hermaeus 自公元前 30 年左右至公元一世紀二十年代在位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今案：如果 Hermaeus 可以比定爲陰末赴，那末他即位時間的下限應爲公元前 33 年。

35 注 17 所引 S. Konow 書，p. lxiv，以爲丘就卻曾侵入安息即帕提亞波斯位於 Kabul 或其附近的領土，乃與 Hermaeus 結盟。後來，丘就卻取 Hermaeus 而代之，完全佔領了 Kabul。今案：其說未安。一則，丘就卻在"侵安息，取高附地"之前已自號貴霜王。二則，丘就卻取高附地自"安息"而非得諸 Hermaeus。

36 參看注 6 所引余太山書，pp. 29—32。

37 注 13 所引 W.W. Tran 書，p. 281，以爲"安息"應爲 Antioch 之音譯，其地即是 Antioch-Merv。其理由是張騫報告中涉及的全部國名無一得自王名，舊說以"安息"係 Arshak 之對譯者非是，而《後漢書・西域傳》亦稱木鹿即 Merv 爲"小安息"。今案：其說非是。蓋據《漢書・西域傳》知安息都城去東界爲"數千里"，而《後漢書・西域傳》稱木鹿爲安息"東界"，可見"安息"不可能是 Antioch-Merv。木鹿既被稱爲"小安息"，則顯然有別於安息。參看注 6 所引余太山書，pp. 174—178。

38 注 17 所引 S. Konow 書，p. lxii。案：Begrām 出土了大量 Gondophares 的錢幣，但沒有他的繼承者的錢幣。這似乎表明喀布爾河谷在 Gondophares 死後不再由他的後人統治。又，D.W. MacDowall，"Implications for Kushan Chronology of the Numismatic Context of the Nameless King." In

B.G. Gafurov; G.M. Bongard-Levin; E. A. Grantovsky; L. I. Miroshnikov; B.Y. Stavisky, ed., *Central Asia in the Kushan Period*, I. Mockva, 1974, pp. 246—264, esp. 248—249, 以爲 Kabul-Gardez 出土的錢幣中, Hermaeus 之後是 Gondophares, 證實了《後漢書·西域傳》關於丘就卻“侵安息, 取高附地”的記載。

39 H. Raychaudhuri, *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 Calcutta, 1953, pp. 438—439.

40 注 13 所引 W. W. Tarn 書, pp. 331—332。注 9 所引 A. K. Narain 書, pp. 153—154, 則以爲 Antialcidas 是由 Hermaeus 之父 Amyntas 直接繼承的。

41 注 17 所引 S. Konow 書, p. 57。

42 J. Marshall, “Excavations at Taxila, 1912—1913.” *Archea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Annual Report*, Calcutta 1916, pp. 1—52. 另可參看 S. Konow, “Kalawan Copper-plate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134.”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2, pp. 949—965, 以及注 5 所引文; 注 13 所引 W. W. Tarn 書, p.348。主要不同觀點見注 25 所引 J. E. van Lohuizen-de Leeuw 書, pp.1—65。

43 關於 Gondophares 的年代, 可參看 J. F. Fleet, “St. Thomas and Gondophern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5, pp. 223—236; “The Date of the Takht-i-Bāhī Inscrip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6, pp. 706—711; 注 27 所引 E.J. Rapson 書, p. 576; J. Marshall, *Taxila*. Cambridge, 1951, pp. 58—60; 注 39 所引 H. Raychaudhuri 書, p.452; R. C. Majumdar, ed., *The Age of Imperial Unity*. Bombay, 1953, pp.130—131; B. N. Murkherjee, “A Note on the Date of Gondophares.”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38 (1962), pp. 239—241。

44 注 27 所引 F. W. Thomas 文; 注 43 所引 J. Marshall 書, pp. 58—60。

45 據 Philostratos (c. 170—245)《Tyana 的 Appollonius 傳》記載, 在公元 44 年, Taxila 的統治者是 Phraotes (II, 26—31)。見 Philostratus, *The 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ed., Christopher P. Jones, Vol. I,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5. E. Herzfeld, “Sakastan.” *Archaeologische Mitteilugen aus Iran* 4 (1932), pp. 1—116, 以爲 Phraotes 應指 Gondophares, 因爲 Gondophares 佉盧文錢銘中王號的一部分是 apratihata。今案: 據 Takht-i-Bāhī 銘文推斷, Gondophares 在公元 45 年在位, Herzfeld 此說提供了佐證。又, 注 13 所引 W. W. Tarn 書, pp. 339—341, 試圖證明《漢書·

西域傳》所見“烏頭勞”一名亦係稱號而非人名。今案:W. W. Tarn 說非是。《漢書》自有敘例，不可任意解釋。

46 參看注 27 所引 B. N. Puri 書, pp. 15—16。又, Abdagases 的錢幣發現於西旁遮普，錢幣上的稱號是 Guduvharabhrādaputra mahārājasa（tradarasa）Avadagaśasa（注 12 所引 P. Gardner 書, p. xlv），而在另一種錢幣上稱 mahārājasa rājātirājasa（注 34 所引 R. B. Whitehead 書, p. 154）。Pacores 的錢幣發現於 Kandahar 和 Bhakar 以西地區（A. Cunningham, *Coins of Ancient India, Down to the 7th Century A. D.* London, 1891, p. 122）；亦曾在 Sirkap 與 Gondophares、Kujula Kadphises 的錢幣一起出土（注 42 所引 J. Marshall 文）。又, D. W. MacDowall, “The Dynasty of the Later Indo-Parthians.” *Numismatic Chronicle*, Series 7, 5（1965）, pp. 137—148, 以爲 Gondophares 之後，依次爲 Abdagases、Orthagnes 和 Pacores。

47 參看注 43 所引 J. Marshall 書, p. 64；注 27 所引 E. J. Rapson 書, p. 580。兩者均以爲 Gondophares 的繼位者僅 Pacores 一人。

48 注 43 所引 J. Marshall 書, p. 66，指出：在 Begrām 和喀布爾河谷的其他遺址發現了大量 Gondophares 的錢幣，但是沒有發現他的繼承者 Pacores 的錢幣，則表明 Gondophares 死後，安息人在 Paropamisadae 的統治隨之結束。

49 注 17 所引 S. Konow 書, p. 57。

50 注 17 所引 S. Konow 書, pp. 61—62。

51 E. J. Rapson,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II, Part I: Kharoshṭhī Inscriptions. Calcutta, 1929.”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0, pp. 186—202. 注 27 所引 B. N. Puri 書, p. 16，以爲這可能是丘就卻爲了向 Gondophares 表示友好而作出的外交姿態。S. K. Dikshit, “The Problem of the Kushāṇas and the Origin of the Vikrama Saṁvat.”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33（1952）, pp. 114—170，認爲銘文的記載表明 Guduvhara 和 Gushana 屬於同一王朝，後者繼承了前者。今案：前說並無證據；後說與中國史籍的記載不符。

52 見注 42 所引 J. Marshall 文。

53 注 27 所引 B. N. Puri 書, p. 16。

54 J. Marshall 說見注 43 所引書, pp. 66—67。注 24 所引 S. Konow 文說略同。

55 說本 E. Chavannes,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Heou Han chou.*” *T’oung Pao*, Series 2, 8（1907）, pp. 149—234。王靜如說略同，見“論吐火羅及吐火羅語”,《王靜如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1998 年, pp. 89—

152。關於“濮達”，注 28 所引 O. Franke 書，p. 99，以及 J. Marquart,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von Eran*, II. Leipzig, 1905，p. 175，均以爲指 Πακτυικη（在 Arachosia 北面）；注 24 所引 S. Konow 文亦主此說。又，注 2 所引 E. G. Pulleyblank 文，p. 101，以爲指 Puṣkalāvatī。今案：如果承認“濮達”即“撲挑”，則後說未安。蓋 Puṣkalāvatī 不得言在烏弋山離國之北。至於 Πακτυικη 說，雖於對音可以成立，然不如 Bactria 說於義爲長。

56　白鳥庫吉“罽賓國考”，載《西域史研究》上（1941 年），pp. 377—462。

57　参看注 6 所引余太山書，pp. 32—37。

58　該銘文最早由 A. Cunningham, “Coins of Indian Buddhist Satraps, with Greek Inscriptions.”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23（1854），pp. 679—714，發表，銘文全文見注 17 所引 S. Konow 書，pp. 67—70。

59　注 24 所引 S. Konow 文以爲，如果 Panjtār 銘文屬於丘就卻之子，則丘就卻應去世於公元 65 年以前。而據《後漢書·西域傳》，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則丘就卻生年應爲公元前 20—15 年。但丘就卻的征服生涯應始於公元 25 年以後，而在征服高附時已經六七十歲，知 Panjtār 銘文不可能屬於丘就卻之子。S. Konow 認爲丘就卻應生於公元 25 年，更可能是公元 15 年，在 Panjtār 銘文鐫刻時爲 50 歲左右。今案：其說非是。

60　注 17 所引 S. Konow 書，pp. lxiv—lxv。

61　注 17 所引 S. Konow 書，p. lxv；注 27 所引 B. N. Puri 書，pp. 18—19。

62　注 43 所引 J. Marshall 書，pp. 67—68。又，B. N. Mukherjee, “The Kushāṇa Epithet Kara.”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5（1977），pp. 143—144，以爲 Kara 意指“君主”。

63　注 27 所引 E. J. Rapson 書，p. 582。

64　注 17 所引 S. Konow 書，p. lxv。

65　注 43 所引 J. Marshall 書，pp. 68—70，認爲這種錢幣也是由作爲太子的 Wima Kadphises 頒發的。

66　該銘文由 J. Marshall 發現，見注 42 所引文，以及 J. Marshall, “The Date of Kanishk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4，pp. 973—986；*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5，pp. 191—195。銘文全文見注 17 所引 S. Konow 書，pp. 70—77。

67　Taxila 銀冊銘文的發現，使 J. Marshall 對以三位數紀年的貴霜銘文的絕對年代形成了新的看法。他認爲銘文中出現的 Aya 應指 Azes 一世。錢

幣學等方面的證據表明 Azes 一世曾開創一個紀元，很可能便是元年爲公元前 57 年的 Vikrama 紀元。此後，不少學者接受了他的觀點。有關討論見注 42、66 所引 J. Marshall 文，以及 J. F. Fleet，"The Taxila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136."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4，pp. 992—999；"The Taxila Scroll of the Year 136."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5，pp. 314—318；M. Boyer，"L'Inscription en Kharoṣṭhī du 15 Āṣāḍha 136." *Journal Asiatique*，Serie 11，5（1915），pp. 281—298；S. Konow，"The Eras of Indian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AO* III（1924），pp. 52—91；"Kalawan Copper-plate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134."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2，pp. 949—965；R. Chanda，"Taxila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136."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0，pp. 319—324；注 27 所引 E. J. Rapson 書，p. 571；注 25 所引 J. E. van Lohuizen-de Leeuw 書，pp.1—64，等等。又，正如注 66 所引 J. Marshall 文（*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4，p. 977）所指出，究竟 Azes 紀元和 Vikrama 紀元是否完全一致是不確定的，很可能略早或略遲於公元前 58 年。今案：Azes 紀元和 Vikrama 紀元有可能是元年比較接近的兩個不同的紀元。

68 參看 S. Konow，"Some New Facts about the Eras of the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Acta Orientalia* 5（1927），pp. 28—38；以及注 27 所引 B. N. Puri 書，p. 15。

69 注 27 所引 E. J. Rapson 書，p. 581。

70 注 66 所引 J. Marshall 文。

71 注 43 所引 J. Marshall 書，pp. 66—67，認爲：丘就卻很可能是乘 Gondophares 去世之際發動取高附、滅罽賓的戰爭的，其時間應在公元 50 年左右。考慮到如此艱巨的征戰，一位高齡統治者是很難勝任的，不妨假設當時丘就卻的年齡爲 50—60 歲。換言之，丘就卻大約生於公元前 5 年，卒於公元 70 至 80 年之間。今案：丘就卻在 Gondophares 去世後立即發動"侵安息"的戰爭，則可見他對此蓄謀已久。只是發動戰爭的時機取決於客觀形勢的發展，既不可能因自己尚富於春秋而坐失良機，亦不會因擔心年耄而提前出兵。

72 《通典·邊防九》（卷一九三）作"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通志·四夷三》（卷一九六）作"景匿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此外還有若干異文。參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中華書局，1983 年，pp. 34—35。

73　K. P. Jayaswal, "Problems of Saka-Satavahana History." *Journal of the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 16 (1930), pp. 227—316.

74　注 34 所引 R. B. Whitehead 書, pl. xvii, 24。

75　注 39 所引 H. Raychaudhuri 書, p. 462, n.3; D. C. Sircar, "The Kushāṇas." In *The Age of Imperial Unity*. Edited by R.C. Majumdar, Bombay, 1953, pp. 136—153, esp. 139, 以爲丘就卻的治期約在公元 15—65 年。他錢幣上的羅馬頭像直接倣自 Augustus（公元前 27—公元 14 年）、Tiberius（公元 14—27 年）或 Claudius（公元 41—54 年），可以爲證。

76　J. Allan, H. H. Dodwell, T. Wolseley Haig, *Cambridge Shorter History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4, p. 74.

77　A. L. Basham, "A New Study of the Śaka-Kuṣāṇa Period."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15 (1953), pp. 80—97.

78　注 9 所引 A.K. Narain 書, pp. 160—161，同意 J. Allan 說（出處見注 76），並認爲，這將使任何將丘就卻治期的起點置於公元前 25 或公元前 30 年（例如注 25 所引 J. E. van Lohuizen-de Leeuw 書, p. 364）的嘗試失敗，除非承認丘就卻的治期有九十年，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這也表明丘就卻與 Hermaeus 之間有一段間隔；否則就必須承認 Hermaeus 統治到公元一世紀二十年代中，這顯然也太晚了。今案：A.K. Narain 說未安。

79　參見 D. W. MacDwall, "Numismatic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Kaniṣka." In A. L. Basham, ed.,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ṣka*. Leiden, 1968, pp.134—149。作者認爲：丘就卻這類錢幣的重量標準與 Flavia 時期依舊流通的磨損了的 Augustus 的 denarii 相倣。這表明這些錢幣倣製於 Flavia 時期。他還認爲其反面並非按羅馬原型倣製，而頗具地方色彩。

80　年代爲 134 年的 Kalawan 銘文並未提到貴霜，似乎 Taxila 一地被丘就卻佔領直到公元 77 年；參看 S. Chattopadhyaya, *Early History of North India*. Calcatta, 1958, pp. 70—74。又，在 Sirkap 發現了大量丘就卻的錢幣。這表明他確實統治了 Gandhāra 和 Taxila；參看注 43 所引 J. Marshall 書, p. 67。

三　關於“閻膏珍”

一

據《後漢書·西域傳》，貴霜王朝的創始人丘就卻的王位是由其子閻膏珍繼承的：

> 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據此可知，貴霜王朝因閻膏珍“復滅天竺”而臻於極盛。

一般認爲，“閻膏珍”應即 Kushāṇa 錢銘所見 Vima Kadphises。[1] 一說“閻膏珍”其實應作“閻膏彌”，蓋“珍”、“彌”之俗寫爲“弥”，容易混淆。[2] 今案：改“珍”爲“弥”[miai] 並無版本依據，而“閻膏珍”[jiam-kə-tiən] 完全可以視作 Vima Kad[phises] 之對譯。不管怎樣，按照《後漢書·西域傳》，“閻膏珍”應即丘就卻王位的繼承人 Vima Kadphises。

但是，臘跋闥柯銘文的發現使我們對丘就卻王位的繼承人有了新的認識。

臘跋闥柯銘文以希臘字母書寫，凡 23 行，每行有字母 50 多個，刻於一 90 釐米寬、50 釐米高、25 釐米厚的白色石灰石上。

帶有銘文的刻石是與一個獅雕的若干殘片（四個爪子和部分鬣毛）

一起被發現的，地點是阿富汗 Baghlan 省、Pul-i Khumri 以北 25 英里的 Rabatak 區、被當地人稱爲 Kafirs 堡的一座小山，時間是 1993 年 3 月。

銘文已由英國學者解讀。[3] 在此，擬利用這篇銘文提供的信息，就《後漢書·西域傳》所載閻膏珍的有關問題略述己見。

與閻膏珍年代有關的信息主要見載於臘跋闥柯銘文第 12—14 行。這三行明確記載：Kujula Kadphises 之子爲 Vima Tak[to]，Vima Tak[to] 之子爲 Vima Kadphises，而著名的 Kaniṣka 王則爲 Vima Kadphises 之子。

過去，研究者均指閻膏珍爲 Kushāṇa 錢幣、銘文所見 Vima Kadphises。若相信《後漢書·西域傳》閻膏珍爲丘就卻之子的記載，則 Vima Kadphises 就是丘就卻之子。而據 Rabatak 銘文，Kujula Kadphises（丘就卻）之子其實是 Vima Tak[to]，Vima Tak[to] 之子纔是 Vima Kadphises。因此，《後漢書》所見閻膏珍似乎必須與 Vima Tak[to] 勘同。換言之，肯定《後漢書·西域傳》的全部記載，則繼承丘就卻王位的閻膏珍乃指 Vima Tak[to]，“滅天竺”的正是這位 Vima Tak[to]。

今案：《後漢書》所載閻膏珍應該是丘就卻之孫 Vima Kadphises，而被《後漢書》誤以爲丘就卻之子了。這是因爲“閻膏珍”祇能視爲 Vima Kadphises 之對譯，很難指爲 Vima Tak[to] 的對譯。

二

《後漢書·西域傳》載閻膏珍即位後“復滅天竺”。所謂“天竺”，同傳有載：

>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

> 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毾㲪、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

對此，應予說明的有以下幾點：

1.“天竺”[thyen-tuk] 或“身毒”[sjien-duk] 之原語應爲 Sindhu 或 Hindhu。[4] 因此，“天竺國”的中心地區應爲印度河流域，所臨“大水”即印度河。

2. 傳文既稱天竺國“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又說“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印度洋）……皆身毒之地”，顯然是矛盾的。產生這一矛盾的原因，我認爲，前一句其實是承襲了《史記·大宛列傳》如下記載：

> 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

並不是《後漢書·西域傳》所描述時代的實際情況。其中所謂“月氏”指征服大夏的大月氏，其都城藍市（監氏）即 Bactra，[5] 位於印度河流域的東北，故云。第二句中的“月氏”應指丘就卻創建的貴霜王朝。貴霜王朝雖然也佔有原大夏國之地，但最早可能在丘就卻滅罽賓後已移都於 Taxila，故云。[6]

3.“天竺”即“身毒”雖然主要包括印度河流域，但傳文既稱其地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則不妨認爲“天竺”即“身毒”一名有時用來特指“身毒之地”的某一個或幾個“別國”。《後漢書·西域傳》“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

弱則失之”一句中的“天竺”顯然是指一度佔領印度河流域某些地區的希臘人王國。

4. 天竺即身毒指印度河流域殆無疑義。但是，傳文又稱天竺之地“東至磐起國”。而所謂“磐起國”應即見諸《魏略·西戎傳》的“盤越國”，[7] 據載：

> 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

《魏略·西戎傳》所謂“天竺”亦指印度河流域。盤越即磐起既位於印度河流域“東南數千里”,《後漢書·西域傳》又稱天竺之地直抵磐起即盤越國，其範圍遠遠越出印度河流域可知。故不妨認爲,《後漢書·西域傳》的“天竺”有時又取其廣義。

“盤越”，一說指南印度 Pāṇḍya 國；[8] 一說即剽越（Pyū 、Prū 或 Promo 之音譯），指緬甸。[9] 今案：後說至爲妥帖。又,“益部”或以爲“益郡”之訛。[10] 今案:“益部”指益州刺史部，不必改爲“益郡”。至於“漢越”應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見“滇越”，因形似而致訛。[11]

5.《後漢書·西域傳》又載：

>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東離國，一說即《法顯傳》之多摩梨帝國；亦即《大唐西域記》卷一〇之耽摩栗底國（Tāmraliptī）。[12] 一說指 Madhyadeśa（中印度）。[13]

然而,"東離"更可能是"車離"之訛。蓋據《魏略·西戎傳》:

> 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南西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駞以戰,今月氏役稅之。

"車離"[kia-liai],一說即南印度古國 Chola,而"沙奇"[sai-kiai] 應即 Kāñchī,亦即《大唐西域記》卷十所見達羅毗荼國(Dravḍa)之都城建志補羅(Kāñcipura)。[14] 今案:此說甚是。蓋 Kāñchī 位於 Palār 河畔,曾爲 Chola 或 Draviḍa 都城。[15] 至於"禮惟特"[lyei-jiuəi-dək] 和"沛隸"[phat-let],很可能是 Drāviḍa 和 Palār 的對譯。[16]

"月氏"即貴霜既"役稅"車離國即 Chola,知貴霜勢力曾一度伸向南印度。考慮到東離即車離臣服於貴霜已見載於《後漢書·西域傳》,則貴霜勢力向南印度的擴張很可能在丘就卻去世之後。因此,傳文所謂閻膏珍"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可能主要指貴霜對印度河流域之征服。而"身毒有別城數百"至"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一段,可能指此後貴霜對廣義的天竺之征服。[17]

雖然如前所述,《後漢書·西域傳》所載閻膏珍應該是 Vima Kadphises,但"復滅天竺"者究竟是 Vima Tak[to] 還是 Vima Kadphises,則有以下幾種可能:

1. 閻膏珍既是 Vima Kadphises,"復滅天竺"的貴霜王也就是 Vima Kadphises。《後漢書》誤將丘就卻之孫的功績歸諸丘就卻之子了。

2. 閻膏珍雖是 Vima Kadphises,"復滅天竺"的貴霜王卻可能是 Vima Tak[to]。因爲《後漢書》明載"復滅天竺"是丘就卻之子所爲。《後漢書》誤將丘就卻之子的功績歸諸丘就卻之孫了。

3.“滅天竺”是兩代人的功績，既有作爲丘就卻之子 Vima Tak[to] 的功績，也有作爲丘就卻之孫閻膏珍（Vima Kadphises）的功績。《後漢書》將兩人的功績歸於一人。

今案：第三種可能性最大。天竺並不是一個小國，“滅天竺”決非易事。傳文且稱“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可見“滅天竺”對於貴霜的興盛至關重要。揆情度理，征服之後尚需治理，也許不是一代君主能夠完成的。關鍵還在於，這樣理解可以說明《後漢書·西域傳》敍事產生混亂的原因：兩代君王從事同一事業，肇始於父，畢功於子，以致難分彼此。

果然，則《後漢書·西域傳》所載“閻膏珍”雖然是 Vima Kadphises 的對譯，但“閻膏珍”名下的事業卻可能屬於 Vima Tak[to] 和 Vima Kadphises 兩者。在某種意義上，不妨認爲《後漢書·西域傳》所見“閻膏珍”乃指 Vima 父子。

三

或以爲,《後漢書·西域傳》所謂“復滅天竺”應讀作“又一次征服天竺”，因而指貴霜“復滅天竺”爲 Sakā 人對西印度的第二次征服。[18] 今案：其說未安。

一則，按之《後漢書·西域傳》原文,“復滅天竺”承上“滅濮達、罽賓”而言，意謂繼滅亡濮達、罽賓之後，貴霜又滅亡了天竺。在此,“復”字修飾的是“滅”，而不是“滅天竺”。因此，不能將“復滅天竺”理解爲“又一次征服天竺”或“重新征服天竺”。

二則，班勇或《後漢書·西域傳》的編者並不知道 Sakā 人對西印度的第一次征服，不可能稱 Vima 父子的征服爲第二次征服。

所謂 Sakā 人對西印度的第二次征服，主要見諸 Kālakachāryaka-

thānaka 一書。據云：Balamitra 和 Bhānumitra 聯合統治 Ujjayinī 凡六十年，Nabhavāhana 統治凡四十年。嗣後，Gardabhilla 王朝執政凡 152 年。而在 Gardabhilla 統治了 13 年後，被 Sakā 諸王驅逐，Sakā 諸王統治凡四年。嗣後，Vikramāditya（Gardabhilla 之子）奪回了 Ujjayinī，開創了 Vikrama 紀元，並統治了 60 年。他的四位繼承人分別統治了 40、11、14 和 10 年。接著便是 Sakā 人的第二次征服，塞種紀元於是創始。[19]

第二次征服西印度的 Sakā 留下的銘文分屬兩個家族：Nahapāna 和 Chashaṭna。[20] 前者包括 Nahapāna 及其女婿 Ushavadāta，後者被稱爲 Sakā，他的銘文用塞種紀元紀年。[21]Chaṣṭana 的銘文和錢幣多不標明年代，他的紀年記錄已發現的僅一篇年代爲 52 年的 Andhau 銘文。[22] 他的錢幣表明他最初是 Kshatrapa（州長），後來成爲 Mahākshatrapa（大州長）；[23] 其子 Jayadāman 則僅僅是一個州長，而且似乎去世在其父之前。[24]Chashatna 由其孫 Rudradāman 繼位。[25]

在 Nahapāna 的一篇記錄中，有 Kuśaṇamūla 和 suvarṇa 這二個詞引起了人們的注意。[26] 前者可以認爲是 Nahapāna 銀幣的名稱，而這種銀幣是按照一個 Kuśaṇa 即 Kushāṇa 家族的指令特地頒行的。[27] 這篇記錄提到三十五個 kārshāpaṇa（銀幣）等於一個 suvarṇa（金幣）。這表明在該地區金銀幣都是流通的，而 suvarṇa 是由 Vima Kadphises 首先引進的。[28] 因此，Nahapāna 很可能是貴霜王朝的一個藩臣。他擁有以自己的名義頒行銀幣的權力。而在 Ushavadāta 的 Nāsik 記錄上，提到他準備按照君王（Bhaṭṭāraka）的命令去征服 Mālavas。[29] Bhaṭṭāraka 一詞在此不可能用來指稱 Nahapāna，因爲在同一篇記錄中他被稱作 Kshatrapa，故此詞祇能是指 Nahapāna 的君主。[30] Nahapāna 和 Chashaṭna 是同時代人，兩人最初都是州長，後來又都成爲大州長。因而似乎也不存在他們中的一人是另一人的君主的可能性。換言之，他們應該有一個共同的君主。[31]

一些學者認爲，Nahapāna 和 Chashaṭna 的共主便是 Vima Kadphises。[32] 今案：如前所述，既然 Vima 父子征服的“天竺”應該包括西印度（今信德、卡提阿瓦和馬爾瓦等地），Nahapāna 和 Chashaṭna 的共主很可能是丘就卻以後的貴霜王。衹是按照臘跋闥柯銘文，這位貴霜王不一定是 Vima Kadphises，也可能是 Vima Tak[to]。

有人進而認爲 Vima Kadphises 便是始於公元 78 年的塞種紀元的創始人。[33] 今案：此說未安。且不說丘就卻的直接繼承人是 Vima Tak[to]，而不是 Vima Kadphises，即使指爲 Vima Tak[to] 也是不可能的。

一則，年代爲 136 年的 Taxila 銀冊銘文應該歸諸丘就卻。這意味著直至公元 78 年丘就卻依舊在位。[34] 而據《後漢書・西域傳》，貴霜是在丘就卻去世後，纔“滅天竺”的，因此並不存在 Vima Tak[to] 在丘就卻在位期間征服天竺的可能。即使丘就卻於公元 78 年去世，Vima Tak[to] 於同年登基，也不可能在這一年征服西印度，並創建了一個元年爲公元 78 年的新紀元。

二則，如果說年代爲 136 年的 Taxila 銘文應該歸諸 Vima Tak[to]，那末就很難解釋爲什麽由 Vima Tak[to] 開創的新紀元僅僅流行於西印度。不僅年代爲 136 年的 Taxila 銘文依舊使用老紀元紀年，年代爲 187 年的 Khalatse 銘文和年代爲 191 年的 Jihoṇika 銘文也都是沿用老紀元。[35]

要之，元年爲公元 78 年的塞種紀元並非丘就卻的繼承人創建，而是第二次征服西印度的 Sakā 人自己創建的。[36] Vima 父子所滅“天竺”既可能包括西印度在內，所“滅”者便應該是第二次征服西印度的 Sakā。當然，事實上該處的 Sakā 人或其政權並未被消滅，衹是向貴霜表示臣服，尊之爲共主。貴霜人則允許這些西印度的 Sakā 酋長們擁有自治權，包括使用他們自己創建的紀元。[37]

四

以往一直認爲屬於 Vima Kadphises 的銘文最主要的是年代爲 187（或 184）年的 Khalatse 銘文。銘文發現於 Ladakh 的一個叫 Khalatse 的村莊，位於去 Leh 二十五英里的商道上。[38] 銘文提到了 maharajasa Uvima Kavthisa。如果按所謂 Vikrama 紀元計算，則銘文的絕對年份是公元 129（或 126 年）。這一年可以看作閻膏珍去位年代的上限。既然 136 年的 Taxila 銀冊銘文應歸諸丘就卻，丘就卻去位年代的上限應是公元 78 年，這一年亦即閻膏珍即位年代的上限。如果閻膏珍是丘就卻的直接繼承人，他在位約五十年。

有人認爲，丘就卻死於八十歲以上高齡，其子閻膏珍即位時已不會年輕，因而懷疑他有如此長的治期。[39] 應該承認這一推測不無合理性，然而在當時這終究不過是推測而已，丘就卻晚年得子客觀上不無可能。設閻膏珍即位時已屆而立，在位半個世紀也不是難以想像的。[40]

現在臘跋闥柯銘文告訴我們閻膏珍（Vima Kadphises）並未直接繼承丘就卻的王位，在兩者之間，還有一位貴霜王，亦即 Vima Tak[to]。這樣，閻膏珍治期過長的疑問就不復存在了。

《後漢書・西域傳》沒有提及閻膏珍之死，很可能表明他活到了 125 年之後。Khalatse 銘文既然清楚地表明他的去位不會晚於公元 126（或 129）年，則《後漢書・西域傳》不載閻膏珍去世看來或非偶然。

還有人對 Khalatse 銘文應該歸諸閻膏珍表示懷疑。主要理由是閻膏珍的銘文不可能出現在這樣一個荒涼的地區。[41] 今案：此說也有欠考慮。由於資料奇缺，我們今天對閻膏珍時期貴霜王朝的疆域和勢力範圍的認識是遠不夠全面和具體的，但沒有理由否定閻膏珍的銘文在克什米爾地區出現的可能性，不能僅僅因爲發現地點人蹟罕至

便否認該銘文與閻膏珍有關。銘文中的 Uvima Kavthisa 既能與 Vima Kadphises 勘同，[42] 這篇銘文便無妨歸諸閻膏珍。

五

1967 年在喀布爾西南的 Dasht-i Nāwur 附近發現的貴霜三語銘文，也被認爲與閻膏珍有關。所謂三語，一是用希臘文拼寫的巴克特里亞語，二是佉盧文，三是用一種與佉盧文有親緣關係的字體書寫的一種完全未知的語言。銘文漫漶已甚，衹能勉強辨識。據載："在第 279 年的 Gorpiaios 月"，在位的是一位貴霜的"王中之王"，其名字希臘文作 Ooemo，佉盧文作 Vhama。一般認爲，Ooemo 和 Vhama 即 Vima，這位貴霜統治者便是閻膏珍。[43] 銘文的"279 年"，一說應按元年爲公元前 155 年的老塞種紀元計算，絕對年份是公元 124 年。[44] 另說應按元年爲公元前 247 年的 Arsacid 紀元計算，絕對年份爲公元 32 年。[45] 第三說認爲應按元年爲公元前 170 年的 Eucratide 紀元計算，絕對年份爲公元 109 年。[46] 這一年可以視爲閻膏珍（Vima Kadphises）即位之年的下限。

今案：如果承認 Ooemo（Vhama）即 Vima Kadphises，而本文以上有關丘就卻、閻膏珍的考證又可以接受的話，則第二說未安。但若按第一說，則銘文的年代正在閻膏珍的治期。喀布爾一帶既在丘就卻時期已并入貴霜版圖，Dash-i Nāvur 出現閻膏珍的銘文亦在情理之中。問題在於指銘文所採用的紀元爲公元前 155 年的老塞種紀元並無充分依據。

一則，所謂老塞種紀元是指最早進入西北次大陸的 Sakā 人使用的紀元。關於這一紀元的起源和元年可謂衆說紛紜。公元前 155 年說不過其中之一。按照這種說法，這一紀元是定居或被安息王 Mithridates

一世（公元前 171—公元前 139/138 年）安置在塞斯坦的塞人所創。[47] 但其實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 Mithridates 一世時期塞斯坦已有塞人居住，也沒有證據表明在西北次大陸採用這一紀元的塞人來自塞斯坦。西北次大陸最早的塞王 Maues 的年代爲 78 年的 Taxila 銅板銘文被認爲是按照這一紀元紀年的。但按之《漢書・西域傳》的有關記載，Maues 系統的塞人並不是來自塞斯坦，而是從伊犂河、楚河地區南下，經由帕米爾，進入罽賓即 Gandhāra 和 Taxila 的。因此，如果 78 年的 Taxila 銅板銘文採用的紀元是 Maues 系統的塞人所創，便沒有理由認爲它的元年是公元前 155 年，而衹能說它的元年的上限是公元前 177/176 年。正是在這一年，這批塞人被西遷的大月氏人逐出伊犂河、楚河流域，被迫南下帕米爾。[48]

二則，Maues 系統的塞人是否佔領過 Paropamisadae 不得而知，很可能是沒有佔領過。[49] 因此，在這個地區較長期流行過這個所謂老塞種紀元也是值得懷疑的。總之，很難認爲喀布爾一帶貴霜時期的銘文會使用這一曾由 Maues 系統的塞人使用的紀元。

三則，之所以認爲上述三語銘文使用的紀元是老塞種紀元，主要是因爲銘文使用了馬其頓曆法（Gorpiaios 月），而 78 年的 Taxila 銅板銘文使用的也是馬其頓曆法，採用同樣的曆法不等於採用同樣紀元。也就是說，不能僅僅據此認爲三語銘文使用的也是老塞種紀元。說 Dash-i Nāvur 三語銘文和 78 年的 Taxila 銅板銘文使用同樣的馬其頓曆法表明兩者有可能使老塞種紀元，則不如認爲使用馬其頓曆法表明兩者使用的並不是一個塞人的紀元，而是採用了一個希臘的紀元。Paropamisadae 和 Gandhāra、Taxila 都曾經是希臘人的勢力範圍，在這些地區流行一個希臘人的紀元是完全可能的。

有鑒於此，Dash-i Nāvur 銘文所用的紀元很可能是 Eucratide 紀元，其元年或在公元前 170 年左右。其絕對年代可視爲閻膏珍即位年代的

下限。另一篇屬於閻膏珍的年代爲299年的Surkh Kotal銘文，亦採用同一個紀元。[50]其絕對年代可視爲閻膏珍去世年代的上限。

六

從Bactria到Mathura，包括Panjab、Kandahar、Kabul，均曾發現一種特殊的貴霜錢幣。這種錢幣的錢銘有希臘文：Besileus Besileuou Söter Mêgas（王中之王，偉大的救世主）；亦有佉盧文：Maharajasa rajatirajasa mahatasa tradatasa（大王、王中之王、偉大的救世主）。[51]由於錢銘沒有提到王名，一些學者稱這些錢幣的頒行者爲“無名王”或Söter Mêgas。對於這些錢幣究竟是誰發行的，學界歷來有不同意見。

一說“無名王”就是Kujula Kadphises，有關錢幣是Kujula Kadphises頒行的；[52]二說“無名王”就是Vima Kadphises，有關錢幣是Vima Kadphises早期頒行的；[53]三說“無名王”是Vima Kadphises的副王或總督；[54]四說“無名王”是一位貴霜君主，時在Kujula Kadphises之後，Vima Kadphises之前。[55]

現在結合臘跋闥柯銘文的記載，可以認爲第四說近是。質言之，“無名王”很可能便是Vima Tak[to]。

首先，既然“無名王”的錢幣上使用“王中之王”這一類最高級稱號，就很難認爲Söter Mêgas是副王或總督，故第三說難以成立。

其次，第一說的主要依據是“無名王”的錢幣有某些Kujula Kadphises的錢幣相類似的特徵。但是錢幣可以摹倣，不能據以爲Söter Mêgas便是Kujula Kadphises。[56]

第三，雖然Söter Mêgas的錢幣同Vima Kadphises的錢幣有許多類似的特徵，[57]而且在一些錢幣上還似乎有代表Vima Kadphises姓氏的符號；[58]最明顯的是一枚錢幣上的Prakrit銘文：maharajasa rajatirajasa

tratarsa vamasa，其中 vamasa 可以認爲是 Vima [Kadphises] 的轉寫；[59] 但是，如果說 Söter Mêgas 便是 Vima Kadphises 本人，有關錢幣都是 Vima Kadphises 頒行的，也有若干處扞格難通。

1. Söter Mêgas 的錢幣始終使用獨特的花押，Vima Kadphises 的錢幣也是如此，但兩者所用不同。[60]

2. Söter Mêgas 和 Kujula Kadphises 一樣，既使用方形的又使用新月形的字母，而 Vima Kadphises 的錢幣僅見草寫的新月形字母。[61]

3. 有一枚 Söter Mêgas 的錢幣被 Pakores 重新打印。這似乎表明 Söter Mêgas 與 Pakores 同時代或稍前。而一般認爲 Pakores 的年代早於 Vima Kadphises。[62]

4.Söter Mêgas 的錢幣發現數量較多，以及多種具有地方色彩的模式似乎表明這些錢幣的頒行者不止一人。[63] 因此，以下可能性必須考慮：所謂 Söter Mêgas 或“無名王”的錢幣實際上是貴霜王朝各地的封疆大臣代表中央政府打鑄、頒行的。錢銘所見“王中之王、偉大的救世主”並非這些封疆大臣的自稱，而是指貴霜君主。這些錢幣不著王名、採用獨特的花押，則是爲了區別於那些由中央政府打鑄、頒行的錢幣。也就是說，“無名王”錢幣應該加以區別，其中一些可能頒行於 Vima Tak[to] 即位之前。這些錢幣上的 Söter Mêgas 之類稱號，其實是代表丘就卻。而那些有 Vima 記號的則可能頒行於 Vima Tak[to] 即位之後。這樣，Söter Mêgas 錢幣的模式、風格既與丘就卻、Vima Tak[to] 有別，又與兩者均有聯繫也就可以理解了。至於後來多種風格和模式趨向一致，所謂“地方錢幣”逐漸被“通用錢幣”取代，[64] 可能是爲了便於流通，也表明了國家統一的加強。

這種由封疆大臣打鑄、頒行所謂 Söter Mêgas 錢幣的做法大概直至 Vima Tak[to] 去位尚未完全絕蹟。因此，發現被 Söter Mêgas 重新打印的 Vima Kadphises 的錢幣 [65] 也就不能否定以上的推論，蓋不能完全排

除在 Vima Kadphises 亦即閻膏珍之後繼續流行的另一種 Söter Mêgas 錢幣的可能性。

《後漢書・西域傳》明載，丘就卻死，“子閻膏珍代爲王”。似乎表明 Kujula Kadphises 與 Vima Kadphises 之間並不存在另一位貴霜王。如果考慮到東漢與西域的關係時斷時續，所謂“三絕三通”，於西域事情的記載有所疏漏是在所難免，而 Vima Tak[to] 一度匿名發行貨幣，不妨認爲是這種誤會形成的重要原因。

《後漢書・西域傳》所載閻膏珍如此漫長的治期實際上包括了 Vima Tak[to] 和 Vima Kadphises 兩人的統治時期。

既然 Vima Tak[to] 的治期被并入閻膏珍的治期，他的事蹟也許會被歸於閻膏珍亦即 Vima Kadphises 名下。換言之,《後漢書・西域傳》所載閻膏珍事蹟究竟是 Vima Tak[to] 還是 Vima Kadphises 已經很難分清。

七

貴霜王朝與東漢之間曾發生一次戰爭。據《後漢書・班超傳》記載:

>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章和元年，公元 87 年）[66] 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67] 由是怨恨。
>
> 永元二年（公元 90 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

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68]

按之年代，踰葱嶺東來攻超之副王謝當係 Vima 父子所遣。然而此事袁宏《後漢紀・和帝紀》"永元二年"條載作：

> 是夏，月氏王謝將七萬騎攻班超，超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千里逾葱嶺，何足憂哉！但當收穀堅守，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攻超，不能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數千兵伏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往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遣持所斬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震怖，歲歲奉貢。[69]

據此，則率兵七萬逾葱嶺攻超者係"月氏王謝"。有人於是認爲，"謝"[ziak] 可視作 Kaniska、Vāsiṣka、Huviṣka 詞尾 -iṣka 之對譯，亦即謝可能是以上三人中之一人。由此可見，公元 90 年已是迦膩色迦及其繼承人的時代。[70] 今案：此說未安。

一則，袁宏《後漢紀》成書雖早於范曄《後漢書》，但早在宋代，其刻本已"衍文助語，亂布錯置，往往不可句讀"。(清宋犖序）知今本文字脫訛，不可盡信。

二則，前引袁紀與范書，文字大同小異，知兩者所據資料同出一源。然細核文字，范書於義見長者不止一端。例如：袁紀稱班超遣"數千兵伏東界要之"；伏要月氏使者其實毋需"數千兵"。這表明袁紀此處亦有奪訛。

三則，范書不僅稱謝爲"副王"，而且明言其人係月氏王所"遣"，知袁紀於此實奪"遣"字。

四則，漢譯人名僅取末尾音節似無前例。[71]

由此可見，公元 90 年來攻班超者不可能是 Kaniṣka、Vāsiṣka、Huviṣka 三人中的任何一人，不能根據袁紀認爲公元 90 年已進入迦膩色迦及其繼承人的時代。

論者又說，如果范書所記是正確的，即謝是副王，就有兩種可能性。其一，“副王”意味著兩王並立之一方，也就是 Vāsiṣka 和 Huviṣka 兩者中的一個。Vāsiṣka 和 Kaniṣka 共治，而 Huviṣka 是 Vāsiṣka 之繼承者。這也表明公元 90 年已進入迦膩色迦及其繼承人的時代。其二，“副王”意指 viceroy，則當時的大王既可能是閻膏珍，也可能是迦膩色迦。若係前者，由於“謝”可能是 -iṣka 之轉寫，其人或與迦膩色迦出自同一家族，而在閻膏珍朝爲官。這表明閻膏珍和迦膩色迦的交替在公元 90 年或以後。

今案：此說亦未安。《後漢書》既明載謝係月氏王所遣，則謝不可能是並列兩王之一。即使“謝”係 -iṣka 之音寫，也無助於推斷迦膩色及其繼承人的在位年代。

值得注意的是，《後漢書・班超傳》提到“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按之《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二年五月，“車師前後王並遣子入侍”，而前此東漢擊車師凡二次。第一次在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 74 年）冬十一月，同書“明帝紀”載：

> 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初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72]

第二次在章帝建初元年（公元 76 年），據同書“章帝紀”，是年春正月“酒泉太守段彭討擊車師，大破之”。同書“耿恭傳”則載：

> 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73]

月氏果嘗助漢擊車師，似應在建初元年。由此可知，早在丘就卻在位時期，貴霜與東漢已有所接觸。[74]

八

本節略論貴霜與疏勒國的關係問題。據《後漢書・西域傳》：

> 安帝元初（公元 114—120 年）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爲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爲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爲王，更以遺腹爲磐稾城侯。

按之年代，此事應發生在閻膏珍在位期間。由此亦可見當時貴霜與塔里木盆地綠洲諸國關係之一斑。

有人認爲親愛臣磐、並遣兵送還疏勒的月氏王應是迦膩色迦一世。蓋據《大唐西域記》卷一：

> 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鄰國，化洽遠方，

治兵廣地，至葱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伽藍，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子，容貌服飾，頗同中夏。其後得還本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替供養。故今僧衆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興法會，爲諸質子祈福樹善，相繼不絕，以至於今。

又，同書卷四：

　　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爲國號。

又，《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載伽畢試國：

　　有一小乘寺名沙落迦，相傳云是昔漢天子子質於此時作也。

說者以爲，所言“質子”即臣磐，“沙落迦”即“疏勒”之異譯。[75]今案：其說未安。[76]

一則，臣磐因有罪爲疏勒王安國所徙，並非質子。

二則，“疏勒”，《大唐西域記》作“佉沙”，知“沙落迦”並非疏勒。

三則，“沙落迦”應即《梵語千字文》所見“娑罗誐”，亦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 Sarag（古敍利亞文），意指洛陽。

要之，不得以臣磐之事否定前文有關閻膏珍年代之考訂。

除了和塔里木盆地諸綠洲國發生較密切的聯繫外，閻膏珍或其父在位時期的貴霜和以錫爾河北岸爲本土的康居亦過從甚密。《後漢書·班超傳》的一則記載可以爲證：元和元年（公元 84 年），超攻疏勒王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又,《後漢書·西域傳》稱“粟弋國屬康居”，粟弋即 Sogdiana，知在傳文描述時代，貴霜與康居勢力大致以阿姆河爲界。

■ 注釋

1 J. Marquart,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p. 208.

2 P. Pelliot, "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e." *T'oung Pao* 26 (1928—1929), pp. 201—203. 馮承鈞漢譯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五編》，中華書局, 1956 年, pp. 110—113。

3 N. Sims-Williams and J. Cribb, "A New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Kanishka the Grea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1995/1996, Kamakura, pp. 75—142.

4 參看吳其昌“印度釋名”,《燕京學報》1～4(1928 年), pp.713—743; P. C. Bagchi, "Ancient Chinese Names of India." *Monument Serica* 13 (1948), pp. 366—375; B.C. La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ncient India*. Paris 1954, pp. 8—11；堀謙德《解說西域記》，國書刊行會, 1972 年, pp. 107—112，等。

5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 pp. 61—63。

6 H. C. Raychaudhuri, *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53, p. 463，以爲“天竺”乃指印度本土，很可能是 Taxila。今案：其說非是。Taxila 漢代應包括在罽賓範圍之內。

7 《梁書·諸夷傳》文字略同，而“磐起”正作“槃越”。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六冊，中華書局, 1979 年, p. 22，以爲“磐起”即 Bengal；未安。參見“蜀布與 Cīnapaṭṭ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梵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pp. 223—260。

8 楊憲益“盤越與車離”,《譯餘偶拾》，三聯書店, 1983 年, pp. 362—363。

9 注 7 所引饒宗頤文。

10 E. Chavannes,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 lio*." *T'oung Pao*, Series 2, 6 (1905), pp. 519—571. 馮承鈞漢譯見《西域南海史地譯文考證譯叢

七編》，中華書局，1957年，pp. 41—57。

11 注7所引饒宗頤文。

12 丁謙“《後漢書・西域傳》地理攷證”，《二十五史三編》第4集，嶽麓書社，1994年，pp. 593—594。

13 F. W. Thomas，“Sandanes，Nahapāna and Kaniṣka，Tung-li，Pán-ch'i and Chinese Turkestan.” *New Indian Antiquary* 7(1944)，pp. 79—100.

14 注8所引楊憲益文。

15 注4所引B. C. Law書，pp.161—162。

16 注13所引F. W. Thomas文以爲沒有證據表明貴霜統治過南印度。今案：《後漢書・西域傳》有關車離國的記載表明貴霜勢力曾一度伸向南印度。車離國遠離貴霜統治的中心地區，故被貴霜“擊服”後，很可能不過按時進貢方物而已，即所謂“月氏役稅之”。

17 閻膏珍的錢幣很多，出土地點分佈很廣，在Basarh、Bhita和Kasia等地均有發現。這至少表明閻膏珍曾征服Madhyadesa。參看B. N. Puri，*India under the Kushāṇas*. Bombay，1965，p. 24。

18 S. Konow，*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II，Part I，Kandūd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Calcutta，1929，p. lxvii；S. Konow，“Notes on Indo-Scythian Chronology.”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 12(1933)，pp.1—46. 又，J. E. van Lohuizen-de Leeuw，*The Scythian Period.* Leiden 1949，pp. 373—376，以爲曾被丘就卻佔領的Taxila地區在丘就卻死後一度喪失，後來被閻膏珍重新征服。今案：即使此說不誤，也不能據此將“復滅天竺”理解爲重新征服天竺。Gandhāra和Taxila等地雖在客觀上也屬於天竺，但既然《後漢書・西域傳》已賦予這些地區特定的名稱，就不能認爲閻膏珍“復滅天竺”乃指貴霜再次奪取罽賓等地。

19 H. Jacobi，“Das Kālakācārya-Kathānakam.”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34(1880)，pp. 247—318；Bhau Daji，“The Inroads of the Scythians into India，and the Story of the Kālakāchārya.” *Journal of the Bombay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9(1867)，pp.139—146；K. P. Jayaswal “Problems of Saka-Satavahana History.” *Journal of the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 16(1930)，pp.227—316；D. C. Sircar，“The Vikrama Saṁvat and Sakābda.” In R.C. Majumdar，ed.，*The Age of Imperial Unity. Bombay*，1953，pp. 154—158.

20 注18所引S. Konow文。

21 E. Senart, "The Inscriptions in the Caves at Nasik." *Epigraphia India* 8 (1905—1906), pp.59—96, esp. 85—87.

22 R. D. Banerji, "The Andhau Inscriptions of the Time of *Rudradaman.*"*Epigraphia India* 16 (1921—1922), pp.19—25, 以爲年代爲 52 即公元 130 年的 Andhau 銘文並提 Caṣṭana 及其孫之名，均採用 rājan 之稱號，而不稱"州長 (kṣatrapa)"。

23 E. J. Rapson, *Catalogue of Coins of the Andhra Dynasty, the Western Ksatrapas, the Traikutak Dynasty and the "Bodhi" Dynasty*. London, 1908, pp. 65, 72, 73; H. Lüders, "A List of Brāhmī Inscrip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about A. D. 400,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Aśoka." *Appendix to Epigraphia India and Record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0 (1912), Nos. 1099, 1131, 1132, 1134, 1135, 1174. 其中, Nahapāna 被稱爲 Mahākshatrapa (Rājan mahākhatapa) sāmī (svāmi) Nahapāna; 而在 H. Lüders 表 Nos. 963, 966, 967 中, Chashṭana 被稱爲 Mahākshatrapa, 而在 Andhau 銘文中，他的稱號是 rajan。

24 注 22 所引 R. D. Banerji 文。

25 注 23 所引 E. J. Rapson 書, p.76; 注 23 所引 H. Lüders 表 Nos. 963, 964, 965, 967; F. Kielhorn, "Junagadh Rock Inscription of Rudradaman; the Year 72." *Epigraphia India* 13 (1905—1906), pp. 36—49。

26 注 21 所引 E. Senart 文 (No.12)。

27 D. R. Bhandarkar, "Dekkan of the Satavahana Period." *The Indian Antiquary* 47 (1918), pp.69—78, 以爲 kuśana 一詞應即 Taxila 銀冊銘文所見 Khushanasa。Nahapāna 最初是丘就卻的副王，後來是閻膏珍的副王。注 17 所引 B. N. Puri 書, p. 33, 以爲 Nahapāna 不可能是丘就卻的副王，因爲丘就卻在位時期貴霜的勢力並未達到西印度。

28 R. B. Whitehead, *Catalogue of Coins in the Punjab Museum*, I. Lohore, 1914, p.183.

29 同注 21。

30 注 17 所引 B. N. Puri 書, pp. 22—23, 33。

31 注 17 所引 B. N. Puri 書, p. 23。

32 V. A. Sm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1914, p. 222, 以爲 Chashṭana 和 Nahapāna 臣服於貴霜。注 17 所引 B. N. Puri 書, p. 23, 則指出他們的共主可能是 Vima Kadphises。

33 B. N. Puri, "The Dates of the Kadphises King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Śaka Kshatrapas of Western India."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 20 (1941), pp. 275—287，以及注 17 所引 B. N. Puri 書，pp.20—24，以爲閻膏珍是塞種紀元的創始人。D. R. Bhandarkar, "Indo-Parthian Dynasty of Vonones." Indian Cuture7 (1940—1941), pp. 133—142，亦以爲閻膏珍開創了始於公元 78 年的塞種紀元。另外，注 18 所引 S. Konow 書，p.lxvii；J. Marshall, Taxila, I. Cambridge, 1951, p. 67，亦主閻膏珍創建塞種紀元說。

34 注 18 所引 S. Konow 文以爲閻膏珍“滅天竺”時丘就卻尚未去世。今案：此說與《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不符，茲不取。

35 注 19 所引 K. P. Jayaswal 文，以及 A. Banerji-Sastri, "Śakas and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Century."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13 (1937), pp.199—217。又，注 17 所引 B. N. Puri 書，p. 21，則以爲閻膏珍創建新紀元和繼續使用舊紀元並不矛盾。Kumāragupta 時代的 Mandsor 銘文並不使用笈多紀元、而按 Vikrama 紀元紀年，可供比照。今案：B. N. Puri 說未安。一則，Kumāragupta 並非笈多紀元的創始人，與此相對，閻膏珍作爲塞種紀元的創始人，自己卻不使用這一紀元，實難解釋。二則，Kumāragupta 其他銘文全按照笈多紀元紀年。與此相對，迄今沒有發現閻膏珍有以塞種紀元紀年的記錄。

36 凡主迦膩色迦爲塞種紀元創建者的學者，均否定 Chashṭana 和 Nahapāna 是塞種紀元的創始人，見注 6 所引 H. C. Raychaudhuri 書，p. 469, n. 4；今案：誠如說者所言，Chashṭana 和 Nahapāna 兩者均不可能是塞種紀元的創始者，但這並不排除兩者的先人創建了這一紀元。蓋沒有證據表明在公元 78 年或以前西印度已經歸屬貴霜。

37 S. Konow, "Some New Facts about the Eras of the Kandūd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Acta Orientalia* 5 (1927), pp. 28—38，以爲 Bhūmaka 是 Chashṭana 之父，他應該是西印度最早的州長，係閻膏珍所封。又，已知 Chashṭana 和 Nahapāna 的記錄有 41、46 和 52 等紀年數，如按塞種紀元計算，應爲公元 119、124 和 130 年，正值閻膏珍治期，知 Nahapāna、Chashṭana 和閻膏珍同時代。

38 注 18 所引 S. Konow 書，pp.79—81。

39 此說引自注 17 所引 B. N. Puri 書，p. 20。又見注 6 所引 H. C. Raychaudhuri 書，p. 470。

40 參看注 17 所引 B. N. Puri 書，pp. 23—24。

41 見E. I. Rapson對注18所引S. Konow書的評論（*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0，pp.186—202）。D. C. Sircar，“The Kushāṇas.” In R. C. Majumdar，ed.，*The Age of Imperial Unity*，Bombay，1953，pp. 136—153，esp.139，n.1，以爲Khalatse銘文提到的Maharaja似爲迦膩色迦治下貴霜王朝的一名總督。今案：其說未安，果如所言便不應用舊紀元。

42 注18所引S. Konow書，pp. 80—81。

43 G. Fussman，“Documents épigraphiques Kouchans.” *Be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61（1974），pp.1—66.

44 A. D. H. Bivar，“The Kaniṣka Dating from Surkh Kotal.”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24（1963），pp. 498—502；A. D. H. Bivar，“The History of Eastern Ira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3（1）. CUP：1983，pp. 181—231，esp. 201—202.

45 同注43。

46 J.Harmatta，“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 the Kushan Empire.” In J. Harmatta，ed.，*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 II，UNESCO，1994，pp. 417—440.

47 W. W. 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1951，p.501.

48 注5所引余太山書，pp. 28—29，56—57，146—147。

49 注5所引余太山書，pp. 151—154。

50 同注46。

51 A. Cunningham，“Coins of the Sakas.” *Numismatic Chronicle*，*Series* 3，10（1890），pp.103—172，esp. 156—157；E. J. Rapson，*Indian Coins*.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Strassburg，1898，p.16.

52 M. E. Masson，“The Oringin of the Nameless King of Kings，the Great the Soviour.” *Procedings of the Central Asian State University*，Tashkent，1950，pp. 30—33；A. K. Narain，“The Date of Kaniṣka.” In A.L. Basham，ed.，*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ṣka*，Leiden，1968，pp. 206—239，亦主無名王即丘就卻說。

53 L. Bachhofer，“Die Āra Kanishkas.” *Ostasiatische Zsitschrift* 14（1927—1928），pp. 21—43；B.N. Mukherjee，*The Kushana Genealogy*. Calcutta，1967，p. 54.

54 V. A. Smith，*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1914，pp. 248—268，首創

此說。J. Marshall,“Excavations at Taxila, 1912—1913.” *Archaeology Survey of India, Annual Report*. Calcutta, 1916, pp.1—52，說略同。注 18 所引 S.Konow 書, p.lxix，以爲 Söter Mêgas 是閻膏珍“滅天竺”後所置之“將”。注 17 所引 B. N. Puri 書, pp. 24—26，以爲 Söter Mêgas 是閻膏珍的藩臣，受閻膏珍委任，統治北印度。又, R. Göbl,“Zwei neue Termini für ein zentrals Datum der Alten Geschichte Mittelasiens das Jahr 1 des Kušānkönigs Kaniška.” *Anzeiger der phil-. -hist. Klasse der Öster. Akad. der Wiss*, Wien, 1964, pp. 137—151，以爲貴霜帝國可能存在雙重統治系統。又，注 41 所引 D. C. Sircar 文, pp. 140—141，以爲 Söter Mêgas 錢幣的發行者是閻膏珍設在印度佔領區半獨立的總督，亦即年代爲 122 年的 Panjtar 銘文提到的貴霜統治者，在閻膏珍死後一個短時期内曾獨立統治。今案：此說旨在證成迦膩色迦即位建元於 78 年說，茲不取。

55 D. W. MacDowall,“Implications for Kushan Chronology of the Numismatic Context of the Nameless King.”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37 (1975), pp. 44—71，根據錢幣的模式和重量標準論證 Söter Mêgas 應在丘就卻之後，閻膏珍之前。

56 D. W. MacDowall,“Soter Megas, The King of Kings.”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30 (1968), pp. 28—48.

57 A. Cunningham,“Coins of the Sakas.” *Numismatic Chronicle*, Series 3, 10 (1890), pp.103—172; A. Cunningham,“Coins of the Kushāns, or Great Yue-tī.” *Numismatic Chronicle*, Serie3, 12 (1892), pp. 40—82.

58 注 18 所引 S. Konow 書, p. lxix，指出，在一些 Söter Mêgas 錢幣上出現的字母 vi，意指閻膏珍（Vima）一名的首字母。

59 B. N. Mukherjee, *The Kushana Genealogy*. Calcutta, 1967, p. 54.

60 注 55 所引 D. MacDowall 文。

61 同注 60。

62 A. Simonetta,“An Essay on the So-called ‘Indo-Greek’ Coinage.” *East and West*, n.s. 8 (1957—1958), pp. 44—66 (plate 3, no.1). 今案: Pacores 的錢幣與 Gondophares、Kujula Kadphises 的錢幣一起在 Sirkap 出土（參見注 33 所引 J. Marshall 書, p. 64），這表明他的在位年代有可能與丘就卻的部分重合。也就是說，當 Kujula Kadphises 統治喀布爾河流域時，他控制著東伊朗。

63 注 55 和 56 所引 D. MacDowall 文將這類錢幣分成三類: 1 西乾陀羅的; 2

馬土臘和東南旁遮普的；3 伽畢試或巴克特里亞的。這三類他稱之爲地方通貨。

64 注 55 和 56 所引 D. MacDowall 文將上述三類以外的錢幣稱爲通用錢幣。這些錢幣和上述三類一樣，都是銅幣，分爲二德拉克瑪（didrachms）和半德拉克瑪（hemidrachms）兩級。

65 A. Simonetta, "A New Essay on the Indo-Greeks, the Śakas and the Pahlavas." *East and West*, n.s. 9(1958), pp. 154—183.

66 《後漢書·章帝紀》章和元年（公元 87 年）條："是歲西域長史班超擊莎車，大破之。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知《後漢書·班超傳》所謂"是歲"指章和元年。同傳載班超於是年降莎車，威振西域。錢大昭《後漢書辨疑》卷二以爲上引《後漢書·章帝紀》一條中"月氏"應爲"安息"之誤，稱："案西域傳，安息國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扶拔，大月氏國不載其事。"今案：錢説未安。月氏於章和元年入貢一事不載《後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國條"是因爲已見於《後漢書·班超傳》而省略。《後漢書·西域傳》"安息國條"所載"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一則中，"元年"應爲"二年"之誤。蓋據同書《後漢書·和帝紀》，章和二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扶拔"。又，榎一雄"月氏の副王謝——クシャン王朝年代論に關する一臆説——",《オリエント》10—3/4（1968 年）, pp.1—15，認爲：按之《後漢書·班超傳》，傳文所謂"是歲"應爲元和三年（公元 86 年），亦誤。

67 中華書局標點本《後漢書·班超傳》作："超拒還其使。"

68 《後漢書》本紀未見此後貴霜奉獻之事。

69 張烈點校本，中華書局, 1987 年, p. 255。

70 見注 66 所引榎一雄文。

71 S. Lévi, "Le '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tcha." *Journal Asiatique*, *septembre-octobre* 1913, p. 330，以爲"謝"應爲 shāh(šāh)，意爲"王"。今案：《後漢書·西域傳》明載"謝"係人名, S. Lévi 説似未安。

72 又見《後漢書·耿秉傳、耿恭傳》。

73 又見《後漢書·西域傳》序。

74 馮承鈞"迦膩色迦時代之漢質子",《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1976 年, pp. 96—101，疑此處"車師"係"莎車"之誤。

75 羽溪了諦《西域の佛教》，法林館, 1914 年, pp.119，393；高田修《國譯慈恩傳》，大東出版社, 1940 年, p. 46；注 74 所引馮承鈞文。

76　向達說，見夏鼐“中巴友誼歷史”,《考古》1965 年第 7 期, pp. 357—364, esp. 363, 注 12。另請參看桑山正進《大乘佛典・大唐西域記》, 東京都：中央公論社, 1987 年, p.173。

四　迦膩色迦的年代

毫無疑問，有關迦膩色迦年代的主要證據便是貴霜王朝、特別是屬於迦膩色迦本人及其繼承者治期的銘文。

1. 傳世以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紀年的貴霜銘文有200多篇。[1]在可以歸屬Kaniṣka的銘文中，與我們的討論有關者有63篇。[2]其中，有王名又有紀年數者27篇：

1(170)*，2(10)，3(13)，3(14)，4(17)，4(18)，5(19)，5(21)，5(23)，5(24)，7(29)，8(30)，9(34)，10(35)，10(36)，11(178)*，11(179)*，12(39)，14(40)，16(43)，17(45)，18(180)*，20(51)，20(182)*，23(57)，31(187)*，41(194)*

其餘爲無王名有紀年數者：

3(11)，3(12)，4(15)，4(16)，4(171)*，5(20)，5(22)，5(25)，5(26)，5(172)*，6(27)，6(28)，7(173)*，8(31)，8(32)，9(33)，9(174)*，9(175)*，9(176)*，11(37)，11(177)*，12(38)，15(41)，16(42)，17(44)，18(46)，18(47)，18(181)*，19(48)，20(49)，20(50)，20(52)，21(53)，22(54)，22(55)，22(56)

若將兩者者合併，則爲：

1(170)*, 2(10), 3(11), 3(12), 3(13), 3(14), 4(15), 4(16), 4(17), 4(18), 4(171)*,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172)*, 6(27), 6(28), 7(29), 7(173)*, 8(30), 8(31), 8(32), 9(33), 9(34), 9(174)*, 9(175)*9(176)*, 10(35), 10(36), 11(37), 11(177)*, 11(178)*, 11(179)*, 12(38), 12(39), 14(40), 15(41), 16(42), 16(43), 17(44), 17(45), 18(46), 18(47), 18(180)*, 18(181)*, 19(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182)*, 21(53), 22(54), 22(55), 22(56), 23(57), 31(187)*, 41(194)*

可按其紀年數精簡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1, 41 或 1—12, 14—23, 31, 41。

據此，可以得到以下印象:

A 迦膩色迦可能開創了一個紀元，姑稱之爲“迦膩色迦紀元”。

B 銘文最遲的紀年數是 41 年，似乎迦膩色迦至少在位 41 年。但 41 年的銘文稱:“Kaniṣka, Vājheṣka 之子”。而據臘跋闥柯銘文，Kaniṣka 一世應爲 Vima Kadphises 之子。[3] 因此。這篇年代爲 41 年銘文可能屬於迦膩色迦二世。至於這位迦膩色迦二世之父 Vājheṣka，應該就是下文要提及的 Vāsiṣka。

2. 按照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的紀年數，迦膩色迦之後的貴霜王應爲 Vāsiṣka。在可以歸屬 Vāsiṣka 的銘文中，與我們的討論有關者有 6 篇。[4] 其中，有王名又有紀年數者 3 篇:

22（58），24（59），28（62）

其餘爲無王名有紀年數者：

25（60），26（61），28（63）

若將兩者合併則爲：

22（58），24（59），25（60），26（61），28（62），28（63）

可按其紀年數精簡爲：

22，24—26，28.

據此，Vāsiṣka 至少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22—28 年在位。但是，這裏的矛盾是第 22—28 年這一時段和上述迦膩色迦的在位年代有所重疊。這至少有三種可能性：

其一，如果迦膩色迦在位最少 31 年，至少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 22—28 年，則 Vāsiṣka 和迦膩色迦同時在位，亦即兩者一度聯合統治。當然也可能是貴霜王國處於分治狀態。

其二，Vāsiṣka 的在位年代也可能是 24—28 年，蓋指所謂迦膩色迦紀元 22 年的銘文屬於 Vāsiṣka 不是沒有疑問的，由於銘文的王名爲 Vasakushāṇa。[5]

其三，Vāsiṣka 在迦膩色迦紀元百年之後在位，祇是其紀年省去了百位數。換言之，Vasiṣka 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122—128 年在位。迦膩色迦紀元第 22 年銘文的王名 Vasakushāṣa 則可能是 Vāsiṣka 的另

一種拼法。這樣一來，年代爲 41 年銘文所屬迦膩色迦二世就有可能是 Vāsiṣka 的繼承者了。

3. 按照紀年數，Vāsiṣka 之後的貴霜王應該是 Huviṣka。在可以歸屬 Huviṣka 的銘文中，與我們的討論有關者有 63 篇。[6] 其中，有王名又有紀年數者 29 篇：

28（64），28（65），28（68），29（69），29（70），31（71），31（73），33（76），33（78），35（82），36（83），38（84），39（85），40（87），45（89），47（94），48（108），48（109），50（113），50（114），50（115），51（117），53（120），58（123），60（124），62（126），4 ≈ 30（189）*，34（190）*，51（197）*

其餘爲無王名有紀年數者：

31（72），32（74），32（75），33（77），35（79），35（80），35（81），40（86），42（88），45（90），46（91），47（92），47（93），47（95），47（96），47（97），47（98），47（99/100），47（101），47（102），49（110），50（111），50（112），51（116），52（118），52（119），54（121），57（122），62（125），39（191），40（192），40（193），48（196），61（198）

若將兩者合併，則爲：

28（64），28（65），28（68），29（69），29（70），31（71），31（72），31（73），32（74），32（75），33（76），33（77），33（78），34（190）*，35（79），35（80），35（81），35（82），36（83），38（84），

39（85），39（191），40（86），40（87），40（192），40（193），42（88），45（89），45（90），46（91），47（92），47（93），47（94），47（95），47（96），47（97），47（98），47（99/100），47（101），47（102），48（108），48（109），48（196），49（110），50（111），50（112），50（113），50（114），50（115），51（116），51（117），51（197）*，52（118），52（119），53（120），54（121），57（122），58（123），60（124），61（198）62（125），62（126），4≈30（189）*

可按其紀年數精簡爲：

28，29，31，32，33，34，35，36，38，39，40，42，45，46，47，48，49，50，51，52，53，54，57，58，60，61，62 或 28—29，31—36，38—40，42，45—54，57—58，60—62

據此，Huviṣka 至少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 28—62 年在位。但問題在於有兩篇屬於迦膩色迦銘文的年代爲 31 年和 41 年。如欲調和這一矛盾，則應假定，迦膩色迦一世統治最遲不超過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的第 28 年，Huviṣka 且於這一年即位。至於年代爲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31 年（No. 187）和第 41 年（No. 194）的銘文則歸諸迦膩色迦二世。這位迦膩色迦二世的在位年代則有兩種可能：

其一，在上述銘文紀年重疊的年代和 Huviṣka 共同統治。

其二，其年代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百年之後：其銘文的紀年省去了百位數。

此外，尚需說明的是屬於 Huviṣka 的年代爲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4 年的銘文（No. 189）。一般認爲：這一紀年數代表 Huviṣka 實際在位年數。也就是說這篇銘文作者並未採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紀年。否則，

便是 Huviṣka 二世留下的銘文。Huviṣka 二世即位當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百年之後，4 年相當於 104 年。也就是說，這位君主幾乎是所謂迦膩色迦紀元滿百年之後第一位在位的貴霜王，早於 Vasiṣka。

又如前述，Vasiṣka 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22—28 年在位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蓋屬於 Vasiṣka 的兩篇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28 年的銘文（No. 62 和 63）日期分別爲“冬季（hemanta）第 1 月”和“第 3 月”，而屬於 Huviṣka 的所謂迦膩色迦紀元 28 年的兩篇銘文（No. 64 和 65）日期分別爲 Gurppiya 月（即馬其頓曆的 Gorpiaios 月，相當於 Indian 天文曆的 Proshṭhapada 月）第 1 日和雨季（varshā）第 2 月的第 26 日。換言之，兩者雖然均有年代爲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28 年的銘文，Huviṣka 既在 Vasiṣka 之後，無妨在這一年取代前者登基。

4. 同理，按照紀年數，繼 Huviṣka 之後即位的貴霜王應爲 Vāsudeva。在可以歸屬 Vāsudeva 的銘文中，與我們的討論有關者有 46 篇。[7] 其中，有王名又有紀年數 9 篇：

67/64（127），74（132），80（136），83（139），84（141），87（147），93（153），98（156），170（159）

無王名有紀年者：

68（199）*，70（200）*，70（201）*，71（128），72（129），74（130），74（131），75（133），75（133），76（202）*，79（134），80（135），80（203）*，80（204）*，81（137），81（205）*，82（138），82（206）*，83（140），83（207）*，84（142），85（143），86（144），86（145），87（146），89（208）*，89（209）*，90（148），91（149），91（210）*，92（150），92（151），93（152），95（154），97（155），98（157），122（211）

若將兩者合併，則爲：

67/64（127）, 68（199）*, 70（200）*, 70（201）*, 71（128）, 72（129）, 74（130）, 74（131）, 74（132）, 75（133）, 75（133）, 76（202）*, 79（134）, 80（135）, 80（136）, 80（203）*, 80（204）*, 81（137）, 81（205）*, 82（138）, 82（206）*, 83（139）, 83（140）, 83（207）*, 84（141）, 84（142）, 85（143）, 86（144）, 86（145）, 87（146）, 87（147）, 89（208）*, 89（209）*, 90（148）, 91（149）, 91（210）*, 92（150）, 92（151）, 93（152）, 93（153）, 95（154）, 97（155）, 98（156）, 98（157）, 122（211）, 170（159）

其紀年數且可精簡爲：

67, 68, 70, 71, 72, 74, 75, 76,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9, 90, 91, 92, 93, 95, 97, 98 或 67—68, 70—72, 74—76, 79—87, 89—93, 95, 97, 98

據此，至少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64/67—98 年 Vāsudeva 在位。年代爲 122 年的銘文不見王名，不屬於 Vāsudeva 也未可知。至於 170 年的銘文則可以歸屬於 Vāsudeva 二世。[8]

5. 除了以上諸銘文外，尚有 3 篇屬於 Vājheṣka 的銘文。[9] 其中，有王名有紀年數者 1 篇：20（No. 183）*；無王名有紀年數者 2 篇：20（No. 184）*、28（No. 185）*。若將"有王名又有紀年數"者與"無王名有紀年數"者合併，則爲：20（No. 183）、20（No. 184）、28（No. 185），其紀年數且可精簡爲：20、28。據此，可知這位 Vājheṣka 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 20—28 年在位。

今案:Vājheṣka 似乎可以和 Vāsiṣka 勘同。一則名字相類，二則年代重疊。果然，則 Vāsiṣka 在位應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百年之後，亦即 20—28 年省去了百位數：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120—128 年。

這樣，根據銘文，我們可以得出迦膩色迦以降貴霜王系如下（按所謂迦膩色迦紀元年份排列）：

Kaniṣka I 1—23

Huviṣka 28—62

Vāsudeva 64/67—98

Huviṣka II [10]4

Vasiṣka [1]20—[1]28

Kaniṣka II [1]31—[1]41

Kaniṣka、Hu.viṣka 和 Vāsudeva 依次相隨，跨度爲 100 年。然後似乎是一個新的系列：姑且不論 Vāsudeva 二世，Kaniṣka 二世、Vasiṣka 和 Kaniṣka 二世這三者跨度超過了 41 年。這一個半世紀的絕對年代是什麼？便是所謂迦膩色迦的年代問題。

今案：指迦膩色迦開創了一個新的紀元僅僅是一種可能性。迦膩色迦很可能沒有創建新的紀元，而是沿用其父親曾經採用的紀元。

1. 已知迦膩色迦之前的貴霜諸王，丘就卻和閻膏珍，均曾採用元年爲公元前 58 年的所謂超日紀元紀年。[10] 閻膏珍的銘文不僅採用過所謂超日紀元，還曾採用元年爲公元前 170 年的所謂 Eucratides 紀元紀年。[11] 既然 Rabatak 銘文明載迦膩色迦係閻膏珍之子，就應該承認：迦膩色迦作爲閻膏珍的繼承者，非常可能繼續沿用其父親，亦即閻膏珍曾經採用的紀元。

2. 迦膩色迦以下貴霜列王沿用同一紀元至少 98 年，也表明貴霜諸王並沒有登基必須改元的意識或習慣。Vāsudeva 一世之後，所謂迦膩

色迦紀元很可能又被連續使用了半世紀。[12] 這同樣是貴霜王並不因王位更替而改元的證據。

3. 迦膩色迦之父閻膏珍的年代爲 187 年的 Khalatse 銘文，按所謂超日紀元（元年爲公元前 58 年）計算，絕對年代爲公元 129 年。而同屬於閻膏珍的年代爲 299 年的 Surkh Kotal 銘文按所謂 Eucratides 紀元（元年爲公元前 170 年）計算，其絕對年代也是公元 129 年。[13] 既然迦膩色迦是閻膏珍的繼承人，這公元129年應該就是迦膩色迦即位年代之上限。

4. 如果迦膩色迦紀元就是所謂超日紀元，按這一紀元紀年的銘文之年數顯然是省去了百位數 2。換言之，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1 年應即所謂超日紀元第 201 年。而如果迦膩色迦紀元就是所謂 Eucratides 紀元，按這一紀元紀年的銘文之年數顯然是省去了百位數 3。換言之，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1 年應即所謂 Eucratides 紀元第 301 年。不言而喻，無論是所謂超日紀元 201 年（公元 143 年）還是所謂 Eucratides 紀元第 301 年（公元 131 年）都未必是迦膩色迦即位之元年，而衹能視爲迦膩色迦即位之年的下限。

5. 迦膩色迦由 Huviṣka 繼承，Huviṣka 又由 Vāsudeva 繼承。屬於 Huviṣka 的銘文最大紀年數是 62，屬於 Vāsudeva 的銘文之最小紀年數是 64，兩者分別爲所謂超日紀元 262 年和 264 年，或所謂 Eucratides 紀元第 362 年和 364 年。因此，Vāsudeva 可能即位於所謂超日紀元 262/264 年（公元 204/206 年）或所謂 Eucratides 紀元 362/364 年（公元 192/194）。

6. 如果迦膩色迦紀元就是所謂超日紀元，Vāsudeva 一世之後貴霜列王的銘文紀年都省去了百位數 3。而如果迦膩色迦紀元就是所謂 Eucratides 紀元，Vāsudeva 一世之後貴霜列王的銘文紀年都省去了百位數 4。換言之，迦膩色迦的創新僅限於沿用舊紀元時省略其百位數。

要之，迦膩色迦並未新創紀元，所謂迦膩色迦紀元不過是迦膩色迦自其父親繼承的所謂超日紀元或所謂 Eucratides 紀元，迦膩色迦衹是在

紀年時省去了百位數 2 或 3。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是公元 143 年或 131 年。這一年未必是迦膩色迦即位之年。既然傳世迦膩色迦的銘文最小紀年數是 1，公元 143 年或 131 年應爲其即位年代之下限。而如前述，其上限應爲公元 129 年，亦即其父閻膏珍存世銘文最遲的年份。

迦膩色迦即位之年落在公元 129—143 年或公元 129—131 年之間，這一結論似乎經得起各種資料的檢驗。

一　錢幣

1. 傳世的 Kaniṣka 的錢幣，都屬於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的創建者 Kaniṣka（一世）。錢幣學的證據不支持存在兩個 Kaniṣka。這可能是因爲 Ārā 銘文的 Kaniṣka（二世）沒有發行錢幣。當然，另一種可能性是這位 Kaniṣka（二世）的錢幣還沒有被發現。[14]

2. 儘管 Huviṣka 錢幣的數量很多，類型豐富，但錢幣學的證據不支持兩個 Huviṣka 的存在。或者說，現存錢幣無妨全部歸屬 Huviṣka 一世。[15]

3. Vāsudeva 的錢幣數量不少，類型豐富，出土範圍大。不無理由懷疑這些錢幣並不屬同一位 Vāsudeva，也就是說其中若干也許屬於另一個 Vāsudeva（二世），甚至可能存在 Vāsudeva 三世。而提及 Vāsu 的錢幣的出現使問題更趨複雜。這一切要得到明確結論尚有待更新證據的發現。[16]

4. 從 Begrām 到 Bengal 發現了大量錢幣，其中有王名爲 Kaneshko 者，一說可能屬於 Kaniṣka 三世。[17] 而前述提及 Vāsu 的錢幣一說可能屬於 Vāsudeva 三世。[18]

5. 不存在 Vasakushāṇa 的錢幣。[19]

今案：就 Kaniṣka 系列諸王的次序而言，錢幣學的證據和銘文的證據並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　遺址

1. 迦膩色迦在時間上和閻膏珍緊密相連，而且確實是後者的繼承者。這一點因坦叉始羅遺址出土的兩者錢幣所處地層的關係而幾乎沒有疑問。[20] 質言之，坦叉始羅遺址的考古學證據對於判定迦膩色迦年代最重要的貢獻在於排除了迦膩色迦年代先於丘就卻至閻膏珍一組貴霜統治者的可能性。

2. 貝格拉姆的考古發掘展示了遺址的三個地層。貝格拉姆 I 的年代早於迦膩色伽，其中可見丘就卻和閻膏珍的錢幣與印度—希臘、印度—斯基泰、印度—帕提亞君主們的錢幣混合在一起。貝格拉姆 II 則包括了迦膩色迦、Huviṣka 以及 Vāsudeva 的錢幣。[21] 這同樣清楚地說明迦膩色迦的年代不可能早於閻膏珍。貝格拉姆 III 則是一個廢墟，其中出土了 8 枚劣質的 Vāsudeva 的錢幣。

今案：坦叉始羅遺址的發掘排除了若干迦膩色迦年代說成立的可能性，譬如公元前 58 年說等因此無人信從。而依據銘文所推出的迦膩色迦和丘就卻、閻膏珍之間的關係，以及依據銘文紀年列出的迦膩色迦及其繼承人的次序，與貝格拉姆遺址考古發掘的結果也是可以協調的。

三　中國史料

1.《後漢書·西域傳》稱該傳所傳西域事情“皆安帝末班勇所記”。既然傳文未及迦膩色迦，說明迦膩色迦即位應遲於安帝末年（公元 125 年）。又，傳文沒有提及閻膏珍之死，似乎說明閻膏珍可能去位於 125 年之後。

2. 據《三國志·魏書·明帝紀》，太和三年（公元 229 年），十二

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氏王”。《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也提到朝魏西域諸國中有月氏。又，《魏略·西戎傳》所謂“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幷屬大月氏”，似表明在傳文描述的時代，吐火羅斯坦、喀布爾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均役屬貴霜王國。

3. 據《後漢書·西域傳》，“安帝元初中（公元 114—119 年），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另一方面，《大唐西域記》卷一有載：迦膩色迦時，“河西蕃維，威威送質”。似乎安帝元初中，迦膩色迦已經在位。

今案：既然截止于公元 125 年《後漢書·西域傳》的資料不載閻膏珍之死，亦未載迦膩色迦事蹟，說明閻膏珍去位和迦膩色迦即位在公元 125 年之後。又，貴霜人和大月氏人同出一源，“月氏”和“貴霜”客觀上是同名異譯，故授予波調的“大月氏王”與“大貴霜王”無異。無妨認爲 Vāsudeva 即公元 229 年遣使曹魏明帝之大月氏王波調。如前所述，Vāsudeva 於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64/67—98 年（公元 207/210—241 年或公元 195/198—229 年）間在位，其人與曹魏明帝（公元 227—239 年）無疑同時代。既然在《魏略·西戎傳》描述的時代，吐火羅斯坦、喀布爾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均役屬貴霜帝國，其時貴霜王應該是 Vāsudeva 一世，而不是可能存在的 Vāsudeva 二世。至於《大唐西域記》所載迦膩色迦之質子並非疏勒之臣磐，有關記載無助於判定迦膩色迦之年代。[22]

四　亞美尼亞史料

據 Moses Khoren 的《亞美尼亞史》（II, 72）記載，有貴霜統治者 Vehsadjan 曾響應亞美尼亞王 Khosrov 號召，一起反抗 Artashir。[23]

今案：Vehsadjan 可與 Vāsudeva 勘同，而 Artashir 無疑即薩珊王 Ardashir 一世。[24] Vāsudeva 既於所謂迦膩色迦紀元 64/67—98 年（所謂超日紀元第 264/267—298 年、所謂 Eucratides 紀元第 364/367—398 年）在位，當與 Ardashir 一世（公元 224—240 年在位）同時代。

五 波斯、阿拉伯史料

貴霜似乎最先失去對 Bactria 周圍地區的控制，一般認爲這是薩珊進攻的結果。這一事件可能發生在薩珊王朝的創始人 Ardashīr 一世的治期（公元 224—240 年）。蓋據 Al-Ṭabarī 的記載：

> 於是，他（阿爾達希爾）自 Sawād 返回 Iṣṭakhr，復自彼處依次進軍 Jurjān（Gorgan）、Abarshahr（Nishapur）、Marw（Merv）、Balkh、和 Khwārazm（Khwarizm），直抵 Khurāsān 最遠的邊陲。此後，他回到 Marw。他殺人如麻，將首級獻祭於 Anāhīdh 之祆廟。嗣後，他自 Marw 返歸 Fārs，在 Jūr 住下來。貴霜、Ṭūrān 和 Makrān 諸王均遣使請降。[25]

也可能發生在 Shāpūr 一世（公元 240—270 年）時期。蓋沙普爾一世的 Naqsh-i Rustam 銘文聲稱，包括“直至 Peshawar 的 Kushanshahr”在內的各處業已臣服，成爲薩珊人的附庸。[26] 換言之，薩珊波斯對貴霜領土的進攻和佔領可能發生在公元 224—270 年間的任何時候。

今案：波斯、阿拉伯史料與以上推定的迦膩色迦的即位年代以及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的次序並無矛盾。

1.Ardashīr 一世可能進攻貴霜的年代（公元 233—238 年）[27] 正落在曹魏明帝的治期（公元 227—239 年），而稍晚於波調朝魏的年代

（公元 229 年），則可知與 Ardashīr 一世發生關係的貴霜統治者有可能是波調。

2. 既然波調可以和 Vāsudeva 一世（已知其銘文最遲的年代是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98 年，亦即所謂超日紀元第 298 年或所謂 Eucratides 紀元第 398 年）勘同，如果其末年正是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98 年，按所謂超日紀元計算，已是公元 241 年，其時 Ardashīr 一世已經去位。因此，如果 Vāsudeva 一世去位是由於受到薩珊打擊，則必定在沙普爾一世治期。貝格拉姆 III 出土的 8 枚 Vāsudeva 的劣質銅幣或者與沙普爾一世的打擊有關。而如果按所謂 Eucratides 紀元計算，時值公元 229 年，則貝格拉姆 III 被毀於 Ardashīr 一世亦未可知。

3. 阿爾達希爾一世和沙普爾一世的進攻可能重創貴霜、使之臣服，卻未必結束貴霜的統治。

六　印度史料

塞種紀元第 72 年的 Junāgadh 銘文上表明西印度"大州長"（mahākṣatrapa）Rudradāman 在公元 150 年左右佔領了信德、Sauvira 及 Mālava。而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11 年的 Sui Vihār 銘文表明這一帶當時在貴霜治下。迦膩色迦即位的年代因此被提前，[28] 或因此被推遲。[29]

今案：《後漢書·西域傳》稱閻膏珍征服印度後，"置將一人監領之"。"監領"應該是貴霜人統治中亞和印度廣大征服地區的主要手段。置"將"，可能是利用土著，亦即扶植傀儡。[30] 而所謂"大州長"，畢竟不是最高統治者的尊號，也許就是《後漢書·西域傳》所謂"將"。完全有理由認爲迦膩色迦採用其父閻膏珍一樣的統治方式。具體而言，作爲貴霜王朝的"大州長"，Rudradāman 承認貴霜的宗主權，但有較大的自治權，可以採用自己的紀元。換言之，

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11 年（公元 154 年或 142 年）的 Sui Vihār 銘文和塞種紀元第 72 年（公元 150 年）的 Junāgadh 銘文並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七　羅馬方面的證據

錢幣學的研究表明，貴霜錢幣可能拷貝自羅馬錢幣：閻膏珍摹倣了 Trajan，迦膩色迦摹倣了 Hadrian（公元 117—138 年），Huviṣka 則摹倣了 Antonius Pius，諸如此類。[31]

今案：這種類型對比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32] 同一位錢幣學家，以相同的錢幣作依據，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33] 總之，很難將錢幣類型作爲迦膩色迦年代之絕對證據。可以指出的僅僅是，以上推定的迦膩色迦即位年代，無妨其錢幣之原型取自 Hadrian。

以上考察表明，各種資料與推定迦膩色迦年代最基礎的銘文資料並無牴牾之處。但是，無論任何一種資料或其綜合，均無從據以確定迦膩色迦即位於哪一年。

最後，將貴霜王朝迦膩色迦以下諸王铭文之年代列表如下：

Kushan kings	the so-called Kaniska era	the so-called Vikrama era	the so-called Eucratides era	the Christian Era	
				in the so-called Vikrama era	in the so-called Eucratides era
Kaniṣka I	1—23	201—223	301—323	143—165	131—153
Huviṣka	28—62	228—262	328—362	170—204	158—192
Vāsudeva	64/67—98	264/267—298	364/367—398	206/209—240	194/197—228
Huviṣka II	104	304	404	246	234
Vasiṣka	120—128	320—328	420—428	262—270	250—258
Kaniṣka II	131—141	331—341	431—441	273—283	261—271

■ 注釋

1 本文所引貴霜銘文均依據 S. Shrava, *The Dated Kushāṇa Inscriptions.* Pranava Prakashan, New Delhi: 1993。該書對諸銘文的原始出處均有交代，茲不一一。

2 表示銘文文字爲佉盧文，其餘則爲婆羅謎文。括號中數字諸銘文在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中的編號。此外，據 S. Shrava 書，尚有有王名無紀年數者 8 篇（No. 3, 4, 5, 7, 8, 9, 169*, 188*），無王名亦無紀年數者 1 篇（No. 6）。

3 參看余太山"新發現的臘跋闥柯銘文和《後漢書・西域傳》有關閻膏珍的記載",《新疆文物》2003 年第 3・4 輯, pp. 43—47。

4 據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此外，尚有有王名無紀年數者 1 篇（No. 186*）。

5 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 p. 53。

6 * 表示銘文文字爲佉盧文，其餘則爲婆羅謎文。此外尚有有王名無紀年數者 3 篇（No. 66, 67, 195*），無王名亦無紀年數者 5 篇（No. 103, 104, 105, 106, 107）。

7 此外，據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尚有有王名無紀年數者 1 篇（No. 158）。

8 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 p. 126。

9 據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 pp. 148—151。

10 參看本書第二章和第三章。

11 J. Harmatta,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 the Kushan Empire." In J.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UNESCO, 1994, pp. 417—440.

12 J. E. Van Lohuizen-de Leeuw, *The "Scythian" Period.* Leiden: E. J. Brill: 1949, pp. 232—262. 另說 Vāsudeva 之後的貴霜王開創了另一個紀元，見 J. M. Rosenfield, "The Mathura School of Sculpture; Two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Kushan Chronology." In A. L. Basham, ed.,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ska. Leiden*, 1968, pp. 259—277。今案：後說並無確證。

13 注 11 所引 J.Harmatta 文。

14 亦有人認爲在今巴基斯坦、和闐、喀什出土的若干 Kaniṣka 錢幣可歸屬 Kaniṣka 二世。見 S. Shrava, The Kushāṣa Numismatics, Pranava Prakashan. New Delhi: 1985, pp. 123, 224。

15 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 p. 126。

16 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 pp. 223—224。

17 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 pp. 225—229。

18 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 pp. 229—232。

19 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 p. 225。

20 J. Allan, *Cambridge Shorter History of India*. Cambridge, 1934, p. 76.

21 R. Ghirshman, *Bégram,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les Kouchans*. Le Caire, Imperimerie d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46, pp. 105—108.

22 說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pp. 491—493。A. K. Narain, "Indo-Europeans in Inner Asia." In D.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1990, pp. 151—176, esp. 164—165，將兩者勘同，且據以推斷迦膩色迦年代，似未安。

23 *Moses Khorenats'i History of the Armenians*.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on the Literary Sources by Robert W. Thom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1978, pp. 218—219.

24 注21所引R. Ghirshman書，p. 155。

25 *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 vol. 5.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C. E. Bosworth. New York: 1999, p. 15.

26 R. N. Frye,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 München: 1984, pp. 371—373, esp. 371.

27 J. Harmatt, "Minor Bactrian Inscription."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3 (1965), pp. 149—205.

28 Kielhorn1905—1906 = F. Kielhorn, "Junagadh Rock Inscription of Rudradaman; the Year 72." *Epigraphia India* 13 (1905—1906), pp.36—49.

29 B. N. Puri, *India under the Kushāṇas*. Bombay, 1965, pp. 38—39.

30 貴霜採用這樣的統治方式可以說是必然的，遊牧部族佔領農耕區以後大抵採用這樣的方式，嚈噠統治中亞的情況可以參證。參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pp. 129—142。

31 R. Göbl, "Roman Patterns for KushāṇaCoins."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22 (1960), pp. 75—95; R. Göbl, "Numismatic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Date of Kaniṣka." In A. L. Basham, ed.,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ṣka*. Leiden, 1968, pp. 103—113.

32 D. W. MacDowall, "Numismatic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Kaniṣka." In A. L. Basham, ed.,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ṣka*. Leiden, 1968, pp. 134—149. D. W. MacDowall, "Numismatic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Kaniṣka." *Afghanistan Quarterly* 24 (1971—1972), No. 1, pp. 133—149.

33 R. Göbl後來改持"公元232年"說，見R. Göbl, *System and Chronology of the Coinage of the Kushan Empire, A English language Companion to the original German Work*, by Warren A. Schwartz, 1984, pp. 52, 82。

五　貴霜王朝的終結

一

一般認爲，貴霜朝之亡始於薩珊朝之入侵，時值貴霜王 Vāsudeva 一世（公元 206/209—240 或公元 194/197—228 年）在位。可能在 Vāsudeva 一世去世之後，貴霜國分裂爲東西兩部，西部（巴克特里亞等地）終於淪爲薩珊朝屬土。由於資料的貧乏，薩珊波斯併吞貴霜西部的時間難以確定，主要有兩說。一說是阿爾達希爾一世（Ardashīr I，公元 224—240 年）治期。另說在沙普爾一世（Shāpūr I，公元 240—270 年）治期。

今案：兩說各有其合理内核，若將有關資料和說者的分析結合起來，貴霜西部被薩珊併吞的過程似乎可以得到更清晰的理解。蓋據泰伯里記載：

> 於是，他（阿爾達希爾）自 Sawād 返回 Iṣṭakhr，復自彼處依次進軍 Jurjān（Gorgan）、Abarshahr（Nishapur）、Marw（Merv）、Balkh 和 Khwārazm（Khwarizm），直抵 Khurāsān 最遠的邊陲。此後，他回到 Marw。他殺人如麻，將首級獻祭於 Anāhīdh 之祆廟。嗣後，他自 Marw 返歸 Fārs，在 Jūr 住下來。貴霜、Ṭūrān 和 Makrān 諸王均遣使請降。[1]

既然 Balkh 等地均爲阿爾達希爾一世佔領，貴霜王朝受到沉重打擊殆

無疑義。Begram 的發掘結果也表明了這一點。[2] 但很可能貴霜王朝並未就此滅亡，其西部領土亦未必於此時完全併入薩珊。我們注意到，阿爾達希爾一世在完成軍事行動後便回到了 Merv。而貴霜王遣使請降表明該政權雖然屈服但依舊存在。

據《三國志·魏書·明帝紀》，太和三年（公元 229 年），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氏王”。這次遣使很可能是貴霜王波調在受到來自薩珊朝的威脅後，求助於曹魏。

我們無法確定泰伯里所載阿爾達希爾一世入侵貴霜，以及貴霜王向阿爾達希爾一世遣使請降的具體年代，但這位貴霜王很可能正是遣使曹魏的波調（Vāsudeva 一世）。既然《魏略·西戎傳》有載“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似乎在傳文描述的時代，吐火羅斯坦、喀布爾河流域乃至印度河流域至少在名義上依舊是貴霜的屬土。換言之，在 Vāsudeva 一世即波調遣使曹魏前後貴霜還保持著形式上的統一，遣使薩珊無非是稱臣致貢而已，其領土未必已被薩珊佔領。事實上，泰伯里也沒有留下這樣的記載。

另一方面，沙普爾一世的 Naqsh-e Rustam（Kacbe-ye Zardusht）銘文列出了公元 260 年左右薩珊帝國東部諸省，包括：

> Media、Gurgan（Gorgan）、Merv、Herat、Aparshahr（Nishapur）全境、Kerman、Seistan、Turan、Makuran、Paradene、Hindustan（India），直至 Peshawar 的 Kushanshahr。[3]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當然是“直至 Peshawar 的 Kushanshahr”這樣的提法。這裏的 Kushanshahr 很可能已經不再是原貴霜王朝的統治者，而是薩珊波斯爲控制原貴霜領土而設置的地方首長。因爲原貴霜統治者並不自稱“shahr”。當然，若僅僅依據這篇銘文，另一種可能性也

不能完全排除：原貴霜王業已俯首稱臣，自“天子（devaputra）”降格爲“shahi”。

不管怎樣，既然直至 Peshawar 的原貴霜統治區已被列入薩珊領土，則遲至沙普爾一世的 Naqsh-e Rustan 銘文描述的年代，印度河以西已被薩珊征服。

由此可見，不妨認爲薩珊朝波斯領有貴霜西部始於阿爾達希爾一世，完成於沙普爾一世。

若干學者認爲貴霜崩潰的時間應在公元 180 年左右，因爲這一年代和北印度一些部落國家興起的時間相一致。[4] 其實，這些部落政權的存在不足以否定上述貴霜王朝崩潰年代的推定。蓋即使在極盛時期，貴霜人也未必能夠完全控制其領土的每一部分。他們很可能假手土著政權進行統治。而隨著其勢力衰落，這些土著政權的數目和實力也隨之增長。換言之，不能將這些部落政權的存在或興起視爲貴霜王朝崩潰的標誌。

如前所述，很可能由於薩珊朝波斯的打擊，貴霜分裂爲東西兩部。而在西部併入薩珊時，東部即印度河以東，暫時還處於貴霜人治下。貴霜衰亡不可能僅僅由於受到薩珊的打擊，一定有內部的原因，因而另一種可能性應予重視：在受到薩珊打擊之前，貴霜最高統治者已經不能有效控制全境，尤其是東部。一個處於衰落中的國家面對新興的薩珊朝波斯不堪一擊似乎更合乎情理。

較可靠的觀點（主要依據錢幣學的證據）是：貴霜分裂後，東部的貴霜人或其支系在旁遮普中部和東部苟延殘喘直至公元四世紀前半葉。[5]

二

錢幣學的證據表明：薩珊朝波斯曾設置機構統治所佔貴霜領土，

其首領稱 Kushanshahr（Kūšānšahr），均係薩珊王族，史稱“貴霜—薩珊”政權。

顯然，“貴霜—薩珊”政權的出現是貴霜王朝滅亡的標誌。因而 Kushanshahr 出現的時間，對於考訂貴霜王朝的年代，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如前所述，沙普爾一世的銘文中已出現 Kushanshahr，這表明在銘文描述的年代“貴霜—薩珊”政權可能已經存在。而錢幣學的研究似乎則進一步表明，“貴霜—薩珊”政權的出現時間最早可以追溯到阿爾達希爾一世治期。[6]

但是，阿爾達希爾一世進軍直至貴霜腹地，旋即退軍 Merv，並未駐軍控制貴霜的領土，而貴霜王隨即遣使請降也表明這一政權在阿爾達希爾一世進攻之後至少是作爲屬國依舊存在，也就是說在泰伯里描述的時代貴霜的領土上還沒有薩珊任命的 Kushanshahr。

這一矛盾是可以調和的。儘管原來的貴霜政權在阿爾達希爾一世時代依舊存在，但並不排斥這樣一種可能性：薩珊朝任命 Kushanshahr 監領成爲屬國的貴霜，且在不久之後廢黜原貴霜君主使 Kushanshahr 成爲貴霜領土事實上的統治者。

至於沙普爾一世的銘文將 Kushanshahr 作爲薩珊朝波斯治下的一個行政單位臚列，則表明在銘文描述的時代之前 Kūšānšahr 已經出現，而且有可能已經成爲原貴霜領土的統治者。

依據現存錢幣資料，一說 Kushanshahr 的世系可臚列如下：[7]

1. Shapur Kushanshahr
2. Ardeshir I Kushanshahr
3. Ardeshir II Kushanshahr
4. Firuz I Kushanshahr
5. Hormizd I Kushanshahr

6. Firuz II Kushanshahr

7. Hormizd II Kushanshahr

8. Varahran（Bahrām）I Kushanshahr

9. Varahran（Bahrām）II Kushanshahr

當然，Kushanshahr 出現及其在位年代迄今衆説紛紜。例如：另說阿爾達希爾一世并沒有任命 Kushanshahr，而在沙普爾一世 Naqsh-e Rustam 銘文中，Kushanshahr 衹是作爲行政區劃列出。“貴霜—薩珊”政權的出現要晚到 Hormazd 二世（公元 303—309 年）治世甚或沙普爾二世（Shāpūr II，公元 309—379 年）早期。[8]

其實，指阿爾達希爾一世有沒有任命 Kushanshahr 統治巴克特里亞等地並無直接證據，而沙普爾一世的銘文將 Kushanshahr 與包括新征服地區在内的薩珊各省並列，儘管表明這個地區至少在一開始無論在名義上和事實上都在“王中之王”治下，而在“shahr”之前冠以“Kushan”正説明薩珊朝統治者很清楚巴克特里亞地區的特殊性，因而有别於其他地區。

另外，雖然 Kushanshahr 均係薩珊王族，而由於其地遠離薩珊統治中心，且曾作爲貴霜舊土而具有文化、經濟的特殊性，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原貴霜領土的統治者的獨立性也就與日俱增了。

發現沙普爾一世直接繼承人之一、其子 Varahran 一世（Bahrām I，公元 271—274 年）頒發的帶有巴克特里亞造幣廠印記的銀幣並不能作爲否定其時“貴霜—薩珊”政權業已設置的證據。Varahran 一世作爲宗主自然可以在巴克特里亞造幣廠鑄幣，這並不妨礙巴克特里亞當地的 Kushanshahr 同時擁有自己的造幣廠。

要之，還沒有證據表明“貴霜—薩珊”政權出現的確切時間，只能説最早可能在阿爾達希爾一世晚年或沙普爾一世早期。

三

“貴霜—薩珊”政權的年代問題之所以分歧很大，主要原因是缺乏可資參考的文獻記載。爲挖掘文獻資料，學者們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成果之一，是在漢文史料中發現了“貴霜—薩珊”政權的蛛絲馬跡。[9]有關資料主要見諸《魏書·西域傳》“波斯國條”，兹轉錄如下：

> 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

如一般所認爲,《魏書·西域傳》所傳“波斯國”乃指薩珊波斯。但說者指出：其中“坐金羊牀，戴金花冠”云云，描述的很可能是“貴霜—薩珊”政權统治者的服飾，蓋與錢幣和銀器所見薩珊波斯統治者的服飾不符，而與“貴霜—薩珊”政權統治者的服飾相符，特別與Varahran（Bahrām）二世 Kushanshahr 關係密切。

具體而言，薩珊朝波斯統治者的服飾應如《隋書·西域傳》所傳“坐金師子座”(《舊唐書·西戎傳》作波斯國王“坐獅子牀”)。考察現存全部有關的遺物，並不存在以牡羊或其角裝飾王冠的薩珊波斯國王，衹有“貴霜—薩珊”政權的統治者 Varahran（Bahrām）二世 Kushanshahr 的王座的裝飾是與牡羊有關的。牡羊是祆教戰勝之神 Verethragna（Varahran、Bahram）的表現形式之一。因此，用牡羊或其角裝飾王座腳的，很可能正是 Varahran（Bahrām）二世 Kushanshahr。

至於“戴金花冠”亦不見於薩珊朝波斯國王，而見於“貴霜—薩珊”政權金幣上所刻若干國王立像之王冠，如 Hormizd 一世 Kushanshahr 和 Varahran 二世 Kushanshahr 之王冠頂部。花應是洋薊（artichoke，學名 Cynara scolymus），原產地中海沿岸。

由此可見，“坐金羊床，戴金花冠”所描述者應爲“貴霜—薩珊”政權統治者的服飾。也就是說《魏書·西域傳》關於波斯的記載中混入了“貴霜—薩珊”政權的情況。

問題在於，魏收所撰《魏書·西域傳》久已佚失，今本《魏書·西域傳》乃後人自《北史·西域傳》採入。既然《北史·西域傳》是李延壽據《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下》和《隋書·西域傳》編成，便有可能根據《北史·西域傳》恢復《魏書·西域傳》的原貌，辦法是從《北史·西域傳》中剔除《周書·異域傳下》和《隋書·西域傳》的文字。儘管論者對今本《魏書·西域傳》中究竟哪些字句出自《周書·異域傳下》和《隋書·西域傳》存在意見分歧，《魏書·西域傳》復原的工作可以說基本完成。[10]

今本《魏書·西域傳》的波斯國條也不例外，亦由《北史·西域傳》編者采自《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下》和《隋書·西域傳》三者波斯國條的內容組成。在剔除《周書·異域傳下》和《隋書·西域傳》兩者的文字之後，魏收所撰《魏書·西域傳》“波斯國條”的文字可以復原如下：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土地平正。有鳥，形如橐駞，有羽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馳走甚疾，往往一日能七百里也。文字與胡書異。

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爲妻妾。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

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Kavād I，公元488—496年，公元498—531年）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

今本《魏書·西域傳》波斯國條中“其王姓波氏”以下至“賦稅則準地輸銀錢”一節皆爲《周書·異域傳下》之文。包括了說者所指“坐金羊床，戴金花冠”一段文字在内。

這就是説，上述字句可以肯定不是《魏書·西域傳》的原文，而是《北史·西域傳》的編者采自《周書·異域傳下》者。說者堅持認爲有關描述是魏收原文不可取。儘管如此，鑒於《周書·異域傳下》中有部分内容是北魏時期傳入中國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上述觀點依然可備一說。

應該指出的是，既然有關記載出現在《周書·異域傳下》，説明另一種可能更應該得到重視:《周書·異域傳下》有關記載的年代可能晚至薩珊波斯征服嚈噠之後，而傳文“坐金羊床，戴金花冠”所描述的則是原嚈噠領土上薩珊波斯所置政權的統治者的服飾。

1.《周書·異域傳下》稱“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同時又稱:“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案：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嚈噠在歷史上與大月氏有瓜葛。本傳如是説，衹能認爲是嚈噠（嚈噠）西徙中亞後建國於曾被大月氏征服的地區的緣故。同樣，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波斯與大月氏有聯繫，本傳如是説，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此處所謂“波斯”其實是滅亡嚈噠後、薩珊波斯在原嚈噠統治區建立的政權。

2.《周書·明帝紀》：明帝二年（公元558年）六月癸亥，“嚈噠遣使獻方物”。其時嚈噠已經接近滅亡。[11] 説明有關信息在嚈噠滅亡之後傳入中國是完全可能的。

3. 薩珊波斯進軍嚈噠國土，一度佔領了吐火羅斯坦等地，[12] 設置機構監領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薩珊征服貴霜採用了設置“貴霜—薩珊”

政權進行統治的方式，征服嚈噠後完全可能採取相同的方式。一則征服者都是薩珊，二則征服對象原來都是遊牧部族。

以上或可提供一個新的思路：薩珊朝在征服嚈噠後採取了類似征服貴霜後的統治方式。

■ 注釋

1 *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 vol. 5.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C. E. Bosworth. New York：1999, p. 15.

2 R. Ghirshman. *Bégram,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les Kouchans*. Le Caire, Imperimerie d L'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46, pp. 105—108.

3 R. N. Frye.*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 München：1984, p. 371.

4 R.C. Majumdar, A.S. Altekar, *The Vākāṭaka-Gupta Age*（c.200—550 A.D.）.Banaras：Motilal Banarsi Dass, 1954（*New History of the Indian People*, v. 6.）, p. 12.

5 A. H. Dani, B. A. Litvinsky and M. H. Zamir Safi. "Eastern Kushans, Kidarites in Gandhara and Kashmir, and Later Hephthalites." 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I：The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s, A. D. 250 to A. D. 750.Edited by B. A. Litvinskiy. UNESCO Publishing, 1996, pp. 163—166.

6 A. D. H. Bivar. "The Absolute Chronology of the Kushano-Sasanian Governors in Central Asia." In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Edited by J. Harmatta. Budapest, 1979, pp. 317—332, esp. 331—332. [Cf. J. E. Cribb, "Numismatic Evedence for Kushano-Sasanian Chronology." *Studia Iranica*, 19：2（1990）, pp. 151—193.]

7 A. D. H. Bivar. "The Kushano-Sassanian Coin Series."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18（1956）, 13—42；A. D. H. Bivar. "Sasanians and Turks in Central Asia." In *Central Asia*. Edited by G. Hambly. New York, 1969, pp. 49—62. 其他説法尚有多種，如：M. L. Carter. "A Numismatic Reconstruction of Kushano-Sasanian History." *Museum Notes* 30（1985）, pp. 215—281。

8 A. Nikitin. "Notes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Kushano-Sasanian Kingdom." In

Coins, Art and Chronology: Essays on the Pre-Islamic Histor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Edited by M. Alram and D. E. Klimburg-Salter, pp. 259—263. Coins, *Art and Chronology:Essays on the Pre-Islamic Histor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Vienna: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9, pp. 259—260.

9 K. Tanabe. "The Kushano-Sasanian Governors hidden in Roman and Chinese Sources." In *Studies in Silk Road Coins and Culture*. Edited by K. Tanabe, J. Cribb, H. Wang, London / Kamakura, 1997, pp. 75—88.

10 詳見余太山"《魏書・西域傳》原文考",載《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pp. 65—94。

11 詳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pp. 103—113。

12 同注11。

六　寄多羅貴霜的若干問題

一般認爲,《魏書・西域傳》所見大月氏國王“寄多羅”，應即中亞錢銘所見 Kidāra Kushāna Shā[hi]，玆就有關問題略述己見。

一

在各種有關寄多羅貴霜的記載中，漢文史料無疑最應受到重視。這就是《魏書・西域傳・大月氏條》:

> 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

和《魏書・西域傳・小月氏條》:

>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

這是僅存的記載寄多羅貴霜較有系統的文獻資料。

如所週知，魏收原著《魏書・西域傳》已於唐宋間亡軼。今天看到的《魏書・西域傳》是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劉恕等人在整理殘缺的《魏書》時，取《北史・西域傳》補入的。而由於《北史・西域傳》除主要依據《魏書・西域傳》外，還摻雜了《周書・異域傳》和《隋書・西域傳》的內容，近人對考定《魏書・西域傳》原文下了不少工夫。但對於其中"大月氏條"和"小月氏條"，一般認爲均係魏收原文。

通過對上引傳文的研究，關於寄多羅貴霜，大致可以得到以下認識：[1]

1. 寄多羅政權被稱爲"月氏國"，表明寄多羅係貴霜王族之裔。蓋中國史籍一貫將貴霜王朝稱爲"月氏"。

2. 傳文並未明言寄多羅王就是該政權之創始人，只知道《魏書・西域傳》所述"大月氏國"的全部事情均發生於寄多羅王在位期間。可以說，寄多羅王的活動構成了"大月氏國"的歷史。

3. 寄多羅王所都"盧監氏城"（或衍"盧"字），應卽《史記・大宛列傳》所載大夏國都城"藍市"、《漢書・西域傳》所載大月氏國都城"監氏"，亦即吐火羅斯坦首府Bactra。

4. 傳文稱寄多羅月氏國"北與蠕蠕接"。蠕蠕即柔然，早在其可汗社崙在位時（公元402—410年），就有可能越過葱嶺，侵犯吐火羅斯坦。立國該地的寄多羅政權"數爲所侵"應是事實，但未必因此遷都。傳文所謂"西徙都薄羅城"也許是誤傳。"薄羅"，一說乃Bactra的又一譯稱。[2]

5. 寄多羅王立國吐火羅斯坦後，雖屢遭柔然侵擾，仍率兵南征，越過"大山"（興都庫什山），征服了乾陀羅以北五國。按之《魏書・西域傳》，"乾陁羅以北五國"應指渴槃陁之南五國：鉢和、波知、賒彌、烏萇和乾陀羅。

6. 寄多羅月氏國將版圖擴大至興都庫什山之南，卻不敢自北方入

侵之“匈奴”，其王寄多羅因被“匈奴”逐出吐火羅斯坦而西徙。“匈奴”應即新興的遊牧部族嚈噠。

7. 寄多羅王西徙時，命其子留守北天竺的領土，即“乾陁羅以北五國”。《魏書》編者按照前史慣例將西遷寄多羅王所率部衆稱爲“大月氏”，將留守故土者稱爲“小月氏”。

8. 傳文描述寄多羅月氏風俗稱：“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中僅“以金銀錢爲貨”一句可以認爲是寄多羅月氏國的實際情況。“先居西平、張掖之間”云云，無非抄襲前史關於大小月氏的記載。而“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無非是因寄多羅王“西徙”聯想所致。

9.《魏書・西域傳》所載寄多羅貴霜人全部活動年代之下限是公元 437 年。蓋有關記述主要依據北魏世祖太延年間董琬、高明關於西域的報告，而董、高西使歸國的年代是太延三年（公元 437 年）十一月。換言之，截止這一年，不僅寄多羅王業已征服乾陀羅以北五國，很可能已被“匈奴”逐出吐火羅斯坦西徙。《魏書・西域傳》可能包括董、高西使之後的資料，關於大小月氏的情報不應例外，但如果考慮到嚈噠西徙吐火羅斯坦的年代不遲於五世紀三十年代末，則董、高報告中已含有關於寄多羅王西徙的信息也是可能的。

二

除中國史籍外，可注意者還有亞美尼亞史家埃里塞（Elišē）記錄。據載：薩珊波斯伊嗣俟二世（Yazdgird II，公元 438—457 年）即位伊始，其祭師曾對這位國王說：

> 動員軍隊，召集士兵，去進攻貴霜人的國家，帶領全體人民

居住到諸門那邊去吧！當他們完全屈服，遠方不友好的國家也被封鎖住的時候，您的計劃和期望就能實現了。您要統治貴霜人的帝國，正如我們要讓他們瞭解我們的宗教一樣，希臘人也不敢反抗您的力量。[3]

伊嗣俟二世接受了祭師的建議，對他的軍隊和盟國發出了動員令：

我們決定遠征東方，再次平定貴霜人的國家，願神保佑我們！［你們］接到命令，就立即徵集騎兵，隨我來阿巴爾（Apar）州！[4]

於是，“他突然侵入了也被稱作貴霜人的匈人的國家。戰鬬持續了二年，卻未能征服他們”。[5] 上述事件發生在伊嗣俟二世卽位第一至四年（公元 438—441 年）之間。[6]

對埃里塞上述記載，我的理解如下：

1. 雖然沒有提及“寄多羅”，但這裏的“貴霜人”必定和《魏書·西域傳》所載寄多羅月氏有關。

一則，如前所述，中國史籍一貫將貴霜稱爲“月氏國”。這“月氏國”便是埃里塞所謂“貴霜人的國家”。儘管其時吐火羅斯坦業已被嚈噠人佔領，但在伊嗣俟二世心目中，那裏還是貴霜人的領土。

二則，《魏書·西域傳》沒有交代被“匈奴”卽嚈噠逐出吐火羅斯坦西徙的大月氏國寄多羅王的下落，通過埃里塞的記載，我們才得以獲悉，西徙的寄多羅王西向衝擊了薩珊波斯的東部邊疆。埃里塞的記載和《魏書·西域傳》的記載在時間上是相銜接的。公元 436/437 年是寄多羅被逐西徙年代之下限，其明年伊嗣俟二世卽位。

2. 埃里塞將“貴霜”與“匈人”聯稱，結合《魏書·西域傳》的記載似可得到確解。

一則，被“匈奴”逐出吐火羅斯坦西徙的寄多羅貴霜人，很可能

衝擊薩珊波斯的東境，剛剛登基的伊嗣俟二世纔不得不起而迎戰，爲根治邊患而試圖“平定貴霜人的國家”。東西兩種記載時間上的銜接證明了這一點。

二則，從伊嗣俟二世試圖“平定貴霜人的國家”來看，他戰勝了犯境的“貴霜人”。這似乎表明“貴霜人”的力量並不強大，並未蓄意侵略波斯。他們祇是西徙的寄多羅貴霜餘衆。

三則，伊嗣俟二世爲“統治貴霜人的帝國”，而侵入“也被稱作貴霜人的匈人的國家”。這表明波斯人的國王意圖統治的是原貴霜之領土，遭遇的卻是已經逐走寄多羅王、佔有吐火羅斯坦的“匈奴”。新興的“匈奴”即嚈噠人力量自然不是潰敗的寄多羅貴霜可比，因此，伊嗣俟二世入侵吐火羅斯坦的“戰鬬持續了二年”，未能奏功。

伊嗣俟二世最初遭遇者不僅僅是西徙的寄多羅貴霜餘衆，還有接踵而至的嚈噠人。波斯人或亞美尼亞人無從正確區分，產生了概念的混亂。“也被稱作貴霜人的匈人”，客觀上就是來自貴霜領土之匈人或征服了貴霜之匈人。

3. 結合《魏書・西域傳》和埃里塞的記載，可以知道這些“貴霜人”均被伊嗣俟二世視爲敵人，其故土吐火羅斯坦也是伊嗣俟二世打算平定的地方。這似乎表明這些寄多羅月氏或“貴霜人”不可能是所謂貴霜—薩珊人。

三

除埃里塞外，拜占庭史家普里斯庫斯的有關記載也值得重視。這位史家多次提到波斯人與“Kidara 匈人（Οὖννοι οἱ Κιδαρῖται）”之間的戰爭（33, 41, 47, 51）。[7] 其中最詳細且可供討論的是第 41 章第 3 節的有關記載：公元 465 年，當拜占庭皇帝 Leo 一世（公元 457—474 年在位）的使者 Constantius 抵達波斯時，波斯王卑路斯正駐蹕在與“寄

多羅匈人鄰接的邊境上”。

戰爭隨之爆發，戰爭的原因是 Huns 收不到波斯人和帕提亞統治者此前一直繳納的貢金。這位君主的父親拒絕納貢，選擇了戰爭，其子連同王國一起繼承了戰爭。結果波斯人被這場戰爭拖垮，企圖用欺詐的手段結束與匈人的鬭爭。於是卑路斯（Perozes，當時波斯君主的名字）派人去見 Huns 的首領 Kunchas，表示樂意言和，並希望締結盟約，將其姊妹許配給他，因爲他恰好非常年輕，還沒有生兒育女。可是，可汗接受了這些建議時，卻沒有娶到卑路斯的姊妹，娶到的是波斯國王派去的一個僞裝成公主的女人。卑路斯對她說：祇要她不揭穿這一詭計，就能享有王室的身份和優裕的生活，如果說出這一欺詐行爲，就會被處死，因爲 Kidara 人的統治者不會容忍娶一個婢女而不是一位貴族婦女爲妻。和約按照這些條件簽訂，卑路斯不久就從他對 Huns 統治者的背叛中得到了報應。由於該婦人害怕 Huns 統治者有一天會通過他人獲悉她的真實身份，處她以極刑，從而揭穿了欺詐行爲。Kunchas 稱讚了她的誠實，繼續讓她作他的妻子。但爲了懲罰卑路斯使詐，他藉口與鄰邦交戰需要指揮戰事的將軍，而不是士兵（因爲他的士兵爲數衆多）。卑路斯派出了三百名一流的軍官。Kidara 人的統治者殺死了其中若干人，而使其餘人致殘後返回卑路斯處，告訴卑路斯這就是他的背叛應得的懲罰。於是兩國間戰火重燃，戰況激烈。因此，卑路斯在 Gorga 亦卽波斯人駐軍的地點接見了 Constantinus……

在這一節中，與卑路斯敵對的一方被稱爲“寄多羅匈人”，有時也稱爲“Kidara 人的統治者”或“匈人的統治者”。對此，我的理解如下：

普里斯庫斯記載的 Kidara 這一名稱無疑可與見諸《魏書·西域

傳》的“寄多羅”勘同。如果這裏 Kidara 便是《魏書・西域傳》的寄多羅王，說明這位貴霜王自公元 437 年前後西徙，直至公元 457 年卑路斯登基至少 20 年內一直在與薩珊波斯作鬥爭。而依據普里斯庫斯的記載，可以推測寄多羅王業已役屬“匈奴”，充當馬前卒，或和“匈人”結成某種形式的聯盟，與薩珊波斯進行了翻覆的鬭爭。不過，這僅僅是一種可能性。

另一種可能性是：西徙的寄多羅王不久便在和薩珊波斯的鬭爭中，或者在同追逐他的“匈人”的鬭爭中陣亡。其部眾亦爲“匈人”或波斯人消滅。薩珊波斯因而面對“匈人”即嚈噠人的入侵，且因無法戰勝後者一度納貢求和，直至卑路斯即位後才重開戰端。準此，普里斯庫斯所謂“Kidara 人的統治者”乃指統治 Kidara 人的“匈人”，而不是指寄多羅王本人。

目前，我比較傾向於後一種可能性，衹是前一種可能性似乎也無法完全排除。但是，薩珊波斯國王卑路斯所面對的“寄多羅”似乎有別於伊嗣俟二世所遭遇的“貴霜”。不管寄多羅王與“匈人”的關係怎樣，卑路斯的主要敵人無疑是“匈人”，亦即新興的嚈噠人。其人早在五世紀三十年代末就渡阿姆河南下，到卑路斯登上波斯王位時，無疑已經鞏固了在吐火羅斯坦的統治。

普里斯庫斯提到一位“匈人的首領”名 Kunchas，希臘原文爲 Κούγχας，早已有人指出其實不是人名，而是 Qun-Xan 之訛傳。[8] 這 Qun-Xan 顯然便是 Hun-Xan，可譯爲“匈可汗”。貴霜或寄多羅貴霜人均不采用“可汗”這一尊號，這也表明這位首領是一位嚈噠可汗。[9]

四

類似埃里塞和普里斯庫斯這樣模棱兩可的記載還可以舉出《杜行

者喬舒亞年代記》一書。[10] 在這本公元 507 年用敍利亞語撰寫的著作中，提到“波斯國王卑路斯（Pērēz）爲了他和貴霜匈奴（Ḳūšānāyē d-hinnōn Hunnāyē）的戰爭，經常接受希臘人的錢財”。（IX）“由於得希臘人金錢的援助，卑路斯一度制服了匈奴（Hunnāyē），從匈奴手中奪取了許多地方，以增益自己的國土。然而他終於成了匈奴的俘虜。希臘皇帝 Zēnōn 獲悉此事後，便用自己的錢將他贖回，並使之與匈奴和解。於是卑路斯與匈奴簽訂和約，保證不再越境發動對匈奴的戰爭。但他像 Zedekiah 一樣背信棄義、破壞盟約，重啓戰端，也像他一樣落入敵手，全軍潰滅，本人被生擒。”爲了活命，他答應以滿載三十頭騾子的銀幣爲贖金，並留下其子居和多（Ḳawād）爲人質。（X）歸國後，他向全國徵收人頭税，以償付贖金和引渡其子。但是，他很快又徵集了一支軍隊，重燃戰火。結果是波斯人全軍覆沒，卑路斯陣亡。（XI）

今案：卑路斯與之作戰的“貴霜匈奴”，無疑就是普里斯庫斯所謂的“Kidara 人的統治者”。結合同爲拜占庭史家普洛科庇烏斯[11]的記載，可以進一步搞清楚這一名稱的內涵。蓋普洛科庇烏斯有與上引《柱行者喬舒亞年代記》平行的記述：

> 後來，波斯國王卑路斯（Perozes）捲入了一場與嚈噠匈人——他們被稱爲白匈人——爭奪邊境的戰爭。他集結了一支威風凜凜的軍隊，進擊嚈噠。嚈噠人是名副其實的匈人血統，可是與已知的任何匈人不同。他們的領土既不與其他匈人的鄰接，也不靠近，而是緊貼波斯的北境。而在波斯國界的對面，坐落著一座嚈噠人的城市 Gorgo，該城因而成爲雙方頻繁的邊境衝突的中心……

由於嚈噠匈人佯敗，誘敵深入，波斯軍陷入重圍。卑路斯不得已與嚈

嚈噠匈人議和。（I, iii）

> 此後不久，他因急於向匈人報仇雪恥，不顧自己曾立下的誓約，迅速在波斯全境及其盟國徵兵，率之進攻嚈噠。

結果因再度中計而全軍覆沒，卑路斯陣亡。“從此，波斯就成了嚈噠的屬國，向嚈噠進貢，直到居和多（Cabades）鞏固了他的政權，認爲無需再向嚈噠人繳納年貢時爲止。”（I, iv）普里斯庫斯的“Kidara 人的統治者”和《柱行者喬舒亞年代記》的“貴霜匈奴”在普洛科庇烏斯這裏成了“嚈噠匈人”。

又,《柱行者喬舒亞年代記》提及:

> 居和多敗行枉法，波斯顯貴陰謀弑君。居和多獲悉，棄國逃往匈奴國，投奔匈奴王。他曾爲質子，成長於該國王庭。其弟 Zāmāshp 遂取代他統治波斯。居和多本人則在匈奴中娶其姊妹之女爲妻。其姊妹在其父喪生的那場戰爭中被俘去，因係公主，成了匈奴王之妻，匈奴王和她生有一女。居和多來奔，她就將此女許配居和多。因當了駙馬，居和多受到鼓勵，日日哭泣於匈奴王前，懇求軍援以誅叛復辟。匈奴王允其所請，給予大軍。當他踏上波斯國土時，其兄弟已聞風而逃，於是他如願以償，誅殺叛臣。（XXIII-XXIV）

普洛科庇烏斯的平行記述如下:“居和多偕同 Seoses 一起逃跑，居然未被看破行藏，最後投奔了嚈噠匈人（Ephthalitae Huns）。嚈噠國王將其女許配居和多。既爲駙馬，居和多遂率大軍討伐波斯，波斯人不願迎擊，迅速潰散”。居和多終於復辟。（I, vi）

要之，只要將《柱行者喬舒亞年代記》書中有關“貴霜匈奴”或“匈奴”的記載和普洛科庇烏斯的相關記載進行對照，就不難發現上引埃里塞的“也被稱爲貴霜人的匈人”或普里斯庫斯的“Kidara 人的統治者”均爲嚈噠人。

五

以上涉及的諸多事件中，比較明確的年代只有一個：公元 437 年。正是在這一年，董琬、高明西使歸國覆命。這一年因而亦成爲《魏書・西域傳》記述的大、小月氏國事情發生時代之下限。換言之，正是在這一年或之前不久，寄多羅王被“匈奴”逐出吐火羅斯坦西徙，因而薩珊波斯王伊嗣俟二世即位伊始便不得不發動對“貴霜人”的戰爭，蓋西徙者不免衝擊薩珊波斯東境。不用說，“匈奴”即嚈噠人也就是在這一年佔領吐火羅斯坦的。

寄多羅王西徙時，令其子守富樓沙城（Puruṣapura），亦即乾陀羅。中國史籍稱這個偏安興都庫什山以南的貴霜政權爲“小月氏”，其存續時間較長。蓋《魏書》本紀有載：

> 太安五年（公元 459 年）五月，居常國遣使朝獻。（高宗紀）
>
> 和平元年（公元 460 年）冬十月，居常王獻馴象三。（高宗紀）
>
> 太和元年（公元 477 年）九月，車多羅、西天竺、舍衛、疊伏羅諸國各遣使朝貢。（高祖紀上）

“居常”得視爲 Kushan 之對譯，而“車多羅”得視爲 Kidara 之對譯。或據以爲遲至公元 477 年這一政權依然存在。[12]

或以爲上述資料表明嚈噠人勢力越過興都庫什山的時間不可能早

於公元 477 年。今案：嚈噠人入侵印度次大陸的時間另當別論，[13] 僅憑寄多羅後裔朝魏的記載就推斷這一年代則過於草率，因爲嚈噠人征服一個地區后未必消滅當地的統治者。有證據表明，嚈噠人慣於利用原有的政權統治征服地區，只要這些政權表示臣服，向嚈噠人納貢就行。換言之，不能排除在嚈噠越過興都庫什山南侵之後，乾陀羅的寄多羅貴霜政權在朝貢北魏的同時，也朝貢嚈噠的可能性。

《洛陽伽藍記》卷五所引“宋雲行紀”載宋雲等於正光元年（公元 520 年）訪問乾陀羅時，發現該地已爲嚈噠所統，且“治國已來，已經二世”。這說明嚈噠勢力進入乾陀羅最早應在五世紀五六十年代，公元 477 年或者可以視爲嚈噠人直接統治該處年代之上限：

> 正始四年（公元 507 年）十二月丁丑，“鉢崙……乾達諸國遣使朝貢”。（《魏書・世宗紀》）
>
> 永平四年（公元 511 年）六月乙亥，“乾達……達舍……不流沙諸國並遣使朝獻”。（《魏書・世宗紀》）
>
> 十月丁丑，“……烏萇……乾達等諸國並使朝獻”。（《魏書・世宗紀》）

“乾達”應該就是《魏書・西域傳》所見乾陀國，在《魏書》“本紀”所乾達朝魏之年很可能已役屬嚈噠。《洛陽伽藍記》卷五所引“宋雲行紀”又載：

> 至正光元年（公元 520 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塲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嚈噠所滅，遂立勑懃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兇暴，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

非情願。自持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鬭，已歷三年。王有鬬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楂，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

“嚈噠”即“嚈噠”。《魏書·西域傳》有類似記載：

乾陀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嚈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臨國已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鬬，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

一說“業波羅”可能指“寄多羅”。[14] 今案：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

乾陀羅如此，曾爲寄多羅征服的乾陀羅以北諸國很可能在差不多同時落入嚈噠的勢力範圍。各處殘餘的寄多羅貴霜人應該有大致相同的遭遇，不是爲嚈噠所滅便是淪爲附庸。

六

鳩摩羅什（公元 344—413 年）在公元 402—406 年所譯《大智度論》中稱弗迦羅城（Puṣkalāvati）在大月氏國，其東爲“多刹陀羅國（Takṣa-śilā）”。[15] 又稱：佛降服龍王處爲“北天竺月氏國”。[16] 而據《大唐西域記》卷三，佛降服龍王處名阿波邏羅龍泉[17]，地在 Swāt 河源頭。另外，《大智度論》卷二五有“兜呿羅（小月氏）”一語。[18] 由此可見，鳩摩羅什將乾陀羅、Swāt 河源頭稱爲“大月氏”或“月氏”的同時，又稱兜呿羅（Tokhāra）爲“小月氏”，後者無疑指吐火羅斯坦。說者據此認爲：公元 402—406 年間，興都庫什南北並不處在同一個政治勢力的統治之下。[19]

今案：此説成立與否，關鍵在於如何理解鳩摩羅什所用“小月氏”這一概念。我認爲鳩摩羅什如此指稱至少有以下兩種可能性：

1. 鳩摩羅什稱“兜呿羅”（即吐火羅斯坦）爲“小月氏”是因爲在他的時代，領有吐火羅斯坦的是寄多羅貴霜人，而貴霜一直被稱爲“月氏”。寄多羅人既是貴霜之裔，被鳩摩羅什稱爲“月氏”毫不奇怪。至於著一“小”字，可能是爲了區别於此前的“大月氏”，亦卽曾一統興都庫什山南北的大貴霜國。至於同一個鳩摩羅什又稱乾陀羅、Swāt 河源頭爲“大月氏國”，則可能是因爲該地長期以來是貴霜王朝最繁榮的地區，在某種意義上足以代表貴霜國的緣故。

2. 如果考慮到中國史籍習慣上將被迫遷離故土、另謀發展的月氏大部稱爲“大月氏”，而將留守原地的月氏餘衆稱爲“小月氏”，鳩摩羅什亦遵循這一慣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則似乎上述指稱還可另作解釋：興起於吐火羅斯坦、一統興都庫什山南北的貴霜政權，因故（如受薩珊波斯壓迫）不得不放棄吐火羅斯坦，南徙於乾陀羅一帶，是爲鳩摩羅什所謂“大月氏國”，而留在吐火羅斯坦之餘衆，則被鳩摩羅什稱爲“小月氏”。如果其時寄多羅王已經崛起，在鳩摩羅什心目中亦屬於“小月氏”之列。

《魏書・西域傳》所載寄多羅王崛起於大部南遷後留在吐火羅斯坦的貴霜餘衆之中，本應屬於鳩摩羅什所謂“小月氏”範疇。但是，該王於吐火羅斯坦復國後，又興兵南下，一統興都庫什山南北原貴霜之領土（乾陀羅以北五國），復因被“匈奴”所逐，不得不放棄吐火羅斯坦西徙，而使其子留守興都庫什山南之領土。因此,《魏書・西域傳》將該王所率西徙之貴霜人稱爲“大月氏”，將留守故土（乾陀羅一帶亦寄多羅月氏領土）者爲“小月氏”。

應强調指出的是，如果遵循上述中國史籍的慣例，鳩摩羅什不可能將勝利的進軍者稱爲“大月氏”，祇能將放棄吐火羅斯坦、南遷乾

陀羅的貴霜人稱爲“大月氏”。同理,《魏書・西域傳》將寄多羅王之月氏國稱爲大月氏，衹能是因爲他被“匈奴”所逐西徙，而不是因爲他率月氏主力入侵西北印度。前一種情況纔與公元前177/前176年月氏大衆被匈奴逐出祁連、敦煌間故地西徙大夏可以類比。事實上，寄多羅王在征服乾陀羅以北五國後必定回師吐火羅斯坦。這與月氏放棄敦煌、祁連間故地西徙和寄多羅王放棄吐火羅斯坦西徙大異其趣。

此外，鳩摩羅什在他所譯《馬鳴菩薩傳》中，稱馬鳴的保護者迦膩色迦王爲“北天竺小月氏國王”（或“月氏王”）：

> 其後北天竺小月氏國王伐於中國，圍守經時。中天竺王遣信問言：若有所求，當相給與，何足苦困人民久住此耶？答言：汝意伏者，送三億金當相赦耳。王言：舉此一國，無一億金，如何三億而可得耶？答言：汝國內有二大寶：一佛鉢、二辯才比丘，以此與我，足當二億金也。王言：此二寶者，吾甚重之，不能捨也。於是比丘爲王說法。其辭曰：夫含情受化者，天下莫二也。佛道淵弘，義存兼救。大人之德亦以濟物爲上。世教多難，故王化一國而已。今弘宣佛道，自可爲四海法王也。比丘度人，義不容異，功德在心，理無遠近，宜存遠大，何必在目前而已。王素宗重，敬用其言，即以與之月氏王，便還本國。[20]

證之《大智度論》“北天竺月氏國”這一稱呼，所謂“北天竺小月氏王”很可能衍“小”字。此“北天竺小月氏王”在《付法藏因緣傳》卷五徑作“月支國王”[21]，似可佐證。

不管怎樣，在鳩摩羅什迻譯《大智度論》的年代，或者說最晚到鳩摩羅什去世之年（公元413年),《魏書・西域傳》所載寄多羅王可能已崛起於吐火羅斯坦，但似乎尚未一統興都庫什山南北。

七

一說寄多羅人曾統治過克什米爾地區，有文獻和錢幣兩方面的證據。[22]

一方面，嚈噠統治者頭羅曼（Toramāṇa）等鑄造的錢幣精確地複製了寄多羅金幣的類型，後者又承襲了西北印度後期貴霜人打鑄的錢幣類型。克什米爾地區的情況也是如此。克什米爾的嚈噠諸王甚至在其錢幣反面保持了 Kidara 的銘文。只有假定克什米爾的嚈噠統治者是該地寄多羅人的直接繼承者，這一現象才能得到合理解釋：克什米爾的嚈噠人試圖通過其錢銘證明自己是寄多羅人的合法繼承人或後裔。換言之，寄多羅人亦曾統治過克什米爾。

另一方面，雖然各種文獻資料的研究表明，貴霜和後期貴霜是由寄多羅人繼承的，後者又由嚈噠人繼承。但歷來沒有找到足以證明這一過程同樣出現於克什米爾地區的文獻記錄。其實，證據見諸迦羅那的《諸王流派》（Rājataraṅgiṇī）一書。迦羅那《諸王流派》記載從公元七世紀起，亦即 Kārkoṭa 王朝以降，並非全不可信。即使 Kārkoṭa 王朝之前，書中提到的若干歷史人物如 Aśoka、Huṣka、Juṣka 和 Kaniṣka 等的事蹟亦可與其他史乘相印證。既然如此，寄多羅王理應出現在迦羅那的《諸王流派》一書所述克什米爾諸王的序列中。

業已辨認出屬於迦羅那所載 Mihirakula 直接的前任——Vāsukula 之前的統治者 Hiraṇyakula 的若干錢幣。這些錢幣精確地摹倣了寄多羅的錢幣。這暗示 Toramāṇa 和寄多羅的錢幣之間存在著一個失去的環節，也表明這些年代早於克什米爾第一位嚈噠王 Mihirakula 的統治者必定是寄多羅人。由於寄多羅一名不見於迦羅那的記載，這一問題一直無法解決。實際上，迦羅那《諸王流派》一書並不是沒有關於寄多

羅王的記載，證據如下：

> 嗣後，Vibhīṣana 之子 Nara 即王位。Nara 一名 Kiṃnara，其勇武曾爲 Kiṃnaras（緊那羅）歌頌。（I，197）[23]

如果承認 Kidara 是伊朗語的外來詞，來自印度語 Kiṃnara-，Kinnara-，詞義可能是“英雄、勇士”，則不妨認爲寄多羅王就是 Nara 王。蓋 Kidara 一名在新疆出土的佉盧文書中出現四次（記作 kiṃdari 或 kiṃtra），每次都作爲尊稱或表示敬意的姓。意思可能是“光榮的、英雄、勇士”之類。這在和闐文書中也能找到大量證據。[24]

另外，從年代上亦可證明 Nara 王（Kiṃnara）即寄多羅王。蓋據迦羅那《諸王流派》，Huṣka、Juṣka 和 Kaniṣka 之後，有六王統治克什米爾。後五王之治期合計 190 年 6 個月，所不知者僅 Abhimanyu 一世之治期。若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134 年，則 Huviṣka 之末年爲公元 195 年，加上這 190 年，可得公元 385 年，再加上 Abhimanyu 一世的治期約 15—25 年（克什米爾諸王治期的平均值），可得寄多羅王開始統治克什米爾的大致年份：公元 400—410 年。這和依據其他資料得出的結論並無不合。[25]

今案：其說未安。

一則，中國文獻的證據似乎表明寄多羅人並未統治克什米爾。《魏書・西域傳》並舉“大月氏國”、“小月氏國”與“罽賓國”，隻字未及月氏與罽賓之關係。

二則，據《洛陽伽藍記》卷五所載“宋雲行紀”，乾陀羅之嚈噠王“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鬪，已歷三年”，未能降服之。雖然按之年代，不妨將這位嚈噠王比定爲 Mihirakula，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該王此時的對手是寄多羅人。

三則，退一步說，即使嚈噠人是繼寄多羅人之後統治克什米爾的，其人也毫無必要通過摹倣後者之錢幣表示其合法性。或者說，嚈噠錢幣和寄多羅人的錢幣類似未必表明寄多羅人曾先於嚈噠人統治克什米爾。克什米爾的嚈噠人很可能摹倣其他地區的寄多羅人的錢幣，其目的也許僅僅是爲了便於流通。

四則，其實，迦羅那《諸王流派》所載 Mihirakula 不過與嚈噠王 Mihirakula 同名。前者或即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四所載大族王摩醯邏矩羅，其年代至少早於玄奘“數百年”。因此，其事蹟不能和嚈噠比附。如所週知，嚈噠王 Mihirakula 的父親是 Toramāṇa，但迦羅那明確記載 Mihirakula 的父親是 Vasukula，也表明兩者不是同一人。[26]

五則，即使有與迦羅那《諸王流派》所載 Hiraṇyakula 同名者鑄造錢幣摹倣寄多羅錢幣的式樣，亦不足以證明寄多羅人曾統治過克什米爾。當然也不能證明 Hiraṇyakula 本人緊接著 Kidara 統治克什米爾。

六則，既然 Kidara 一名意爲“光榮的、英雄、勇士”，便很可能被用作綽號、尊號而不一定是專名。換言之，名“寄多羅”者未必就是《魏書·西域傳》之寄多羅王。同理,《魏書·西域傳》稱寄多羅王“勇武”，雖然似乎可以說明此王之真名並非“Kidara”，何以見得就是迦羅那《諸王流派》所載 Nara？迦羅那書所舉 Kiṃnara 一名很可能與佉盧文書、和闐文書所見 kiṃdari 等無關。蓋此 Kiṃnara 或指天龍八部之一——緊那羅。緊那羅或稱歌神、歌樂神、音樂天。Nara 王或因擅歌舞而得名 Kiṃnara（因而 Kiṃnara 詠唱之）。

要之，無論文獻和錢幣都沒有提供寄多羅人曾統治克什米爾的證據。因此，說者在此基礎上就其年代所作推論毋須再作探討。事實上，說者有關年代的推算也經不起推敲：作爲主要環節的迦膩色迦年代眾說紛紜，而克什米爾諸王治期之平均數亦無從確指，其結論自難令人信服。

八

本節之討論有關寄多羅人崛起和越過興都庫什山南侵之年代。

（一）法顯記弗樓沙國事情有云：

> 佛鉢即在此國。昔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既伏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故興供養。供養三寶畢，乃校餝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緣未至，深自愧歎，即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并留鎮守，種種供養。[27]

說者指此處"月氏王"爲《魏書·西域傳》所傳寄多羅王。"大興兵衆"云云，即該王"越大山，南侵北天竺"事。[28]不僅如此，若就佛鉢來源推敲之，其說似得以增強。蓋法顯又載：

> 法顯在此國（揵陀衛），聞天竺道人於高座上誦經，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揵陀衛。竟若干百年（法顯聞誦之時有定歲數，但今忘耳）。當復至西月氏國。若干百年，當至于闐國。住若干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來到漢地。住若干百年，當復至師子國。若干百年，當還中天竺。到中天已，當上兜術天上。

據此，佛鉢本在毗舍離即中天竺，而據前引《馬鳴菩薩傳》，經"北天竺小月氏國王"强索，佛鉢乃自中天竺來到揵陀衛，與法顯所述，若合符契。

果然，則在法顯遊歷乾陀羅（公元 402 年）之前，寄多羅王已南

侵北天竺、征服乾陀羅以北五國，而“欲取佛鉢”歸吐火羅斯坦也。

遺憾的是此說若干處似欠妥帖：

1. 誠如說者所言,《法顯傳》有云:“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其時間無論下距法顯啓程之年弘始二年（公元399年）、遊歷乾陀羅之年，抑或《法顯傳》脫稿之年義熙十年（公元414年）[29]，充其量二三十年，似可據以類推“昔月氏王”欲取佛鉢事去法顯西行之年亦不至太遠。但查《法顯傳》全書，冠以“昔”字之人事年代久遠者佔絕對多數。換言之，法顯於“月氏王”前著一“昔”字，暗示其年代久遠之可能性不能排除。

2.“北天竺小月氏國王”強索佛鉢事亦見《付法藏因緣傳》卷五：

> 月支國王威德熾盛，名曰栴檀罽昵吒王，志氣雄猛，勇健超世，所可討伐，無不摧靡。即嚴四兵，向此國土（華氏城）。共相攻戰，然後歸伏。即便從索九億金錢。時彼國王即以馬鳴及與佛鉢、一慈心雞，各當三億，持用奉獻罽昵吒王。馬鳴菩薩智慧殊勝，佛鉢功德如來所持，雞有慈心不飲蟲水，悉能消滅一切怨敵，以斯緣故當九億錢。王大歡喜，爲納受之。即迴兵眾，還歸本國。[30]

蓋一般認爲罽昵吒即《馬鳴菩薩傳》所載小月氏國王。據此，佛鉢本在華氏城，非毗舍離，與法顯所聞天竺道人之言亦不一致。

3.“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云云，結合“到中天已，當上兜術天上”之類說法，神話色彩鮮明，傳說意味濃厚。很難相信法顯在這裏描述的是發生在十多年前的一幕。

4. 客觀上，並不是衹有寄多羅王一人纔有可能興兵伐弗樓沙國。因而歷來對法顯上述記錄有多種解讀，或指“月氏王”爲貴霜諸王之

一，丘就卻或迦膩色迦等。[31] 或指爲貴霜崛起前之大月氏王。[32] 諸說難分優劣，祇能存疑。說者爲證成己說，皆力證“欲取佛鉢”之月氏王爲佛徒。[33] 其實國王“欲取佛鉢”與其信仰並無必然聯繫。

很可能月氏王與佛鉢有緣之傳說已深入人心。佛鉢逸失處，便稱爲月氏王索走，佛鉢所在處，則稱月氏王欲取不能。要在借月氏王擡高鉢之身價，如此而已。

（二）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三有載：

> 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斥逐僧徒，毀壞佛法。覩貨邏國呬摩呾羅王（唐言雪山下），其先釋種也，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光有疆土，嗣膺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毀滅佛法，招集國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爲商旅，多賷寶貨，挾隱軍器，來入此國。此國之君，特加賓禮。商旅之中，又更選募得五百人，猛烈多謀，各袖利刃，俱持重寶，躬賷所奉，持以獻上。時雪山下王去其帽，即其座，訖利多王驚慴無措，遂斬其首，令群下曰：我是覩貨邏國雪山下王也。怒此賤種，公行虐政，故於今者誅其有罪。凡百衆庶，非爾之辜。然其國輔宰臣遷於異域。既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安堵如故。復於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持施衆僧。[34]

說者又指其中呬摩呾羅王爲寄多羅王，並據同卷玄奘關於摩揭陀國無憂王（即阿育王）、犍陀羅國迦膩色迦王和覩貨邏國呬摩呾羅王之年代，推出呬摩呾羅王滅迦濕彌羅訖利多種年代爲390年，以爲可與前引法顯之記述相呼應。[35]

今案：其說未安。

一則，據《大唐西域記》卷三，迦濕彌羅之呬摩呾羅王係釋種之

裔，[36]與月氏或貴霜毫不相干。

二則，呬摩呾羅不過玄奘所傳“覩貨邏國故地”之一，位於雪山即興都庫什北麓（“呬摩呾羅”意即“雪山下”），而寄多羅王都監氏城，即《大唐西域記》卷一所載縛喝所在地。兩者顯然不在一處。

三則，寄多羅王的業績是復興貴霜王朝，呬摩呾羅王僅僅是復辟呬摩呾羅王位而已，雖然都可以稱爲“光有疆土，嗣膺王業”，但其性質、規模不可同年而語。

據《魏書・西域傳》，寄多羅王興師遠征乾陀羅以北五國。據《大唐西域記》，呬摩呾羅王僅偷襲迦濕彌羅一處。迦濕彌羅在《魏書・西域傳》稱“罽賓國”，並非“乾陀羅北五國”之一。

五則，《大唐西域記》卷三稱迦濕彌羅國中摩揭陀國無憂王（即阿育王）的年代是“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37]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的年代是“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38]而覩貨邏國呬摩呾羅王的年代則是“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說者根據這些數據，加上今人考證所得迦膩色迦之絕對年代，[39]推算出呬摩呾羅王“光有疆土，嗣膺王業”的年代爲390年。且不說佛滅之年衆說紛紜，所謂“涅槃之後”若干年亦皆籠統，難以落實，不可能從中推出可信之結論。

（三）說者以爲從四世紀八十年代到五世紀二十年代，漢文佛教文獻以“月氏國”指稱乾陀羅地區，正值寄多羅王朝佔領之時。說者指出這一點，也是爲了探究寄多羅王朝佔領乾陀羅年代之上限。有關考證可議處不少。

1.《高僧傳・慧遠傳》（卷六）有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40]說者以爲這表明遲至慧遠聞佛影時，寄多羅已南侵西北印度，“月氏國”乃指犍陀羅以西那竭呵城（Nagarahāra），亦即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九所載“大月氏西佛肉髻住處國”。[41]

今案：慧遠（公元334—416年）聞佛影究竟何時，無從確定。即使慧遠以"月氏國"指稱寄多羅政權，亦無從由此推出寄多羅統治乾陀羅之年代。

2.《水經注·河水二》："又按道人竺法維所說，佛鉢在大月支國，起浮圖，高三十丈，七層，鉢處第二層，金絡絡鎖縣鉢，鉢是青石。或云懸鉢虛空。須菩提置鉢在金机上，佛一足跡與鉢共在一處，國王、臣民，悉持梵香，七寶、璧玉供養。塔迹、佛牙、袈裟、頂相舍利，悉在弗樓沙國。"[42] 所謂"佛鉢在大月支國"，乃指弗樓沙。說者據以爲竺法維的年代當在僧表之前（公元439年以前），與法顯同時或稍後。

今案：竺法維，或以爲係"竺法雅"之訛。竺法雅，《高僧傳》卷四有傳，其事蹟亦見該書卷九"竺佛圖澄傳"，與道安、佛圖調爲同時人。另說竺法維應爲宋、齊間人，《高僧傳》卷二之末有載："竺法維、釋僧表並經往佛國。"[43] 因此，竺法維應與僧表同時代。[44] 即使如說者所言，竺法維之年代早於僧表，亦無從證明寄多羅早在四世紀末已佔領乾陀羅。[45]

3.《藝文類聚》卷七三引支僧載《外國事》稱："佛鉢在大月氏國，一名佛律娑[46]越國，是天子之都也。"支僧載年代有異說，[47] 說者力主其年代早於法顯，蓋所載和竺法維合。

今案：支僧載稱佛鉢所在大月氏國爲"天子之都"，表明此"大月氏國"應指貴霜王朝，因爲devaputra一號屢見於閻膏珍、迦膩色迦之銘文。換言之，即使支僧載年代如說者所言，亦很難指"大月氏國"爲寄多羅政權，因爲寄多羅王採用的尊號是shāhi，而不是"天子"。

4. 俄藏敦煌文書Φ. 209號《聖地游記述》稱：佛伏天魔處有樹，而"彼國天子並以七寶莊嚴此樹"；又稱：佛鉢在奚吴曼地城東［醯］羅寺，"天子及王一切見今供養"。[48] 說者亦指其中"天子"爲寄多羅

貴霜統治者 Kidara。

今案：既無證據表明《魏書・西域傳》所傳寄多羅王（包括可能存在的寄多羅貴霜王朝其他統治者）以“天子”作尊號，說明此文書提到的“天子”不是寄多羅統治者，或者說此文書描述的時代不是寄多羅貴霜統治乾陀羅的時代。說者考此文書絕對年代在公元 412—433 年間，果然，則表明在此文書撰寫之年寄多羅王尚未越過興都庫什山南侵北天竺。

其實，乾陀羅尚未被寄多羅佔領，僧侶們仍可能稱之爲“月氏”，蓋乾陀羅曾爲弘揚佛法的貴霜王迦膩色迦所都，而貴霜一直被稱爲“月氏”。降至支僧載時代，貴霜雖亡，僧侶們用業已滅亡的“月氏國”指稱佛鉢所在地乾陀羅不足爲奇，猶如今日中國人稱山東爲“齊魯”、稱江浙爲“吳越”一樣。強調“天子之都”，則有擡高佛鉢身價之用意在。

另說：法顯所載北天竺的情況與中天竺不同，後者在一個國王治下，前者則包括互不統屬的諸國。由此可見，遲至法顯遊歷北天竺之日，寄多羅人尚未統一興都庫什山南北。[49]

今案：其說未安。寄多羅王興兵越大山征服乾陀羅以北五國後，這五國可能依舊存在，不過役屬寄多羅而已。換言之，法顯的記錄對於判定寄多羅崛起的年代意義不大。[50]

九

本節略述寄多羅貴霜的族屬問題。

西方學者多將寄多羅與匈人勘同，主要依據便是前引普里斯庫斯和《柱行者喬舒亞年代記》的記載。但是，如前所述，只要將這些記載和普洛科庇烏斯的有關記載對照起來閱讀，便不難發現《柱行者喬

舒亞年代記》所述貴霜匈奴無疑便是普洛科庇烏斯所述嚈噠匈人。既然直到卑路斯去世之際嚈噠人仍然被稱爲“貴霜匈人”，也就不能否定埃里塞所載“貴霜匈人”乃至普里斯庫斯的“寄多羅匈人”不是西遷的寄多羅貴霜人、而是嚈噠人的可能性。毫無疑問，祇有伊嗣俟二世纔會遭遇被“匈奴”逐出吐火羅斯坦的寄多羅貴霜人。當然，也不排除其時被征服的寄多羅貴霜人充當嚈噠人進攻薩珊波斯前鋒的可能性。[51]

以寄多羅貴霜人也被稱爲 Huns 這一錯誤認識爲前提，說者或將寄多羅貴霜人與 Ammianus Marcellinus[52] 所載 Chionitae 勘同。[53] 而 Ammianus Marcellinus 僅僅記載：Chionitae 有王名 Grumbates，隨沙普爾二世（Shāpūr II，公元 309—379 年）遠征拜占庭，其子戰死於 Amida 城（今土耳其 Diyarbakir）下。（XIX，1—2）除了 Chionitae 一名可與 Huns 勘同外，別無其他證據。尤其可以指出的是，據 Ammianus Marcellinus（XVI，9—4），公元 356 年在東方入侵波斯的族群有二：Chionitae 和 Euseni。據研究，Euseni 係 Cuseni 之譌，而 Cuseni 即貴霜（Kushans）[54]。這就是說，在 Ammianus Marcellinus，Chionites 和貴霜是明確區分的，不容混淆。

或以爲 Kabul 附近 Tepe Maranjan 窖藏中年代最晚的金幣有 βαγο κιδαρο 字樣，這一窖藏入土於 Shāpūr 三世在位時期（公元 383—388 年）。[55] 換言之，可以認爲寄多羅貴霜年代早於 Shāpūr 三世的治期。於是，便消除了將 Chionitae 和寄多羅人勘同的年代障礙。

今案：錢銘所見 Kidaro 字樣不無可疑之處。這些錢幣有可能屬於最後一位“貴霜—薩珊”王（Kay Wahram）。[56] 至於這些錢幣的樣式和後來寄多羅王的錢幣式樣某些相似之處，可以理解爲寄多羅王摹倣“貴霜—薩珊”王錢幣的結果。[57]

或以爲寄多羅人錢幣的特點是在他們征服的地區採用當地的幣制，

沒有自己獨立的錢幣系統。既然有一種早期索格底亞那錢幣，反面有一個弓箭手的形象，正面銘文中有“寄多羅（kydr）”一詞，這些錢幣便成了寄多羅人曾出現在索格底亞那的證據，儘管存世的 2000 多枚這類錢幣中，只有 7 枚有“寄多羅”的名字，表明寄多羅人在索格底亞那的統治是短暫的。換言之，雖然這些錢幣的年代不可能早於四世紀中葉——因此寄多羅人征服索格底亞那不可能早於這個年代。但只要寄多羅人有可能在沙普爾二世治期統治過索格底亞那，哪怕時間很短，指寄多羅人爲 Chionitae 的合理性便大增。[58]

今案：此說亦有未安。寄多羅人在吐火羅斯坦以寄多羅王名義發行的金第納爾倣照貴霜—薩珊金幣的式樣，而在所佔印度土地上發行的金幣乃倣照晚期貴霜諸王金幣的式樣，似乎反映了上述寄多羅人鑄幣的特點。但是，寄多羅人並未佔領薩珊波斯領土，卻也在乾陀羅仿照薩珊錢幣式樣打鑄自己的錢幣。可見上述 7 枚錢銘有“寄多羅”字樣（即使所指正是《魏書・西域傳》所載“寄多羅王”）的索格底亞那型錢幣未必是其人佔領索格底亞那後打鑄的，當然也不能由此推論其崛起年代可以上推至四世紀中葉甚或更早。

既然 Kabul 附近 Tepe Maranjan 窖藏中並不存在寄多羅貴霜人的錢幣，指弓箭手型錢幣爲寄多羅人錢幣又無確證，將寄多羅人的年代提前到沙普爾二世治期就失去了立足點。

順便說說，學界曾試圖依據寄多羅貴霜政權發行的錢幣推斷其年代，但顯然並不成功，蓋錢幣可以倣製，而錢幣的發行者和其摹倣的對象時間上不存在嚴格的對應關係。[59] 現存寄多羅貴霜的錢幣既有摹倣沙普爾二世的，又有摹倣巴赫蘭五世（Bahrām V，公元 420—438 年）和伊嗣俟二世的，既然沒有證據表明有一個以上以 Kidāra 爲名的貴霜王，也就至多據此推斷這些錢幣打鑄於伊嗣俟二世治期或其以後的年代。[60]

此外，依據類似的邏輯，或將寄多羅貴霜人與笈多時期碑銘所見

Hūṇa 勘同。[61] 儘管寄多羅貴霜人確有入侵印度之舉，但年代顯然早於 Hūṇa 對笈多的入侵。[62] 指塞建陀笈多 Junāgarh 石刻銘文（L. 3—4）[63] 提到的“蜜利車”（Mlēchchha）爲寄多羅人，可謂毫無根據。

衹要考慮到嚈噠人自號“匈奴”，又來自一度處於貴霜或寄多羅貴霜統治之下的吐火羅斯坦，“貴霜匈人”或“寄多羅匈人”這些稱呼就都是不難理解的了，而突厥佔領之後吐火羅斯坦的情況正可參證。蓋據《冊府元龜》卷九六六，“吐火羅國，唐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列其地爲月氏府。以其葉護阿史那烏濕波爲都督。開元七年（公元 719 年），其葉護曰支汗那。十七年，冊其首領骨咄祿頓達度爲葉護”。顯然，以阿史那烏濕波爲首的統治吐火羅斯坦的突厥人，也完全可以稱之爲“吐火羅人”或“吐火羅突厥人”。

十

要之，寄多羅貴霜人可能是貴霜之裔，其王寄多羅大概崛起於“貴霜—薩珊”政權的統治衰落之際，在一統吐火羅斯坦後，乃興師越過興都庫什山，征服了乾陀羅以北五國。

其後，嚈噠人入侵吐火羅斯坦，寄多羅王不敵，率部西徙，一度衝擊薩珊波斯東境。寄多羅王本人下落不明，既可能在與波斯人作戰過程中陣亡，也可能死於接踵而至的嚈噠人之手。

因此，寄多羅貴霜結束的年代與嚈噠入侵吐火羅斯坦的年代大致相符。其始年則無法確知，祇能說也許在四世紀末至五世紀初。寄多羅王很可能就是這一王朝的第一代君主。

寄多羅王被嚈噠人逐出吐火羅斯坦西徙之際，其子留守興都庫什山南之地，史稱“車多羅（Kidara）”或“居常（Kushan）”。其人可能一度服屬於南下次大陸之嚈噠人，苟延殘喘至五世紀八十年代末。

■ 注釋

1　参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12 年，pp. 66—75。

2　榎一雄“キダーラ王朝の年代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0～3（1958 年），pp.1—52。

3　R. W. Thomson，tr., *Elishē*, *History of Vardan and the Armenian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 63.

4　注 3 所引 R. W. Thomson 書，p. 64。

5　注 3 所引 R. W. Thomson 書，p. 66。

6　榎一雄“初期アルメニア史書に見えるエフタルとクシャン”，《東洋學報》47～4（1965 年），pp.1—56。

7　R. C. Blockley，*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ympiodorus，Priscus and Malchus）. ARCA Classical and Medieval Texts，Papers and Monographs 10，Francis Cairns，1981—1983.

8　H. W. Haussig，“Theophylakts Exkurs über die skythischen Völker.” *Byzantion* 23（1953）: pp. 275—462，esp.353.

9　参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70—74。

10　W. Wright，*The Chronicle of Joshua the Stylite*，*with a English Translation into and Notes*. Cambridge，1882.

11　H. B. Dewing，tr., *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vol. 1. New York，1914.

12　說見注 2 所引榎一雄文。

13　關於嚈噠入侵印度次大陸，参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85—102。

14　說見注 2 所引榎一雄文。

15　《大智度論》卷一一：“譬如大月氏弗迦羅城中有一畫師名千那，到東方多刹陀羅國，客畫十二年，得三十兩金，持還本國。”（《大正大藏經》T25，No. 1509，p. 141）

16　《大智度論》卷九：“（釋迦牟尼佛）有時暫來北天竺月氏國降阿波羅（Apalāla）龍王，又至月氏西降女羅剎。”（《大正大藏經》T25，No. 1509. p. 126）

17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 年，pp. 274—275。（《大正新脩大藏經》T51，No. 2087，p. 882）

18　《大正大藏經》T25，No. 1509，p. 243。又，《翻梵語》卷八引《大智論》

"第二十五卷":"兜呿羅，譯曰小月氏也。"(《大正大藏經》T54, No. 2130. p. 8)

19 注 2 所引榎一雄文。

20 《大正大藏經》T50, No. 2046, pp. 183—184。

21 《大正大藏經》T50, No. 2058, p. 315。

22 J. Harmatta, "Kidara and the Kidarite Huns in Kaśmīr." In J. Harmatta, ed., *From Hecataeus to Al-Huwārizmī, Bactrian, Pahlavi, Sogdian, Persian, Sanskrit, Syriac, Arabic, Chinese, Greek and Lati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1984, pp. 185—189. 案：此文引述他人觀點，均有出處，除非必要，茲不一一。

23 M.A. Stein, *Kalhaṇa's Rājataraṅgiṇī*. Vol. I, Delhi • Patna • Varanasi, 1961.

24 H. W. Bailey, "*Rāma I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10 (1941) pp, 559—598, esp. 583, note 2; H. W. Bailey, "Irano-Indica IV."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13 (1951), pp. 920—938, esp. 921.

25 說者以爲這與榎一雄 [K. Enoki, "On the Date of the Kidarite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oyo Bunko* 27 (1969), pp. 1—26; 28 (1970), pp. 13—38.] 的結論不謀而合。

26 注 1 所引余太山書, pp. 85—102。

27 章巽《法顯傳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pp. 39—40。(《大正大藏經》T51, No. 2085, p. 858)

28 見萬翔"寄多羅人年代與族屬考",《歐亞學刊》第 9 輯（2009 年）, pp. 115—160。又,"大興兵衆"伐弗樓沙國之月氏曾被指爲嚈噠，見 M. F. C. Martin, "Coins of Kidāra and the Little Kushā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Letters, 3—2 (1937) =*Numismatic Supplement*, No. 47, pp. 23—50 with 5 plates，這顯然是錯誤的。批判見注 2 所引榎一雄文。

29 注 27 所引章巽書, p. 178。

30 《大正大藏經》T50, No. 2058, p. 315。

31 參見注 2 所引榎一雄文，以及注 27 所引章巽書, p. 44，等等。

32 章巽說，見注 27 所引書, p. 44。

33 諸如：在貴霜興起之前，大月氏王已接受佛教，證據見於《三國志・魏書》裴注引《魏略・西戎傳》:"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 2 年），博士

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見注 27 所引章巽書, p. 44。

34 注 17 所引季羡林等書, pp. 338—339。(《大正新脩大藏經》T51 No. 2087, p. 887)

35 注 28 所引萬翔文。

36 詳見《大唐西域記》卷六, 注 17 所引季羡林等書, p. 516。(《大正新脩大藏經》T51 No. 2087, p. 901)

37 注 17 所引季羡林等書, pp. 327—328。(《大正新脩大藏經》T51 No. 2087, p. 886)

38 注 17 所引季羡林等書, pp. 331—332。(《大正新脩大藏經》T51 No. 2087, p. 886)

39 說者取公元 127 年說, 見 H. Falk, “The Kaniṣka Era in Gupta Records.”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10 (2004), pp. 167—176。其實, 玄奘所謂“涅槃之後第四百年”是指迦膩色迦舉行第四結集的年代; 即使 127 年說不誤, 亦不應將二者同一視之。

40 《大正新脩大藏經》T50, No. 2059, p. 358。

41 《大正新脩大藏經》T25, No. 1509, p. 126。

42 見陳橋驛《水經註校證》, 中華書局, 2007 年, p. 35。

43 《大正新脩大藏經》T50, No. 2059, p. 337。梁寶唱《名僧傳抄》抄《名僧傳》(第二十六) 載僧表事稱:“僧表本姓高, 涼洲人也, 志力勇猛。聞弗樓沙國有佛鉢, 鉢今在罽賓臺寺, 恒有五百羅漢供養鉢。……乃至西踰葱嶺, 欲致誠禮, 并至于罽賓國。值罽賓路梗, 罽賓王寄表有張志模寫佛鉢與之。又問寧復有所願不? 對曰: 讚摩伽羅有寶勝像, 外國相傳云, 最似真相, 願得供養。王即命工巧, 營造金薄像, 金光陜高一丈, 以真舍利置于頂上。僧表接還涼州, 知涼土將亡, 欲反淮海。經蜀欣平縣, 沙門道汪求停鉢、像供養, 今在彼龍華寺。僧表入矣, 禮敬石像。住二載, 卒于寺。”(《卍新纂續藏經》第 77 册, p. 358)“涼土將亡”云云似指北涼故上述僧表事應在 439 年之前。

44 森鹿三、日比野丈夫等譯注《水經注》,《中國古典文學大系》21, 東京: 平凡社, 1985 年, pp.138—139, n. 107。另參看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敍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三聯書店, 1987 年, pp. 565—578, esp. 577。

45 L. Petech, *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the Shui-Ching-Chu*. Serie Orientale Roma: II,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0, p.

60，以爲竺法維這段話暗示當時那竭國（今 Jalālābād）是以弗樓沙爲都城的國家的一部分，這個國家即寄多羅貴霜王朝。今案：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只是竺法維訪問大月氏國的年代不清楚，無從據以推斷寄多羅征服乾陀羅的年代。

46 原文作“婆”，此據 L. Petech 說改，見 L. Petech，“Alcuni Dati di Chih Sêng-Tsai Sull' India.” In *Selected Papers on Asian History*. Serie Orientale Roma：LX，Rome：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1988，p. 314。

47 注 44 所引向達文，esp. 577，以爲支僧載活動於五世紀初，與法顯同時。陳連慶《新輯本支僧載〈外國事〉序》，《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 年第 1 期，pp. 19—21，以爲其年代約略相當於笈多王朝月護王（Chandragupta）、海護王（Samudragupta）時期（公元 320—380 年）。蓋海護王之子超日王（Chandragupta II，Vikramāditya，公元 380—415 年在位）時期，笈多王朝的首都從摩揭陀遷走，這與支僧載的記載不符，故其時代當早於法顯。

48 《聖地游記述》，載《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4，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pp. 241—242。

49 見注 2 所引榎一雄文。

50 注 25 所引 K. Enoki 文引《出三藏記集》卷一四鳩摩羅什年十二“至月氏北山”之記載（《大正新脩大藏經》T55，No. 2145，p. 100），證 365 年時乾陀羅已稱“月氏”。今案：其說非是。此“月氏”乃龜兹之別稱。

51 說詳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pp. 180—210。

52 John C. Rolfe. tr., *Ammianus Marcellin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1939.

53 R. Göbl，*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iranischen Hunnen in Baktrien und Indien*. 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1967，II，pp. 53—54. E.V.Zeimal，“Politicheskaya istorya drevney Transoksiany po numizmaticheskim dannym.” *Kul'tura Vostoka. Drevnost'i rannee srednevekov'e*. Leningrad，1978，pp. 192—214；E.V.Zeimal，“The Kidarite Kingdom in Central Asia.” In B. A. Litvinskiy，ed.，*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 III，The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s，A. D. 250 to A. D. 750. UNESCO Publishing，1996，pp. 119—128.

54 J. Marquart,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p. 36, n. 5.

55 注 53 所引 R. Göbl 書, I, pp. 17—18。

56 F. Grenet, "Regional Interac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Northwest India in the Kidarite and Hephthalite Periods." *Indo-Iranian Languages and Peoples, Proceedings of British Academy* 11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03—224.

57 A. D. H. Bivar, "The Absolute Chronology of the Kushano-Sasanian Governors in Central Asia." In J. Harmatta, ed.,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1979, pp. 317—332.

58 注 53 所引 E.V.Zeimal 文，見 B. A. Litvinskiy 書，esp. 120，129。案：迄今沒有發現寄多羅人曾領有索格底亞那的確鑿證據。有人試圖證明之，如：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English Translated by James Ward,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5, pp. 107—112。其說未安，參看注 28 所引萬翔文。

59 例如：注 28 所引 M. F. C. Martin 文以爲寄多羅貴霜的年代在公元 356—367/368 年，有文獻和錢幣的證據。但其結論不可信從。批判見注 2 所引榎一雄文。

60 A. Cunningham, "Coins of the Tochari, Kushans, or Yue-ti." *Numismatic Chronicle and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Series 3, 9 (1889), pp. 268—311，則認爲錢幣證據支持寄多羅貴霜年代的五世紀說。

61 見注 53 所引 E.V. Zeimal 文（載 B. A. Litvinskiy 書）。

62 參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 pp. 85—102。

63 J. F. Fleet.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3, Inscriptions of the Early Gupta Kings and their Successors, No. 13, Calcutta, 1888.

徵引文獻

一　漢語文獻（1）

《北史》，（唐）李延壽撰，中華書局，1974 年。
《冊府元龜》，（北宋）王欽若等編，中華書局影印，1982 年。
《漢書》，（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中華書局，1975 年。
《後漢紀》，（東晉）袁宏撰，張烈點校，中華書局，2002 年。
《後漢書》，（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中華書局，1973 年
《後漢書辨疑》，（清）錢大昭撰，《二十五史三編》第 4 冊，嶽麓書社，1994 年。
《後漢書西域傳地理攷證》，（清）丁謙撰，《二十五史三編》第 4 冊，嶽麓書社，1994 年。
《梁書》，（唐）姚思廉撰，中華書局，1983 年。
《穆天子傳匯校集釋》，王貽樑、陳建敏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
《三國志》，（晉）陳壽撰，（劉宋）裴松之注，中華書局，1975 年。
《山海經校注》，袁珂校注，巴蜀書社，1993 年。
《史記》，（漢）司馬遷撰，中華書局，1975 年。
《水經注》，（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水經註校證》，（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中華書局，2007 年。
《隋書》，（唐）魏徵、令狐德棻撰，中華書局，1982 年。
《通典》，（唐）杜佑撰，中華書局，1984 年。
《通志》，（宋）鄭樵撰，中華書局，1987 年。
《魏書》，（北齊）魏收撰，中華書局，1984 年。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周書》，（唐）令狐德棻撰，中華書局，1983 年。

二　漢語文獻（2）

《馬鳴菩薩傳》，（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正新修大藏經》T51，No. 2046。

《名僧傳抄》,（梁）寶唱撰,《續藏乙》X77, No. 1523。
《法顯傳校注》,（東晉）法顯撰，章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大正新修大藏經》T51, No. 2085）
《翻梵語》,《大正新修大藏經》T54, No. 2130。
《梵語千字文》,（唐）義淨著,《大正新修大藏經》T54, No. 2133。
《付法藏因緣傳》,（北魏）吉迦夜、曇曜譯,《大正新修大藏經》T51, No. 2058。
《大唐西域記校注》,（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中華書局, 1985 年。(《大正新修大藏經》T51, No. 2087）
《大智度論》，馬鳴菩薩撰,（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正新修大藏經》T25, No. 1509。
《大正新修大藏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小野玄妙等，大藏出版株式會社, 1924—1934 年。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唐）慧立撰，彥悰注，孫毓棠、謝方點校，中華書局, 1983 年。(《大正新修大藏經》T51, No. 2053）
《洛陽伽藍記校注》,（北魏）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大正新修大藏經》T51, No. 2091）
《高僧傳》,（梁）慧皎撰，湯用彤校注，中華書局, 1992 年。(《大正新修大藏經》T50, No. 2059）
《出三藏記集》,（梁）釋僧佑撰，蘇晉仁，蕭錬子點校，中華書局, 1995 年。(《大正新修大藏經》T55, No. 2145）
《聖地游記述》，俄藏敦煌文書 Φ. 209 號,《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4，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pp. 241—242。

三　漢語文獻（3）

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中華書局, 1981 年。
陳連慶“新輯本支僧載《外國事》序”,《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 年第 1 期, pp. 19—21。
段渝“論商代長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銅文化與華北和世界文明的關係”,《東南文化》1993 年第 2 期, pp. 1—22。
馮承鈞“迦膩色迦時代之漢質子”,《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

局香港分局, 1976 年, pp. 96—101。
馬雍、王炳華"公元前七至二世紀的中國新疆地區",《中亞學刊》第 3 輯, 中華書局, 1990 年, pp. 1—6。
饒宗頤"蜀布與 Cīnapaṭṭa—— 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梵學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pp. 223—260。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 中華書局, 1983 年。
萬翔"寄多羅人年代與族屬考",《歐亞學刊》第 9 輯 (2009 年), pp. 115—160。
王靜如"論吐火羅及吐火羅語",《王靜如民族研究文集》, 民族出版社, 1998 年, pp. 89—152。
吳其昌"印度釋名",《燕京學報》1~4 (1928 年), pp. 713—743。
夏鼐"中巴友誼歷史",《考古》1965 年第 7 期, pp. 357—364。
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敍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三聯書店, 1987 年, pp. 565—578。
徐朝龍"中國古代'神樹傳說'的源流", 西江清高主編《扶桑與若木—— 日本學者對三星堆文明的新認識》, 巴蜀書社, 2002 年, pp. 205—228。
楊憲益"盤越與車離",《譯餘偶拾》, 三聯書店, 1983 年, pp. 362—363。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
余太山《古族新考》, 中華書局, 2000 年。
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年, pp. 180—210。
余太山"新發現的臘跋闥柯銘文和《後漢書·西域傳》有關閻膏珍的記載",《新疆文物》2003 年第 3·4 輯, pp. 43—47。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 中華書局, 2003 年。
余太山《嚈噠史研究》, 齊魯書社, 1986 年; 商務印書館, 2012 年。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六冊, 中華書局, 1979 年。

四 西方文獻

Allan, J.; H. H. Dodwell; T. Wolseley Haig, *Cambridge Shorter History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4.

Bachhofer, L. "Die Āra Kanishkas." *Ostasiatische Zsitschrift* 14 (1927—1928), pp. 21—43.

Bachhofer, L. "On Greeks and Śakas in Ind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1 (1941), pp. 223—250.

Bagchi, P. C. "Ancient Chinese Names of India." *Monument Serica* 13 (1948), pp. 366—375.

Bailey, H. W. "Rāma I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10 (1941), pp. 559—598.

Bailey, H. W. "Irano—Indica IV."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13 (1951), pp. 920—938.

Banerji, R. D. "The Andhau Inscriptions of the Time of Rudra-daman." *Epigraphia India* 16 (1921—1922), pp.19—25.

Banerji-Sastri, A. "Śakas and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Century."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13 (1937), pp.199—217.

Basham, A. L. "A New Study of the Śaka-Kuṣāṇa Period."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15 (1953), pp. 80—97.

Basham, A. L.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ṣka*. Leiden, 1968.

Bhandarka, R. G. "A Peep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Maurya Dynasty to the Fall of the Imperial Gupte Dynasty (B.C. 322 —c. 500 A.D.)." *Journal of the Bombay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Asiatic Society* 20 (1902), pp. 355—408.

Bhandarkar, D. R. "Dekkan of the Satavahana Period." *Epigraphia India* 47 (1918), pp. 69—78.

Bhandarkar, D. R. "Indo-Parthian Dynasty of Vonones." *Indian Cuture* 7 (1940—1941), pp.133—142.

Bivar, A. D. H. "The Kushano-Sassanian Coin Series."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18 (1956), pp. 13—42.

Bivar, A. D. H. "The Kaniṣka Dating from Surkh Kotal."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24 (1963), pp. 498—502.

Bivar, A. D. H. "Sasanians and Turks in Central Asia." In *Central Asia*. Edited by G. Hambly. New York, 1969, pp. 49—62.

Bivar, A. D. H. "The Absolute Chronology of the Kushano-Sasanian Governors in Central Asia." In J. Harmatta, ed.,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1979, pp. 317—332.

Bivar, A. D. H. "The History of Eastern Ira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3 (1). CUP: 1983, pp. 181—231.

Blockley, R. C.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Eunapius, Olyympiodorus, Priscus and Malchus). ARCA Classical and Medieval Texts, Papers and Monographs 10, Francis Cairns, 1981—1983.

Bopearachchi, O. "The Euthydemus Imitations and the Date of Sogdian Independence."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Vol. 2. Kamakura, 1992, pp. 1—21.

Bosworth, C. E. tr., *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 Vol. 5: The Sasians, the Byzantines, the Lakhmids, and Yemen (Abu Ja'far Muhammad bin Jarir al Tabari), New York: 1999.

Boyer, M. "L'Inscription en Kharoṣṭhī du 15 Āṣāḍha 136." *Journal Asiatique*, Serie 11, 5 (1915), pp. 281—298.

Chanda, R. "Taxila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136."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0, pp. 319—324.

Carter, M. L. "A Numismatic Reconstruction of Kushano-Sasanian History." *Museum Notes* 30 (1985), pp. 215—81.

Chattopadhyaya, S. *Early History of North India*. Calcatta, 1958.

Chavannes, E.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 lio*." *T'oung Pao*, Series 2, 6 (1905), pp. 519—571.

Chavannes, E.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Heou Han chou*." *T'oung Pao*, Series 2, 8 (1907), pp. 149—234.

Cribb, J. E. "Numismatic Evedence for Kushano-Sasanian Chronology." *Studia Iranica*, 19: 2 (1990), pp. 151—193.

Cribb, J. E. "The 'Heraus' Coins: their Attribution to the Kushan King Kujula Kadphises, *c*. A. D. 30—80." In *Essays in Honour of Robert Carson and Kenneth Jenkins*, ed. by Martin Price, Andrew Burnett and Roger Bland, London, 1993, pp. 107—134.

Cunningham, A. "Coins of Indian Buddhist Satraps, with Greek Inscriptions."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23 (1854), pp. 679—714.

Cunningham, A. "Coins of the Indo-Scythians." *Numismatic Chronicle*, Series 3, 8 (1888), pp.199—248.

Cunningham, A. "Coins of the Tochari, Kushans, or Yue-ti." *Numismatic Chronicle*, Series 3, 9 (1889), pp. 268—311.

Cunningham, A. "Coins of the Sakas." *Numismatic Chronicle*, Series 3, 10 (1890), pp.103—172.

Cunningham, A. *Coins of Ancient India, Down to the 7th Century A. D.* London 1891.

Cunningham, A. "Coins of the Kushāns, or Great Yue-tī." *Numismatic Chronicle*, Serie 3, 12 (1892), pp. 40—82.

Daji, B. "The Inroads of the Scythians into India, and the Story of the Kālakāchārya." *Journal of the Bombay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9 (1867), pp.139—146.

Dani A. H., B. A. Litvinsky and M. H. Zamir Safi. "Eastern Kushans, Kidarites in Gandhara and Kashmir, and Later Hephthalites." 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I: The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s, A. D. 250 to A. D. 750. Edited by B. A. Litvinskiy. UNESCO Publishing, 1996, pp. 163—166.

Dewing, H. B. tr.,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vol. 1. New York, 1914.

Dikshit, S. K. "The Problem of the Kushāṇas and the Origin of the Vikrama Saṁvat."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33 (1952), pp. 114—170.

Enoki, K. "The Yüeh-shih-ScythianIdentity, A Hypothesi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acts." Collection of Papers Presented, compiled by the Japanes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 1957 (Tokyo, 1959), pp. 227—232.

Enoki, K. "On the Date of the Kidarite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oyo Bunko* 27 (1969), pp. 1—26; 28 (1970), pp. 13—38.

Falk, H. "The Kaniṣka Era in Gupta Records."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10 (2004), pp. 167—176.

Fleet, J. F.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3, Inscriptions of the Early Gupta Kings and their Successors, No. 13, Calcutta, 1888.

Fleet, J.F. "St. Thomas and Gondophern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5, pp. 223—236.

Fleet, J.F. "The Date of the Takht-i-Bāhī Inscrip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6, pp.706—711.

Fleet, J.F. "The Taxila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136."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4, pp. 992—999.

Fleet, J.F. "The Taxila Scroll of the Year 136."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5, pp. 314—318.

Franke, O. *Beiträge aus chinesischen Quellen zur Kennitnis der Türkvölker und Skythen Zentralasiens*. Abhandlungen der Kön, Preussischen Akad. der Wissenschaften, 1904.

Frye, R. 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 München: 1984.

Fussman, G. "Documents épigraphiques Kouchans." *Be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61 (1974), pp.1—66.

Gardner, P. *The Coins of the Greek and Scythic Kings of Bactria and India in the British Museum*. Argonaut, Inc., Publishers Chicago: 1966.

Ghirshman, R. *Bégram,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les Kouchans*. Le Caire, Imperimerie d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46.

Göbl, R. "Roman Patterns for Kushāṇa Coins."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22 (1960), pp. 75—95.

Göbl, R. "Zwei neue Termini für ein zentrals Datum der Alten Geschichte Mittelasiens das Jahr 1 des Kušānkönigs Kaniška." *Anzeiger der phil-. -hist. Klasse der Öster. Akad. der Wiss*, Wien, 1964, pp.137—151.

Göbl, R.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iranischen Hunnen in Baktrien und Indi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67, II, pp. 53—54.

Göbl, R. "Numismatic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Date of Kaniṣka." In A. L. Basham, ed.,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ṣka*. Leiden, 1968, pp. 103—113.

Göbl, R. *System and Chronology of the Coinage of the Kushan Empire, A English language Companion to the original German Work*, by Warren A. Schwartz, 1984.

Grenet, F. "Regional Interac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Northwest India in the Kidarite and Hephthalite Periods." *Indo-Iranian Languages and Peoples, Proceedings of British Academy* 11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03—224.

Grenet, F. "Nouvelles Données Sur la Localisation des Cinq *Yabghus* des Yuezhi, L'arrière Plan Politique de L'itinéraire des Marchands de Maès Titianos." *Journal Asiatique* 294—2 (2006), pp. 325—341.

Gutschmid, A von. *Geschichte Irans und seiner Nachbarländer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zum Utergang der Arsacidem. Tübingen 1888.

Harmatt, J. "Minor Bactrian Inscription."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3(1965), pp. 149—205.

Harmatt, J. "Kidara and the Kidarite Huns in Kaśmīr." In J. Harmatta, ed., From Hecataeus to *Al-Ḫuwārizmī, Bactrian, Pahlavi, Sogdian, Persian, Sanskrit, Syriac, Arabic, Chinese, Greek and Lati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1984, pp. 185—189.

Harmatt, J.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 the Kushan Empire." In J.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UNESCO, 1994, pp. 417—440.

Haussig, H. W. "Theophylakts Exkurs über die skythischen Völker." *Byzantion* 23 (1953): pp. 275—462.

Henning, W. B.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G. Ulmen (ed.) Society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pp. 215—230. The Hague, Paris, New York, 1978.

Herzfeld, E. "Sakastan." *Archaeologische Mitteilugen aus Iran*, IV (1932), pp. 1—116.

Jacobi, H. "Das Kālakācārya-Kathānakam."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34 (1880), pp. 247—318.

Jayaswal, K. P. "Problems of Saka-Satavahana History." *Journal of the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 16 (1930), pp. 227—316.

Jones, H. L. tr.,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1916.

Jones, Christopher P. ed., Philostratus, *The 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vol. I.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5.

Kennedy, J. "The Secret of Kanishk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2, pp. 665—688.

Kielhorn, F. "Junagadh Rock-Inscription of Rudradaman." *Epigraphia India* 8 (1905—1906), pp. 36—49.

Kielhorn, F. "Junagadh Rock Inscription of Rudradaman; the Year 72." *Epigraphia India* 13 (1905—1906), pp. 36—49.

Konow, S. "The Eras of Indian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AO* III (1924), pp. 52—91.

Konow, S. "Some New Facts about the Eras of the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AO* V (1927), pp. 28—38.

Konow, S.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II, Part I,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Calcutta, 1929.

Konow, S. "Kalawan Copper-plate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134."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2, pp. 949—965.

Konow, S. "Notes on Indo-Scythian Chronology."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 12 (1933), pp. 1—46.

Law, B.C.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ncient India*. Paris 1954.

Lévi, S. "Le '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tcha." *Journal Asiatique*, septembre-octobre 1913, pp. 311—380.

Lohuizen-de Leeuw, J. E. van. *The Scythian Period*. Leiden 1949.

Lüders, H. "A List of Brāhmī Inscrip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about A.D. 400,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Aśoka." *Appendix to Epigraphia India and Record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X (1912).

Lüders, H. *Mathuā Inscriptions. Gottingen*: 1961.

MacDowall, D. W. "The Dynasty of the Later Indo-Parthians." *Numismatic Chronicle*, Series 7, 5 (1965), pp. 137—148.

MacDowall, D. W. "Numismatic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Kaniṣka." In A. L. Basham, ed.,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ṣka*. Leiden, 1968, pp. 134—149.

MacDowall, D. W. "Soter Megas, The King of Kings."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30 (1968), pp. 28—48.

MacDowall, D. W. "Numismatic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Kaniṣka." *Afghanistan Quarterly* 24 (1971—1972), No. 1, pp. 133—149.

MacDowall, D. W. "Implications for Kushan Chronology of the Numismatic Context of the Nameless King." In B.G. Gafurov; G.M. Bongard-Levin; E. A. Grantovsky; L. I. Miroshnikov; B.Y. Stavisky, ed., *Central Asia in the Kushan Period, I. Mockva*, 1974, pp. 246—264.

MacDowall, D. W. "Implications for Kushan Chronology of the Numismatic Context of the Nameless King."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37 (1975), pp. 44—71.

Maenchen-Helfen, O. "The Yüeh-chih Problem Re-Examine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45 (1945), pp. 71—84.

Majumdar, R. C. ed., *The Age of Imperial Unity*. Bombay, 1953.

Majumdar, R. C., A.S. Altekar, ed., *The Vākātaka-Gupta Age*(c. 200—550 A.D.). *New History of the Indian People*, Vol. 6.Banaras: Motilal Banarsi Dass, 1954.

Marquart, J.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Marquart, J.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von Eran II*. Leipzig 1905.

Marshall, J. "The Date of Kanishk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4, pp. 973—986; 1915, pp. 191—195.

Marshall, J. "Excavations at Taxila, 1912—1913." *ASIAR*, Calcutta 1916, pp. 1—52.

Marshall, J. *Taxila*. Cambridge, 1951.

Martin, M. F. C. "Coins of Kidāra and the Little Kushā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Letters*, 3—2 (1937) = *Numismatic Supplement*, No. 47, pp. 23—50.

Masson, M. E. "The Oringin of the Nameless King of Kings, the Great the Soviour." *Procedings of the Central Asian State University*, Tashkent, 1950, pp. 30—33.

Mukherjee, B. N. "A Note on the Date of Gondophares."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38 (1962), pp. 239—241.

Mukherjee, B. N.*The Kushāṇa Genealogy*. Calcutta: Sanskrit College, 1967.

Mukherjee, B. N. "The Kushāṇa Epithet Kara."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5 (1977), pp. 143—144.

Mukherjee, B. 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Kushana Empire*. Calcutta, 1988.

Narain, A. K. *The Indo-Greeks*. Oxford, 1957.

Narain, A. K. "The Date of Kaniṣka." In A.L. Basham, ed.,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ṣka*, Leiden, 1968, pp. 206—239.

Narain, A. K. "The Five Yabgus of the Yueh-chih." In *Indian: History and Thought*, ed. by S.N. Mukherjee. Calcutta: 1982, pp. 174—185.

Narain, A. K. "Indo-Europeans in Inner Asia." In D.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1990, pp. 151—176.

Nikitin, A. "Notes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Kushano-Sasanian Kingdom." In *Coins, Art and Chronology: Essays on the Pre-Islamic Histor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Edited by M. Alram and D. E. Klimburg-Salter. pp. 259—263.

Pelliot, P. "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e." *T'oung Pao* 26 (1928—1929), pp. 201—203.

Petech, L. *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the Shui-Ching-Chu*. Serie Orientale Roma: II,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0.

Petech, L. *Selected Papers on Asian History*. Serie Orientale Roma: LX,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88.

Pulleyblank, E. G.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n. s. 9 (1962), pp. 58—144, 206—265.

Pulleyblank. E. G.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6, pp. 9—39.

Puri, B. N. "The Dates of the Kadphises King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Śaka Kshatrapas of Western India."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 20 (1941), pp. 275—287.

Puri, B. N. *Indian under the Kushāṇa*, Bombay, 1965.

Rapson, E. J. *Indian Coins*.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 Strassburg, 1898.

Rapson, E. J. *Catalogue of Coins of the Andhra Dynasty, the Western Ksatrapas, the Traikutak Dynasty and the "Bodhi" Dynasty*. London, 1908.

Rapson, E. J.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II, Part I: Kharoshṭhī Inscriptions. Calcutta: 1929."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0, pp. 186—202.

Rapson, E. J.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I, Cambridge 1951.

Raychaudhuri, H. *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 Calcutta 1953.

Rolfe, John C. tr., *Ammianus Marcellin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1939.

Rosenfield, J. M. "The Mathura School of Sculpture; Two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Kushan Chronology." In A. L. Basham, ed.,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ṣka*. Leiden, 1968, pp. 259—277.

Senart, E. "The Inscriptions in the Caves at Nasik." *Epigraphia India* 8 (1905—1906), pp. 59—96.

Senior, R. C. *The Coinage of Hermaios and its Imitations Struck by the Scythians*. 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 Lancaster, 2000.

Shrava, S. *The Kushāṇa Numismatics, Pranava Prakashan*. New Delhi: 1985.

Shrava, S. *The Dated Kushāṇa Inscriptions*, Pranava Prakashan, New Delhi: 1993.

Simonetta, A. "An Essay on the So-called 'Indo-Greek' Coinage." *East and West*, n.s. 8 (1957—1958), pp. 44—66.

Simonetta, A. "A New Essay on the Indo-Greeks, the Śakas and the Pahlavas." *East and West*, n.s. 9 (1958), pp.154—183.

Sims-Williams, N.; J. Cribb, "A New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Kanishka the Grea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1995/1996, Kamakura, pp. 75—142.

Sims-Williams, N. "Further Notes on the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Rabatak, with an Appendix on the Names of Kujula Kadphises and Vima Taktu in Chinese." In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European Conference of Iranian Studies, held in Cambridge, 11th to 15th September 1995*, Part 1 (Old and Middle Iranian Studies). Edited by Nicholas Sims-Williams, Wiesbaden, 1998, pp. 79—96.

Sircar, D. C. "The Kushāṇas." *In The Age of Imperial Unity*. Edited. by R.C. Majumdar, Bombay, 1953, pp. 136—153.

Sircar, D. C. "The Vikrama Saṁvat and Sakābda." In R.C. Majumdar, ed., *The Age of Imperial Unity*. Bombay, 1953, pp. 154—158.

Smith, V. A.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1914.

Stein, M.A. *Kalhaṇa's Rājataranginī*. Vol. I, Delhi • Patna • Varanasi, 1961.

E. L.Stevenson, tr. and ed., *Geography of Claudius Ptolemy*. New York, 1932.

Tarn, W. W.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1951.

Tezcan M. "Origin of the Kushans." *The Tūrks* 1 (2002), pp. 250—270, 808—814.

Tanabe, K. "The Kushano-Sasanian Governors hidden in Roman and Chinese Sources." In *Studies in Silk Road Coins and Culture*. Edited by K. Tanabe, J. Cribb, H. Wang, London / Kamakura, 1997, pp. 75—88.

Thomas, F. W. "Sakastana, Where dwelt the Sakas Named by Darius and Herodotu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6, pp. 181—200.

Thomas, F. W. "Sandanes, Nahapāna and Kaniṣka, Tung-li, Pán-ch'i and Chinese Turkestan." *New Indian Antiquary* 7 (1944), pp. 79—100.

Thomson, Robert W. ed., *Moses Khorenats'i History of the Armenians*,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on the Literary Sourc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1978.

Thomson, R. W. tr., *Elishē*, *History of Vardan and the Armenian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Ward, J.tr.,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Leiden & Boston:Brill, 2005.

Whitehead, R. B. *Catalogue of Coins in the Punjab Museum*, I. Lohore, 1914.

Wright, W. *The Chronicle of Joshua the Stylite*, *with a English Translation into and Notes*. Cambridge, 1882.

Wylie, A. "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ian and Ireland* 10 (1881), pp. 20—73.

Yu Taishan, "The Earliest Tocharians in China." *Sino-Platonic Papers* 204 (201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E.V.Zeimal, "Politicheskaya istorya drevney Transoksiany po numizmaticheskim dannym." *Kul'tura Vostoka. Drevnost'i rannee srednevekov'e*. Leningrad, 1978, pp. 192—214.

Zeimal, E.V. "The Kidarite Kingdom in Central Asia." In B. A. Litvinskiy,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I, The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s, A. D. 250 to A. D. 750. UNESCO Publishing, 1996, pp. 119—128.

五　日語文獻

榎一雄"キダーラ王朝の年代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1～3 (1958年), pp. 283—334。

榎一雄"初期アルメニア史書に見えるエフタルとクシャン",《東洋學報》47—4 (1965年), pp. 1—56。

榎一雄"月氏の副王謝——クシャン王朝年代論に關する一臆說——",《オリエント》10～3/4 (1968年), pp. 1—15。

羽溪了諦《西域の佛教》, 法林館, 1914年。

堀謙德《解說西域記》, 國書刊行會, 1972年。

桑山正進《大乘佛典・大唐西域記》, 東京都: 中央公論社, 1987年。

森鹿三、日比野丈夫譯注《水經注》,《中國古典文學大系》21, 東京: 平凡社, 1975年。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

上》，東京：岩波，1970 年，pp. 97—227。
白鳥庫吉“罽賓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東京：岩波，1970 年，pp. 295—359。
高田修《國譯慈恩傳》，大東出版社，1940 年。

索引

【說明】本索引收入正文中主要人名、地名、族名等，分漢、西兩部分，按音序排列。條目後數字爲本書頁碼。

後記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開始收集和研讀貴霜史的資料，迄今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能夠形成文字的心得体會就衹有這麼一點。我的低能，可見一斑。

1981 年，我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分配至歷史研究所工作。業師孫毓棠先生説:“你準備花十年左右時間搞一搞突厥興起之前的中亞史吧！”我不識深淺，一口應諾。不用説，任務迄今尚未完成，知不可爲而爲之而已。貴霜史的情況亦是如此。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儘管貴霜史的真相依舊朦朦朧朧，但貴霜史涉及面廣，貴霜史研究拓展了古代中亞史研究的領域，貴霜史研究的意義不僅在貴霜史本身，更在貴霜史之外。

余太山

2014 年 2 月 10 日

余太山主要出版物目錄

（1983—2014）

一 專著

001 《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9月初版；商務印書館，2012年1月再版。

002 《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2月初版；商務印書館，2012年6月再版。

003 《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6月初版；商務印書館，2011年9月再版。

004 《古族新考》，中華書局，2000年6月初版；商務印書館，2012年6月再版。

005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11月初版；商務印書館，2013年5月再版。

006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中華書局，2005年3月初版；商務印書館，2013年5月再版。

007 《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初版；商務印書館，2013年5月再版。

008 《古代地中海和中國關係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12年6月初版。

二 論文

001 《魏書·嚈噠傳》考釋，《文史》第20輯（1983年），pp. 258—263。

002 《魏書·粟特國傳》辨考，《文史》第21輯（1983年），pp. 57—70。

003 嚈噠史研究中的若干問題，《中亞學刊》第1輯（1983年），中華書局，pp. 91—115。

004 《魏書·小月氏、大月氏傳》史實辨考,《學習與思考(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生院學報)》1984年第3期, pp. 64—69。

005 關於頭羅曼和摩醯邏矩羅,《南亞研究》1984年第3期, pp. 9—15。

006 嚈噠史二題,《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2期, pp. 189—204。

007 關於嚈噠的覆亡,《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pp. 38—43。

008 柔然與西域關係述考,《新疆社會科學》1985年第4期, pp. 67—77, 80—81。

009 柔然、阿瓦爾同族論質疑——兼說阿瓦爾即悅般,《文史》第24輯(1985年), pp. 97—113。

010 條支、黎軒、大秦和有關的西域地理,《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2期, pp. 57—74。

011 關於董琬、高明西使的若干問題,《文史》第27輯(1986年), pp. 31—46。

012 馬雍《西域史地文物叢考》編後,《新疆社會科學》1986年第4期, pp. 124—126。

013 嚈噠的族名、族源、和族屬,《文史》第28輯(1987年), pp. 109—125。

014 《太伯里史》所載嚈噠史料箋證(宋峴漢譯),《中亞學刊》第2輯(1987年), 中華書局, pp. 51—64。

015 烏孫考,《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 pp. 30—37。

016 奄蔡、阿蘭考,《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pp. 102—110, 114。

017 《漢書·西域傳》所見塞種,《新疆社會科學》1989年第1期, pp. 67—78。

018 匈奴、鮮卑與西域關係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pp. 153—171。

019 大夏和大月氏綜考,《中亞學刊》第3輯(1990年), 中華書局, pp. 17—46。

020 匈奴、Huns同族論質疑,《文史》第33輯(1990年), pp. 57—73。

021 "Who were Toramana and Mihirakula?" *Asia-Pacific Studies* 1990, pp. 95—108.

022 塞種考,《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 pp. 19—33。

023 大宛和康居綜考,《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 pp. 17—45。

024 關於鄯善都城的位置,《西北史地》1991年第2期, pp. 9—16。

025 安息與烏弋山離考,《敦煌學輯刊》1991年第2期, pp. 82—90。

026 罽賓考,《西域研究》1992年第1期, pp. 46—61。

027 關於Huns族源的臆測,《文史》第34輯(1992年), pp. 286—288。

028 張騫西使新考,《西域研究》1993 年第 1 期, pp. 40—46。
029 東漢與西域關係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3 年第 2 期, pp. 19—39。
030 西漢與西域關係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4 年第 1 期, pp. 9—24; 第 2 期, pp. 125—150。
031 兩漢西域戊己校尉考,《史林》1994 年第 1 期, pp. 8—11, 7。
032 貴霜的族名、族源和族屬,《文史》第 38 輯(1994 年), pp. 18—28。
033 漢魏通西域路線及其變遷,《西域研究》1994 年第 1 期, pp. 14—20。
034 前秦、後涼與西域關係述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4 年第 4 期, pp. 68—73。
035 西涼、北涼與西域關係述考,《西北史地》1994 年第 3 期, pp. 1—5。
036 第一貴霜考,《中亞學刊》第 4 輯(1995 年), 北京大學出版社, pp. 73—96。
037 新疆出土文書劄記:I. 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緣禾"、"建平"年號, II. 關於"李柏文書",《西域研究》1995 年第 1 期, pp. 77—81。
038 前涼與西域關係述考,《中國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 pp. 139—144。
039 兩漢西域都護考,《學術集林》卷五, 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5 年, pp. 214—242。
040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的綠洲大國稱霸現象,《西北史地》1995 年第 4 期, pp. 1—7。
041 《榎一雄著作集》第 1—3 卷《中亞史》(書評),《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一卷(1995 年),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 年, pp. 381—389。
042 南北朝與西域關係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6 年第 1 期, pp. 1—32。
043 《後漢書・西域傳》與《魏略・西戎傳》的關係,《西域研究》1996 年第 3 期, pp. 47—51。
044 說大夏的遷徙——兼考允姓之戎,《夏文化研究論集》, 中華書局, 1996 年, pp. 176—196。
045 《魏書・西域傳》原文考,《學術集林》卷八, 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6 年, pp. 210—236。
046 允姓之戎考——兼說大夏的西徙,《中國國際漢學研討會論文集》,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年, pp. 673—711。
047 關於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的體例,《西北師範大學學報》1997 年第 1 期, pp. 17—22, 92。
048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南北道綠洲諸國的"兩屬"現象——兼說貴霜

史的一個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 年第 2 期, pp. 1—5。

049 《史記・大宛列傳》與《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西域傳》的關係,《學術集林》卷一一, 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7 年, pp. 162—179。

050 曹魏、西晉與西域關係述考,《文史》第 43 輯(1997 年), pp. 61—71。

051 有虞氏的遷徙——兼說陶唐氏的若干問題,《炎黃文化研究(炎黃春秋增刊)》第 4 期(1997 年), 北京: 炎黃春秋雜誌社, pp. 52—59, 67; 第 5 期(1998 年), pp. 62—66, 75。

052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族名、國名、王治名,《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pp. 238—251。

053 《梁書・西北諸戎傳》與《梁職貢圖》,《燕京學報》新 5 期,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pp. 93—123。

054 昆吾考,《中華文史論叢》第 58 輯(1999 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pp. 245—257。

055 評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漢譯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主辦《中國出版》1999 年第 4 期, 中心插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西域考古圖記》5 卷, 原著:[英]奧雷爾・斯坦因, 翻譯: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

056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的里數,《文史》第 47 輯(1999 年第 2 期), pp. 31—48; 第 48 輯(1999 第 3 期), pp. 129—141。

057 讀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書品》1999 年第 4 期, pp. 29—34。

058 關於甘英西使,《國際漢學》第 3 輯, 鄭州: 大象出版社, 1999 年, pp. 257—263。

059 犬方、鬼方、方與獫狁、匈奴同源說,《歐亞學刊》第 1 輯, 中華書局, 1999 年, pp. 7—28。

060 中國史籍關於希瓦和布哈拉的早期記載,《九州》第 2 輯, 商務印書館, 1999 年, pp. 157—160。

061 荀悅《漢紀》所見西域資料輯錄與考釋,《中亞學刊》第 5 輯,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pp. 216—238。

062 馬雍遺作目錄,《中國史研究動態》2000 年第 3 期, pp. 26—29。

063 樓蘭、鄯善、精絕等的名義——兼說玄奘自于闐東歸路線,《西域研究》2000 年第 2 期, pp. 32—37。

064 義渠考,《文史》第 50 輯(2000 年第 1 期), pp. 153—158。

065 漢晉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地望,《歐亞學刊》第2輯,中華書局,2000年,pp. 37—72。
066 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pp. 180—210。
067 讀華濤《西域歷史研究(八至十世紀)》,《書品》2001年第4期,pp. 35—39。
068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山水,《史林》2001年第3期,pp. 50—56。
069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宗教、神話傳說和東西文化交流,《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pp. 115—127。
070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吐魯番學研究》2001年第1期,pp. 116—123;第2期,pp. 104—111。
071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制度和習慣法,《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pp. 5—14。
072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人口,《中華文史論叢》第67輯(2001年第3期),上海古籍出版社,pp. 62—76。
073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人種和語言、文字,《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1期,pp. 51—57。
074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社會生活,《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pp. 56—65。
075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物産,《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周年華辰紀念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5月,pp. 437—453。
076 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地望,《歐亞學刊》第3輯,中華書局,2002年4月,pp. 163—183。
077 魚國淵源臆說,《史林》2002年第3期,pp. 16—20。又載山西省北朝文化研究中心主編《4—6世紀的北中國與歐亞大陸》,科學出版社,2006年,pp. 140—147。
078 有關嚈噠史的笈多印度銘文——譯注與考釋(劉欣如譯注),《西北民族論叢》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2月,pp. 44—66。
079 新發現的臘跛闞柯銘文和《後漢書·西域傳》有關閻膏珍的記載,《新疆文物》2003年第3—4輯,pp. 43—47。
080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的認知和闡述系統,《西北民族論叢》

第 2 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 pp. 43—47。

081 《史記・大宛列傳》要注,《暨南史學》第 2 輯, 2003 年, pp. 56—79。

082 《周書・異域傳》所見高昌等西域諸國資料要注,《吐魯番學研究》2003 年第 2 期, pp. 54—72。

083 《水經注》卷二（河水）所見西域水道考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2 集, 2004 年 4 月, pp. 193—219。

084 《梁書・西北諸戎傳》要注,《西北民族研究》2004 年第 2 期, pp. 93—104。

085 《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有關大秦國桑蠶絲記載淺析,《西域研究》2004 年第 2 期, pp. 14—16。

086 《後漢書・西域傳》要注,《歐亞學刊》第 4 輯，中華書局, 2004 年 6 月, pp. 261—312。

087 《隋書・西域傳》的若干問題,《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4 年第 3 期, pp. 50—54。

088 渠搜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古史文存・先秦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 pp. 331—344。

089 隋與西域諸國關係述考,《文史》第 69 輯（2004 年第 4 期）, pp. 49—57。

090 《漢書・西域傳上》要注,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 第 3 集, 2004 年 10 月, pp. 125—178。

091 《隋書・西域傳》要注,《暨南史學》第 3 輯, 2004 年, pp. 92—123。

092 漢文史籍有關羅馬帝國的記載,《文史》第 71 輯（2005 年第 2 期）, pp. 31—96。

093 匈奴的崛起,《歐亞學刊》第 5 輯，中華書局, 2005 年 6 月, pp. 1—7。

094 裴矩《西域圖記》所見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西域研究》2005 年第 4 期, pp. 16—24。

095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有關早期 SOGDIANA 的記載,《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法國漢學》第 10 輯)，中華書局, 2005 年 12 月, pp. 276—302。

096 《通典・邊防七・西戎三》要注,《文史》第 74 輯（2006 年）, pp. 139—160。（與李錦繡合作）

097 《魏略・西戎傳》要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 年第 2 期, pp. 43—61。

098 《魏書・西域傳》（原文）要注,《西北民族論叢》第 4 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 年 3 月, pp. 24—75。

099 宋雲行紀要注,《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

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pp. 565—591。
100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關於東西陸上交通路線的記載，《中國古代史論叢——黎虎教授古稀紀念》，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pp. 242—251。
101 關於法顯的入竺求法路線——兼說智猛和曇無竭的入竺行，《歐亞學刊》第 6 輯（古代內陸歐亞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卷上），中華書局，2007 年 6 月，pp. 138—154。
102 劉文鎖著《沙海古卷釋稿》序，中華書局，2007 年 7 月，pp. 1—3。
103 《漢書・西域傳下》要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4 集，2007 年 8 月，pp. 187—233。
104 伊西多爾《帕提亞驛程志》譯介與研究，《西域研究》2007 年第 4 期，pp. 5—16。
105 《穆天子傳》所見東西交通路線，《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 3 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pp. 192—206。
106 希羅多德《歷史》關於草原之路的記載，《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 4 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pp. 11—23。
107 宋雲、惠生西使的若干問題——兼說那連提黎耶舍、闍那崛多和達摩笈多的來華路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5 集，2008 年 4 月，pp. 25—45。
108 馬小鶴著《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0 月，pp. 1—2。
109 托勒密《地理志》所見絲綢之路的記載，《歐亞學刊》第 8 輯，中華書局 2008 年 12 月，pp. 85—98。
110 《那先比丘經》所見"大秦"及其他，《歐亞學刊》第 9 輯，中華書局 2009 年 12 月，pp. 109—114。
111 "History of the Yeda Tribe (Hephthalites): Further Issues," *Eurasian Studies* I.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 pp. 66—119.
112 Α λ ο χ ο ν 錢幣和嚈噠的族屬，《中國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pp. 5—16。
113 《絲瓷之路——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發刊詞，《絲瓷之路——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創刊號，商務印書館，2011 年，pp. i—iii。
114 關於驪靬問題的劄記，《絲瓷之路——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創刊號，商務印書館，2011 年，pp. 235—244。
115 吐火羅問題，《歐亞學刊》（國際版）第 1 期（總第 11 期），商務印書館，

2011 年, pp. 259—285。
116 貴霜的淵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7 集, 2011 年 10 月, pp. 237—247。
117 貴霜王朝的創始人——丘就卻,《歐亞學刊》第 10 輯, 中華書局, 2012 年 9 月, pp. 51—68。
118 關於突厥可汗致拜占庭皇帝書,《絲瓷之路——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第 2 輯, 商務印書館, 2012 年 9 月, pp. 155—164。
119 關於"閻膏珍",《絲瓷之路——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第 3 輯, 商務印書館, 2013 年 6 月, pp. 3—32。
120 "塞種"釋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8 集, 2013 年 10 月, pp. 175—181。
121 迦膩色迦的年代,《絲瓷之路——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第 4 輯, 商務印書館, 2014 年 4 月, pp. 3—131。
122 "Αλοχον Coins and the Ethnicity of the Hephthalites," *Eurasian Studies* II. Asia Publishing Nexus, 2014, pp. 38—57.
123 貴霜王朝的終結,《西域研究》2014 年第 3 期, pp. 1—6。